

《慈悲與正義》

慈悲特殊禧年講座筆錄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

目錄

第一講：	苦難與慈悲 夏其龍 阮美賢	1-40
第二講：	說了再見以後一 家庭中的慈悲 潘婉玲 甘寶維	41-80
第三講：	從聾人手語看天父的慈悲與正義 鄧慧蘭 夏志誠	81-121
第四講：	天資無極限 盡在有心人 — 慈悲的教育 賀若瑩 林祖明	122-164
第五講：	傷健一家 與主共行 陸慧妍 黃宗顯	165-195
跋		196-198
索引		199-202

第一講 苦難與慈悲

主講：夏其龍

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

回應：阮美賢

天主教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苦難與慈悲》

夏其龍

緣起

天主教研究中心以《慈悲與正義》為主題籌劃這一系列講座，有三個理由：首先，我們欲回應天主教教宗方濟各訂定 2016 年為慈悲特殊禧年，故以慈悲作為主題籌劃這一連串的講座，並於公教報宣傳。我相信，在座應有一些人士是看過公教報而來的教友吧。

其次，本研究中心為天主教小學老師剛舉辦了為期八個月的社會倫理培訓課程，因着社會倫理與正義相關，我們便把正義與慈悲連結起來，構成主題。講座宣傳海報也同時分發給學校。故在場另一些人士可能是老師。

再者，在這十年來，每年我都會帶領遊學團或考察團出赴歐洲、非洲、亞洲等不同地方，參加者大部

份都是歷史系文科碩士的畢業生及其友人或家屬。在2017年4月至5月，本人與文明研習社合辦《慈悲與正義》歐洲五國之歷史現場懷古遊，該社通知社友今次的講座，作為歷史懷古遊之事前準備。因而，在座也會有一些人士是來自文明研習社的團友。

苦難與慈悲

這個講座的主題為《苦難與慈悲》。事實上，苦難是一個極沉重且嚴肅的主題。而慈悲作為人類要解決萬種痛苦或苦難時的一種方法，遂也變成一個嚴肅的問題。正因如此，我倒想在這第一次講座，採用一種較為輕鬆的手法，以作導引。在未來的五個講座（其中一個講座因天雨關係取消，這處改為「四個講座」：編者註），才讓你們探看人類的實際痛苦或苦難，及其處境如何，並從宗教或哲學的角度探究這些問題。

早前，有人跟我討論為何於第一講用《苦難與慈悲》，而不用《痛苦與慈悲》為講題。我的理由是痛苦來得更直接。我的反思是由於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身體，而痛苦和身體直接相連，故痛苦與我們有直接的關係。然而，苦難較為深層，它涉及了人的感受及心

理，更包括了痛苦。痛苦可以引發出苦難，但苦難必亦包含痛苦。我們容易由痛苦聯想到災難，因為痛苦其實是個人直接的感受，而苦難或災難往往是外在世界或其他人加諸而來，使人感到不安、恐懼，繼而產生痛苦或惶然不安的一種狀態。

不論你是甚麼人，自出娘胎之時就要面對痛苦；但在痛苦之前，你所遇上的是慈悲，正義也如是。慈悲、痛苦、正義之課題，基本上不是宗教團體壟斷的範疇。話雖如此，宗教人士對這些事情卻是一眾的專家，其教義和講道皆圍繞着這些課題探究人類的痛苦、公義和慈悲。例如宗教人士會講解苦難有甚麼意思呢？如何去解脫呢？何謂正義與不正義呢？不正義行為之動機從何而來呢？我們如何解答這些不正義的問題呢？慈悲是否可以解決苦難和不正義的問題呢？慈悲又可否作為人生之最高境界呢？這些都是我因着這個主題思索出來的各種問題。這裏先用以下詩歌切入慈悲的主題。

《施與》——紀伯倫

公元七世紀，在黎巴嫩 (Lebanon) 的貝魯特 (Beirut) 約一百二十公里以外，有一座個人的隱修院，

即現今的紀伯倫博物館。紀伯倫¹是一位著名的詩人（或許在座也有人曾看過他的書）。我在少年時也曾閱讀過他所寫的一本名為《先知》²的書，當中有一篇是關於施與。篇中紀伯倫描寫施與自己財產的舉止，並非功業。因為功業的念頭會把這份捐贈變得「淡然無味」。作者也談到生命的豐裕，說到有一些人不會匱乏，由於他們不斷地施與。施與有各樣的實踐方式，如快樂地、勉強地、或是自然地施與。紀伯倫勸諭我們要掌握施與的機會，而非留給別人替自己去做。但有些人卻說他只會施與他認為值得的人，這是否又值得我們去反思呢？最後一點，紀伯倫指出最大的施與，是使人把生命的目標轉化為「一片乾枯的嘴唇」，並把自己的生命變成一眼活泉。當我飲用這活泉水時，這眼活泉其實也在吮飲着我。

¹ 紀伯倫（Kahlil Gibran，1883年—1931年），黎巴嫩哲理散文家、神祕主義詩人、藝術家。

² 《先知》是黎巴嫩詩人哈利里紀伯倫的代表作，內容包涵了生命以及人間的種種狀況：包括愛情、婚姻、子女、付出、飲食、工作、樂與哀、房子、衣服、買賣、罪與罰、法律、自由、理性與激情、痛苦、自知、教導、友誼、交談、時間、善惡、祈禱、歡愉、美善、宗教和死亡。

《施與》——紀伯倫

當你只是施與自己的財產時，
那何足掛齒？
只有當你奉獻自己時，
那才是真正的施與。
有些人捐獻時九牛拔一毛，
往往也是為了得到認可，
這私心使他們的捐贈變得淡然無味。
也有些人，擁有甚少，
卻全部捐獻出來。
這些人，
他們相信生命和相信生命的豐裕，
他們從不會匱乏。
有些人快樂地施與，
這快樂便是他們的報酬。
有些人勉強地施與，
這勉強便是他們接受生命入門的考驗。
有些人自然地施與，不是為了快樂，
也不是為積德；
他們施與，猶如幽谷的蘭花，
在空中散發出淡淡的馨香。

總有一天，
你將要把所擁有的一切都留給別人；
所以現在就施與吧，
掌握這施與的機會，
別把它也留給你的後人。
你常說：「我只贈送給值得的人」，
可是果園中的樹和牧場上的羊群
卻不會這樣說，
若牠們拒絕施與就不會存在，
是施與使牠們得以生存。
最大的施與就是令人把生活的目標
變成乾旱的嘴唇，
和把他的生命變成一個活泉。
而我最大的報酬就是：
每當我來到水泉喝水時，
這水泉本身也是口渴；
而當我喝它時，它也在喝着我。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兼職任教拉丁文時，拉丁文使我在思考、說話及措辭方面有所改變，我會去衡量每個字有多少內涵、自己想表達些甚麼，以及別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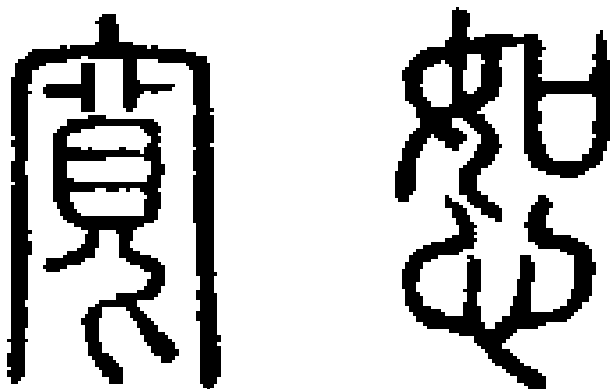
想像到甚麼意思。曾經有朋友跟我說：「你似乎對語言藝術很有興趣，因為你會把一些有份量的東西放進說話裏去。」我遂反思何謂語言「偽」術，即作為假的「偽」，偽術是指你知道自己講的內容含糊，用意是要讓人不知道你在說甚麼。但我覺得自己對語言的執着並非如此，而是試圖清楚明白自己要說的是甚麼，以及知道聆聽者接收到甚麼訊息。

施與• 慈悲• 寬恕

正因如此，我開始思索慈悲是甚麼意思。我想到「施與」的英文是 give，而英文字詞如 donation、doner 的字均來自拉丁文的 donare。那麼，完全的施與又是甚麼呢？英文是 forgive，而 for-give 中的 for，不只是一般介系詞中所指「為你」的 for，而是「全部」的意思，因它涉及拉丁文中的 per，即合為 per-donare。Donare 是 give，而 per 是指全部的意思。英文有 pardon，法文有 pardon，但這個 per-donare 是完全的施與。

何謂完全的施與呢？當你擁有一些東西，而把那擁有物給予別人，那只是你作為一個施與者把自己擁有的交付別人，故實非完全的施與。如果是完全的施

與，你所交付的，包括了你自己。當你完全地施與，即 *forgive* 時，你會把自己的追究權力也一併放棄。我們通常會有甚麼追究權呢？追債、報復、報仇等都是在武俠小說中常見的，這些表明了我們向對方所要求的是，既然你傷害了我，我也要同樣地傷害你。當中自然就沒有 *forgive*。所以，我覺得施與和慈悲的意思可謂如出一轍。當你能完全地施與，那就是慈悲，即英文所謂的 *mercy*。



最近哲學系關子尹教授做了一個多功能的漢語網站，當中包括甲骨文、金文、隸書、篆書和草書中的文字演變。我便去搜查「寬恕」一詞是甚麼意思。寬，在《說文》中，是指很大的屋。恕，由「如」和「心」組成。「如」字，從「女」及從「口」；

「恕」字，從「如」和從「心」。關於「如」和「心」，我想到人做事的模式，有時候會依循傳統、人情或某些情況，而非按着自己的心去做，這就不是如心。如心，即發自人的內心，此謂之恕。所以，寬恕是寬大地按照自己的心做要做的事。剛才提及到英文字 for+give，即 to give up desire or power to punish。按人性的原始本能，倘若有人打來一拳，我們會返擊一拳；當有人辱罵我們時，我們亦還以顏色。這是 desire and power to punish。比方說，我們懲罰別人的行為乃源於年幼時對被懲罰所產生的恐懼；長大後，人會用懲罰使人恐懼。這樣反映人不放棄個人的意願和能力懲罰他人，有異於剛才所說的 perdonare 完全地付給，即是 to give wholeheartedly、to remit。

《如同天父 滿懷慈悲》

天主教會用了一幅畫題為《如同天父滿懷慈悲》表達慈悲特殊禧年。這幅畫作最特別的地方是當中兩個人物共有三隻眼睛，即有一隻眼是共用的。畫中所見，一個揹負浪子的人和浪子本身的一隻眼相連。揹負浪子的人在手和腳上都有一個傷痕，代表他是耶



耶穌，他用自己的苦難尋找浪子，而浪子的臉孔表露的是一隻迷失的羊。當牧羊人把羊帶回家，就是這般揹負。這個揹負的形象揉合了迷失的羊和浪子回頭兩者。若按天主教教義看這幅畫像，那是從天降下聖子耶穌的一隻眼睛，祂和浪子所看到的都是一樣，因為祂也是一個人。

一個人。

慈悲，就是當一個人接受被寬恕時，他亦要寬恕別人。慈悲，非單指接受，同時亦要施與。紀伯倫所說「當我在飲泉水時，泉水也在飲着我」，就是這個意思。教宗方濟各在慈悲特殊禧年曾經說過一句話：「耶穌基督是天父慈悲的面容」。這句話包涵了基督信仰的奧蹟。

荷蘭畫家林布蘭 (Rembrandt³) 畫了一幅聖經中慈父和浪子故事的畫作。一個父親有兩個兒子，幼子要求父親分配遺產，給他後便離鄉別井。不久之後，當他家財散盡，想到自己墮落的境況還不如父親家中的傭工時，便想到要回歸父家去。父親遠處遙望到歸家的幼子，便匆匆上前迎接。在那幅畫中，浪子回頭的訊息表露無遺。

無條件的施與

接着，我給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真實故事。六十年代是一個生活艱苦的年代。其時，我和九個兄弟姊妹在元朗一起長大。我父母是客家人，他們對長子嫡孫的我抱有頗大的期望。那時候，我考進一所公立中學——當時來說，就像考獲狀元或進士般，父母重視極了，還特地送我一台品牌的腳踏車，讓我每天順暢地用四十五分鐘由屏山往元朗中學上學，心感父母寄以厚望之情。還記得那一天，父親特意在九龍租賃一輪貨車運載那台腳踏車回到村口，然後他就用那台腳踏車載我回家。家父雖已過身，但是這份經驗所帶來的思念和感受，彌足珍貴。

³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年7月15日 - 1669年10月4日，歐洲17世紀最偉大的畫家之一，也是荷蘭歷史上最偉大的畫家。



從前家父在港島工作，每星期只能歸家一趟。每逢他回來，總是買一些零食帶回家。他會先給每個孩子一份，然後把其餘的都交給我，囑我去分配。上高中的時候，我對父親表示有意入修院，他對此感到無比傷心，更把我逐出家門。經過家母調停後，我還是進了修院。接着的四年，我經常留在修院讀書，甚少回家，而家人每月也只有兩小時來探望。其後七年，我在羅馬讀書。之後，在香港晉鐸成為神父。做神父是不支薪的，教會只提供食、住、工作及約二百港元零用錢，那個數目在七十年代已經算不錯。記得那一次，我拿着一百元回家給家父，他說了一句令我今天猶會淌淚的話，他說：「多謝」。那時，我慌神得不知如何回應。

我的生命從他而來，亦由他艱辛地撫育長大。但一切卻未如他的意思去實現，而是按照我一己所願去追尋。所以，當他講出那句話時，正好提醒了我，自己從未說出這一句「多謝」。原來，「多謝」是對施與者的接受而去講的話。他說多謝，表示我是施與者。那時，我面對着一個莫大的施與者，他竟然告訴我，施與者是我，真是情何以堪！從這則故事，我感

到真正的慈悲，在於無條件的施與。我們平常不斷地在接受，卻茫然不知自己身邊有很多施與者。

種種苦難

大地
懂得說多
謝。夾竹桃
是大地的禮
物，也會對
人類說多謝
的一種花。
大家是否看



過夾竹桃呢？知否它有何特性呢？許多人說夾竹桃有
毒性，但也有說法指它沒有。夾竹桃是一個城市的市
花，像洋紫荊是香港的市花。大家知道它是哪個城市
的市花嗎？廣島 (Hiroshima)。原子彈在當地爆發之
後，人們發現第一種出現的花就是夾竹桃，便以它作
為市花。1945年原子彈爆發，估計約有十二平方公里
的市區以及百分之六十九建築物遭受摧毀，而市內約
三成的人口（即約七至八萬人）喪生。人類會做出這
種事，但大地仍長出花朵來與人類再建立聯繫。大地

要傳遞的說話是否「多謝」呢？這就留待大家去想一想吧。

你們有否聽過一首名為《憂鬱的星期天》(Gloomy Sunday)⁴的歌呢？這首歌在1933年由一位匈牙利(Hungary)的作曲家所創作。那時，世界瀕臨第二次大戰，即廣島原子彈爆發前十多年，整個歐洲氣氛凝重，特別是匈牙利遭受德國的侵略，人們生活艱苦。有謠傳說每當有人聽過這首歌後便會自殺，故此電台禁播這首歌。事實上，可能是那些人本來已有自殺的念頭，只不過想找這首歌來陪送自己最後一程而已。又抑或是真的聽過後便想去自殺呢？那就不得而知。

1914年，流傳一個聖誕休戰的故事。那時德軍和英、法雙方在比利時(Belgium)對戰。一個聖誕節的晚上，緣故不明，德方有人唱起聖誕歌，法方接着有人回應。後來，對戰雙方軍人紛紛放下武器，跑上戰場，大家相遇，彼此擁抱，訴說對家人的思念，甚至比賽起足球來。可惜，兩國迅即發出軍令遏止，浪漫時光迅即消逝。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在該年爆發，這些

⁴《憂鬱的星期天》(英語：Gloomy Sunday，匈牙利語：Szomorú Vasárnap)，也譯作《黑色的星期天》，是匈牙利自學成才的作曲家萊索·塞萊什(Rezső Seress, 1899—1968年)譜寫於1933年的一支歌曲。

互為敵人的軍人在聖誕夜相互撫慰後，第二天早晨便要開槍殺戮。這場大戰中，有超過三千五百萬人在戰爭中傷亡，死者中包括一千萬個士兵和七百萬個平民。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的傷亡人數更高達六千五百萬，是前者的一倍。

人類本身究竟在做甚麼呢？有甚麼令人不能放過對方，要互相毀滅呢？這是人類要深思的問題。我們知道人生是有困難的，難道為了解決自身的困難，便要摧毀別人的生命及財產嗎？

現在，進入另一則故事。曹雪芹的《石頭記》提及女媧煉石補青天之傳說，女媧要用頑固的石頭補有靈氣的青天，遂煉石以通其靈性，生其靈氣。女媧煉了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石後，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石，剩下一塊。她把那一塊石放到無稽崖的青埂峰下，普通話的諧音是「情根峰」。通了靈的石頭，就是情根。打從人有了「情」這東西後，便自覺到自身的存在，且產生很多負面情緒。這則神話令人想到聖經中蛇對女人說：「你們吃這個果子，便可以知道善和惡。」女人吃了禁果，也給亞當吃。這是對於人類痛苦的兩種不同說法：一是煉石通靈性知曉世間情，二是吃禁果知道善與惡。

猶太精神病學家弗蘭克(Frankl)⁵在集中營內度過三年，於 1945 年獲美軍解放。他遂寫了一本著名的書，名為《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⁶)。他說當人因受難而尋找到意義時，受難也不再是受難了。倘若生命有意義，受難亦必定有意義，因為生命的意義會使受難變得有意義；而當受難有意義時，受難本身已再非受難了。他嘗試從不同的層次了解人性。例如，在集中營內有一個年輕的女人知道自己將快死，便跟弗蘭克說：「我很感謝命運給我這麼沉重的打擊」，她指向監獄窗外唯一可見的樹枝說：「這是經常與我交談的樹」。弗蘭克就問她那一株樹有否回應她，她回答說：「有，它對我說：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我是生命、永恆的生命。」

現在，讓大家感悟一下紀伯倫的《痛苦》：

⁵ 維克多·弗蘭克 (Viktor Emil Frankl 1905.03.26—1997.09.02) 猶太籍精神學家，曾住過納粹期間的集中營。

⁶ “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譯「活出意義來」，本書記述他如何在慘絕人寰的遭遇中，找出人生的意義來。

《痛苦》—紀伯倫

你的痛苦只過是
你在衝破那包裹着靈性的硬殼。
果仁要出了殼才能享受陽光，
同樣你要有了痛苦才了解痛苦。
若你的心能驚嘆神奇的日常生活，
你的痛苦就會與快樂一樣的神奇。
若你習慣接受田野四季的變換，
便也會習慣心靈的四季變換。
痛苦的原因你自己也有份兒。
痛苦是你內心的醫生
為治癒病痛所設下的一味苦藥。
請信任這位醫生，
而平靜地喝下這劑苦藥吧。
他雖然出手凌厲，
但指引他的卻是
一隻看不見的溫柔之手。

以下，給大家看一些圖片：2012年十五歲的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 1997-)。1993年的蘇丹(Sudan)饑荒。1994年的盧旺達(Rwanda)與烏干達(Uganda)的衝。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囚犯 16670 號的殉道者聖高比(St. Maximilian Mary Kolbe, 1894-

1941)。1968 年的布拉格(Prague)之春⁷，前蘇聯(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坦克鎮壓捷克(Czechoslovakia)要求民主的人士。1990 年柏林(Berlin)圍牆，分割東柏林和西柏林。1517 年馬丁路得(Martin Luther, 1483-1546)宣佈要宗教改革的論壇。1431 年聖女貞德(Saint Joan of Arc, 1412-1431)被燒死在木架上。比利時聖達米盎神父(Father Damien, 1840-1889)因服務痲瘋病人，染上痲瘋病致死。比利時人雷鳴遠(Vincent Lebbe, 1877-1940)改入中國籍，並於抗日時救治中國的平民。龔自珍於 1839 年辭官時寫下了《己亥雜詩》，當中有著名的一句：「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最後，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 1900-1944)的《小王子》一書。

回到前文，煉石補天的石頭通天地之靈氣；而蛇則令人曉得善與惡，然後知道痛苦，再繼而了解人生。相對《小王子》中的蛇，小王子被它噬後，放下自己在地球上的身軀，回歸自己的星球去。究竟我們要如何擺脫人生的苦難呢？究竟那是苦難還是慈悲呢？抑或是人生的道路呢？

⁷ 布拉格之春是 1968 年 1 月 5 日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這場運動直到當年 8 月 20 日，蘇聯及華約成員國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才告終。

《苦難與慈悲》的回應

阮美賢博士

聽過夏神父分享不同時代的人物和事件如何看慈悲和憐憫，給我許多反思，亦有所感動。剛才播放的那些片段，曾幾何時我也看過，如今又再增添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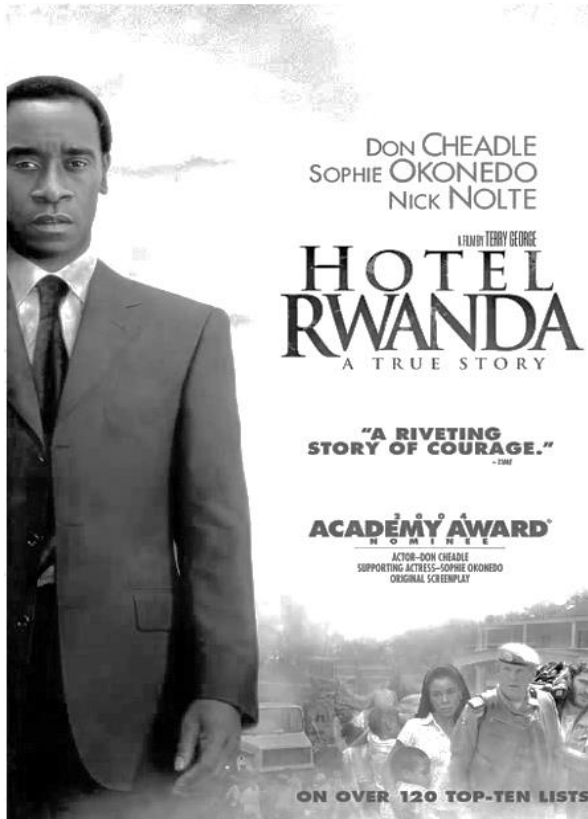
從盧旺達談起

這個世界在不同時代發生的事件，特別是暴力或戰爭，如世界大戰、原爆和一些非洲國家的屠殺，都為人帶來不少苦難，像在 1994 年的盧旺達大屠殺，迄今已逾二十載。本來，我沒有太留意那件事。有一位導演把它攝製成一齣名為《盧旺達大酒店》⁸的電影，由於我對該電影故事的歷史背景不太認識，便去找資料試圖了解那是甚麼的一回事及為何會引發大屠

⁸ 《盧旺達飯店》（英語：Hotel Rwanda）是一部英國、南非、加拿大、意大利於 2004 年共同拍攝的電影。

殺。原來，在盧旺達有兩個族群，一個是佔少數人口的圖西族(Tutsis)，另一個是佔大多數的胡圖族(Hutu)。兩族最初相處融洽，但後來衝突發生，胡圖族大肆屠殺圖西族人。當時的新聞亦有報導此事件。那齣電影講述胡圖族酒店經理如何在種族仇恨中，仍奮力拯救千多個圖西族人和胡圖族的難民。

據該電影的導演說，當時的新聞報導未有引起社



會的關注，亦沒有像其他事件般獲得外國或聯合國的介入，他便質疑是否非洲人的生命不及歐美等西方國家的寶貴，這番話給我留下很大的迴響。於是他抱着這個疑問，拍了那齣電影。電影中一群西方人在別墅得知這暴力的消息後，若無其事，只當作一則普通不過的新聞，並沒有任何採取行動。不知大家日常看見關於戰爭、暴力的新聞時，是否只當作一件平常事去看待呢？還是，那些事件能夠觸動你的心靈呢？或許有些人會認為這類事件比比皆是，已經感到麻木或疏離，且欠缺動力回應那些不人道的事件。那齣電影把當年在盧旺達不堪入目的狀況重現眼前，包括在種族屠殺後屍體滿佈的街景，人們要踐踏屍體才能越過街道的恐怖場面。怎樣去轉化心中的不安，成為給予受害者的一份關心或一把幫助呢？正是當時我所思考的問題。

幾年後，我到美國讀書，接觸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當中有一位來自盧旺達。在神學課堂中，我們會分享母國的生活經驗，然後做倫理或神學的反省。班中那位盧旺達的同學，是一位耶穌會士，他說自己雖然未曾親身經歷那場大屠殺，但得悉事件後。他決意效法南非，設立了一個委員會主責和解工作，且透

過經驗分享探究各種族之間和平共處的可能性，冀望有效地調停及和解。當時我聽到那位同學的分享，覺得要修和可真不易。怎能在經歷了殘暴和血腥之後，仍能原諒對方呢？對我們來說，這是難以理解的。由於他們萬般不願永遠生活在傷痛和仇恨之中，所以有些人願意原諒對方。透過那齣電影和當地人的分享，幫助了我反思：當我們知道一些發生在遠方的非人道事件，如何使自己受感動，從而願意以關心的態度了解當地人，並用適當的行動表達關心和支持呢？

用心去看《小王子》

剛才神父分享《小王子》的故事。相信很多人也看過這本書吧。我打從十多歲起，已讀過了許多遍。早前，看到神父的講稿後，我便從書架中翻出一本在1994年買的《小王子》，現在想跟大家分享當中比較觸動的片段。書中有一句難忘的說話：「只有用心看，才看得清楚；最重要的東西，眼睛是看不見的」。我妹妹知道我喜歡此書，曾經把這句說話製成書籤贈與。我們更會在閱讀後互相交流心得。

我們透過不同的媒體知道其他地方發生的苦難（如盧旺達事件），但我們用眼睛還是用心去看，會

影響我們對該事件的反應。《小王子》中的那句話，指出我們要用心去看事情，才能看到箇中的意義。

最近，我重看這本書，並作反省。中文大學的周保松博士剛編寫了一本名為《小王子的領悟》的書。他用哲學的角度領悟小王子的故事。書中有些說話引人共鳴及反思，他說：「小王子之所以了不起，是因為他遊歷許多星球，遇上各種奇人奇事，之後他會反思，明白到地球上有些人眷戀權力、財富，或自以為了不起。雖然小王子看盡了人生百態，但仍然童心未泯，不會因為見盡世情而變得老練世故。」

在周保松的眼中，小王子不市儈、不世故、不計較，但很率直、善良、好奇、信任別人，敢於馴服（例如：故事中他馴服了一隻狐狸），且對天地萬物抱有一份坦然溫柔的情感。倘若我們能分享到小王子的童心，每看到世上的苦難或美事時，能生起深刻的感受，那麼便不會因遇上社會上市儈的人而同流合污。那麼，究竟如何保持那份童心呢？這裏引用周保松所寫：「童真地活着……是人生一場不懈的修行。修行裏面，需要我們對社會、對自我有深刻的認識，對甚麼構成生命重要之事有認真的思索，也需要我們有實行信念的勇氣。」

據我所知，周博士沒有宗教信仰，但有自己的修行。我是天主教徒，相信在座中亦有宗教信仰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時候會做修行，即天主教所稱的靈修。我們就是透過修行的實踐或鍛鍊來認識自己、社會及其他人，和明白天主創造我們的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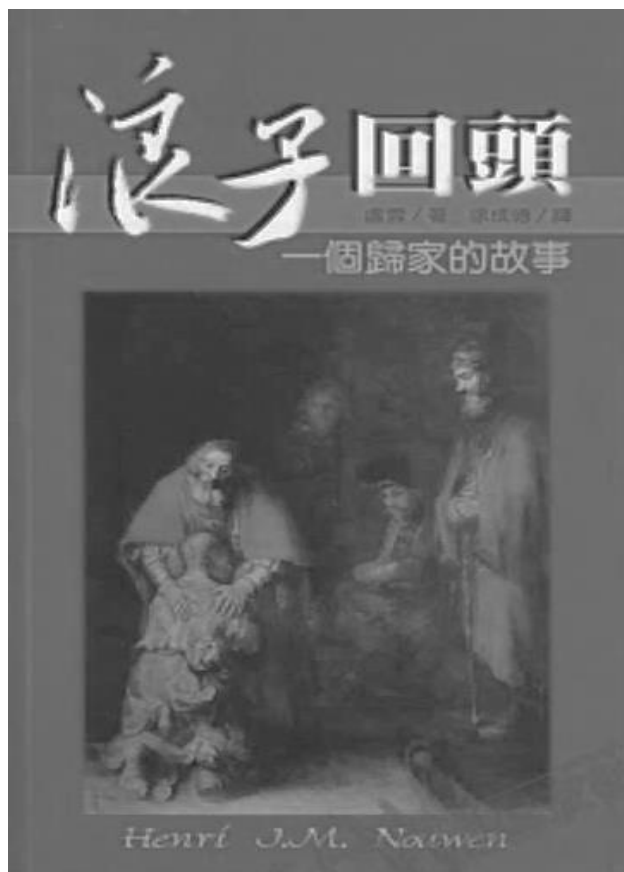
看到別人身上的苦難時，我們會問如果發生在自己身上，那怎樣去面對呢？倘若發生在別人身上，我們又可否有些事去消除或減輕他人的苦難呢？實踐是需要勇氣的，因為如果那是一件跟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不一致的事情時，便要逆流而上。我們如何去面對那些市儈、權力慾旺盛、貪戀財富的人，而不同流合污，且保留自己的童心呢？這需要我們不斷地去修行和反省自己可以給他人做些甚麼。

長子還是幼子？

夏神父提及林布蘭的浪子回頭的畫品，令我想起盧雲(Father Henri Nouwen, 1932-1996)寫的一本書。約在十、二十多年前，我參與一個定期聚會的信仰小組，會中大家一起閱讀。就在當時我看過這本書。盧雲就是看過這幅畫後，查看林布蘭的創作初衷，繼而把畫家的生平、浪子的故事和自己的經歷三

者作出對比。盧雲從自己的感受，反思自己與故事中兩位兒子的相似之處，即他是故事中的長子還是幼子，最終抒寫成書。我從書中認識到這幅名畫，也思索自己是故事中的長子或是幼子的問題，且一度感觸落淚。

盧雲神父表示自己經過反思得到很大的領悟。相信大家知道他是一位知名的學者和靈修大師，曾任教



於劍橋大學及哈佛大學，教授靈修、神學、牧民神學和教會群體牧養。他在自傳中提及當他教授這些課題時，心中有無比孤獨且苦痛。看過浪子回頭的故事後，他反問自己，人生究竟要追求甚麼呢？雖然他教導人要追尋人性且行事要謙卑，但自己卻在大學任職時不斷地往上爬。他反省自己究竟在追求甚麼。是權力地位嗎？還是謙卑和靈性的修行？最終，他辭却教職，選擇照顧一群中度至嚴重智障人士，把團體名為「方舟團體」，並出任團體神師。

盧雲神父因着浪子回頭的故事看到了天主的慈悲。作為一個滿腹經綸的學者，他毅然放棄一切，走進一群被視為毫無學識且能力薄弱的人當中。他從這些人身上體驗和學習到天主的愛。他問自己為何要到方舟團體服務呢？團體邀請他時，他表示希望能擔負起父親的角色，分享他的愛。

以天主的慈悲為主題去反省，我發現自己有時候也會像故事中的幼子，不懂珍惜天主所賜予的，但亦有時如長子般自以為是，認為那些不懂珍惜天主恩賜而誤入歧途的人是不值得天主關心和眷顧。我們要嚴厲地對待那些人嗎？還是要像天主懷着慈悲去寬恕他

們，或甚至與他們同行呢？這些問題都給了我自省的好機會。

競爭還是慈悲？

接着，我會分享一則關於盧雲的小故事。大家看，這是一枝鉛筆。為甚麼我要拿一枝鉛筆出來呢？鉛筆有甚麼特點呢？一枝長長的鉛筆，它的大部分是可以用作書寫的鉛芯，而末端的橡皮膠只佔筆的很少部分。我看過一篇盧雲神父學生寫的文章，當中分享盧雲在課堂上說過的鉛筆故事。原來，盧雲曾做過一個研究，訪問知名人士或領袖，關於他們如何看慈悲和憐憫／同情(compassion)。當時，有一位美國參議員分享了一個鉛筆的故事：

看，這枝鉛筆有長長筆幹的部分，像我國家的主流價值觀，即是競爭(competition)。大部分人都講求競爭力，因為競爭對於我們很重要。在競爭文化下，自然有人會被淘汰。有人因追不上競爭而成為弱勢的一群，便需要別人帶着憐憫和同情去關心。在競爭的主流價值觀下，我們只保留着少許的同情心，就像那筆端上丁點的橡皮膠，以彌補在競爭制度下被遺棄、忽略的感覺。

這枝鉛筆的比喻，是否代表着一個健康的社會呢？大家當然知道是不健康。但很多奉行資本主義的社會，也有近似的價值觀和主流文化。大家試想我們身處的香港社會，是否也重視競爭文化多於重視慈悲呢？

慈悲善工兩則

我在美國讀書時，認識了一位瑪莉的女士(Mary Ann Finch)，她工作於三藩市(San Francisco)的一間專為無家者提供按摩服務的外展工作中心(Care Through Touch Institute)。該外展中心平日少有到訪者，因為中心的義工和職員由星期一至五都要做外展工作，例如到社區中心、婦女庇護所、露宿者之家、綜合服務機構或甚至街上去服務，忙碌極了。在天主教的禮儀年曆中有四旬期，每年的聖週四有濯足禮（即記念耶穌為門徒洗腳），中心人員會到不同地方為無家者做腳部按摩。瑪莉曾來到我的神學院介紹她的中心，並招募義工在聖週四為有需者提供服務。我參加了她的工作坊，認識了她。

除了在聖週四，她在平日也會為無家者提供按摩服務，為何呢？因為無家者通常在庇護中心或街上

睡，睡眠質素欠佳，且頸膊容易疼痛。中心所提供的服務正是幫助舒緩他們的身體痛楚。按摩前我們會先跟他們作簡短傾談，查問他們不舒服之處，然後在柔和的音樂或環境下開始按摩。那是一個約二十至三十分鐘的坐式按摩，包括按摩頭部、頸和背脊。你們可以想像那些無家者罕有與人交往，更遑論有人會跟他們有身體接觸，他們都視之為一份禮物，非常珍惜。

我在該中心服務了幾年，跟隨職員和八至十位義工到不同地方為貧窮、邊緣人士提供按摩服務。我到過兩個地方，一個是位於三藩市的田德農綜合社區中心（Tenderloin Self-help Centre），另一個是聖堂（St. Boniface's Church）。那間聖堂推出一個計劃（名為 Gubbio project），從晚上至第二天早上開放聖堂給無家者在長椅或空地上休息，到了中午或下午他們便會離去，讓聖堂舉行彌撒。

瑪莉曾在一間耶穌會神學院修讀碩士課程，而她的論文正是結合按摩服務和靈修，以帶出牧民服務。完成論文後，她便建立了那間按摩服務中心。她的靈修和服務工作建基於天主教信仰，加上她所接觸的冥想和佛教的修行方式，揉合了佛教和基督宗教。她強調不論是甚麼宗教，都應有慈悲心。

另一個例子，她是我在二十多年前認識的紀愛恩修女(Sister Ann Gray)，來自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Columban sisters)，現已返回愛爾蘭會院出任會長。從前在香港服務時，紀修女很關心社會正義，曾任國際特赦組織的執委會成員，致力爭取人權，特別是宗教自由權利。在九十年代，她可謂是先鋒，發展了一個專為性工作者的服務，名為「青鳥」。那時候，沒有甚麼人從事這種服務，至今已經設有多於一個服務性工作者的團體。

當年，她的修會經過研究後發現女性的性工作者在社會中被忽略，於是嘗試開展一些為她們而設的服務。紀修女主動接觸並為她們提供各種服務。她又聯同瑪利諾修女溫喜蓮(Sister Helene O'Sullivan)及一些義工擴大尋求協作。後來，紀修女更前往菲律賓參加一個為期半年的課程，了解如何提供服務給性工作者。「青鳥」在油麻地、尖沙咀、深水埗一帶的酒吧或街頭給招攬客人的性工作者介紹相關健康知識。

我曾在「青鳥」做過幾年義工，認識了紀修女。教友會對他們的服務不甚了解而提出一些疑問，像是為何要向她們提供服務，例如派避孕套，那不是違反教義嗎？因此，紀修女會到堂區去分享「青鳥」服務

的理念，讓人明白那群受忽略或甚至壓迫的婦女也擁有人性尊嚴和應該受尊重。她的團體亦提供一個空間給那些婦女聚腳彼此分享。紀修女本着信仰而發展該服務，可說是一份慈悲善工。她已不在該中心服務，工作由社工接手，不再是宗教背景的社會服務團體。

慈悲與正義：一體兩面

剛才說過有關慈悲、痛苦的經驗，即從苦難到慈悲心，進而用正義的原則關心受迫害、受忽略的人。天主教傳統蘊含了精辟的教導，供我們參考。在此引用幾段如下：

中世紀的神學家亞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如何看慈悲呢？他說慈悲是出於憐憫，即對別人的不幸產生憐憫之心。慈悲是一項美德，因我們視別人的苦難為自己的苦難。慈悲也是感受到他人痛苦之能力，它可以透過理性思辨找出合適的回應方法，減輕對方的苦楚，故慈悲亦是一種利他和對外的態度，即對別人產生同情心，而催逼我們實踐善行。

為何我們的教會認為慈悲是重要的，教宗更頒布慈悲特殊禧年呢？因為慈悲是耶穌基督的命令。聖經有兩段經文特別指出這個命令，其一是慈善的撒瑪黎

雅人的故事⁹。撒瑪黎雅人在當時被視為外邦人，即是被邊緣化的人。故事提及一個被人打得遍體鱗傷的人倒臥在地上，有兩個宗教人士經過也沒理會他，直至有一個撒瑪黎雅人經過，他才被救起。雖然撒瑪黎雅人和遇害的人在民族情感上是敵人，但他有憐憫的心關心對方。耶穌用這個故事提出誰是我們的近人的問題。原來，幫助別人的人便是近人，即是故事中的那個撒瑪黎雅人。耶穌用這個故事叫我們仿效他。另一個聖經故事是《瑪竇福音》的最後審判和我們如何可以進入天國的故事。那段經文表達了我們要具體的關心那些沒衣服穿用、沒水喝或是失自由在囚的人，方可進入天國。¹⁰這兩個故事告訴我們，耶穌給我們的最大誠命就是愛主和愛人，而天主的本質正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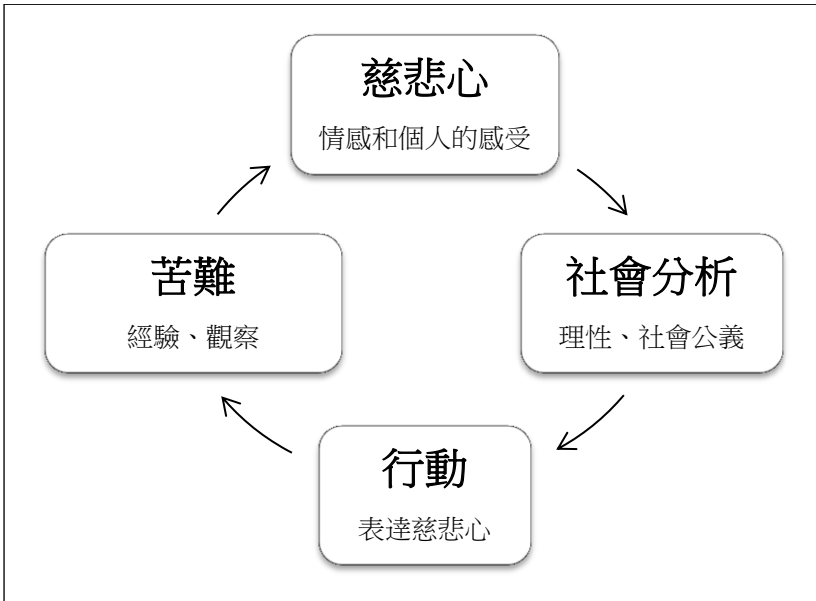
我們強調慈悲應該作為一種美德，即透過自己與別人建立一份關係，並堅決地承諾我們願意持續地與人分享一顆慈悲心。解放神學家索本諾¹¹(John Sobrino, 1938-)是一位耶穌會神父，他特別指出耶穌的一生是以慈悲作為生命的指導原則。祂的一生承擔

⁹ 路加福音第十章 25-37 節。

¹⁰ 原文「我們有沒有給饑者食、渴者飲、裸者衣、花時間陪伴病人及坐監的人」(參瑪 25:31-45)

¹¹ 索本諾 Sobrino, Jon (1938-)西裔薩爾瓦多解放神學家、耶穌會會士。致力於將傳統信仰與社會的貧窮人結合，為傳統神學帶來新視野。著有《十字路上的基督論》(Christology at the Crossroads, 1978)、《在拉丁美洲的耶穌》(Jesús en America Latina, 1982)、《解放者耶穌基督》(Jesucristo liberador, 1991)等。

痛苦，目的是驅除苦痛的根源，並改變不正義的制度，成了教會的標記。許多人認為慈悲是關顧人的需要，這也是對的。但作為解放神學家，他把慈悲放進社會脈絡中解釋，即我們要關心一些社會結構性的問題，目的是從根源改變不公平的制度。故此，我們可以把慈悲與正義看作一體兩面。事實上，慈悲和正義有很多相似之處，兩者均關心弱者及有需要的人。正義會從公正、合理角度對待人，特別從理性角度來找出問題的根源；慈悲則多從感性的、同理心的角度，看誰有需要而施予援手。故此慈悲與正義有同有異。最後，請參看這張圖：



我們有許多不同的社會經驗，有的是親身經驗過，也有的只憑觀察。看到別人遇上苦難時，一般人都發慈悲心，即從感情的角度出發，而產生同理心。我們亦會進一步問怎樣可以幫助那些人，因為有些情況需要我們即時施以援手，有些則可能需要我們從社會公義與理性的角度表達關心。如果我們結合慈悲心和正義感，便會產生勇氣和動力，面對及回應社會上的不同苦難。這是很值得我們繼續去思考和反省。

與聽眾互動

（眾 = 聽眾、夏 = 夏其龍）

眾：我想起一首由林振強填詞，太極樂隊主唱的歌《一切為何》。歌的前段內容提到很多苦難，其中一句是「香檳側邊太多肚餓」，到結尾是無可奈何。「遇到苦難或痛苦，人感到無奈。」我想若是換上另一個填詞人，不知那首歌會有何不同呢？倘若是朱凱迪填詞，他會拼命地揭發不公義嗎？又或是由梁天琦填詞，那種無奈或會轉換為用磚塊和火表達不滿，以求取公義嗎？要維持社會公義，有時候可能要有他們的鬥志。梁天琦被捕不久釋放出來，第一件事就是關心他的數十位同伴，我會把此看作慈悲。剛才，夏神父和阮博士可能說得很遠，如世界大戰等。現今的苦難，像在北韓，整個國家因一個人而受苦受難；又像現今的土耳其總統，在政變失敗後，將三萬名獄囚放出，企圖把他的四萬個政敵收入獄。我想或許這一幕也可能會在香港發生，即有一天把赤柱監獄囚犯釋放出來，再把政敵收進去。

夏：假若有多些慈悲，是否就可以有少些苦難？我想

苦難的來源是在於石頭之能夠通靈。未通靈則平安無事，因為做石頭不會感痛、不會有苦難。你由石頭變成有靈性的人，便產生痛苦。身體本身會給予痛苦，而你亦會從別人身上看到苦難。所以，我相信痛苦會一直存在，但慈悲是一個方法，它能让痛苦的人去接受和施與。「當你飲水的時候，你會發現水也在吮飲着你。」當你經歷痛苦，然後接受痛苦，繼而使痛苦有意義時，那痛苦已不再是痛苦了。

眾：常言道中國是一個苦難的民族。我們從小在家或受歷史的教導，影響我們用逆來順受的態度來處理苦難，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像幾天前發生一宗車禍，一輛小巴士撞傷一名修路工人後逃之夭夭，肇事司機至今仍未現身。我驚訝的是他撞傷了人，怎麼沒有下車救援？怎麼可以對傷者毫不理會呢？那份憐憫與慈悲之心，實應從教育開始。那我就想問，香港或中國人的教育制度如何教人從小就有慈悲心呢？

眾：我覺得慈悲是一個感覺，亦不須去教育，而是在自己的生活過程內慢慢衍生。當你為人父，便會知道父親有何感受。事實上，所謂慈悲、苦難等

都是由愛開始，當你愛身邊的人，便會懂得慈悲。有很多東西是要我們慢慢地感覺，而非立時三刻可以明白。父子親情其實是自然不過的事，像剛才所說浪子歸家的故事，那個父親走出去迎接兒子歸家，正因為他愛自己的兒子。

關於情性和理性，我常聽到朋友說要教育下一代甚麼是對與錯。從經濟角度看，情性其實是一個成本；假如我在機構內工作時只講情性，我會被拉倒下來。至於理性，香港是以金錢掛帥的經濟及商業城市，大家亦以此為傲。我從中文大學修得的經濟和工商知識，亦是關乎金錢。然而，愛是要犧牲的。舉例來說，我愛我的兒子，便會傾盡家財支助幫他買樓。你問為何會如此，這實在難解釋。我沒有宗教信仰，但也會由愛去想。若每個人都喜歡他身邊的人，那麼，許多小圈子合併後便成為一個大圈子，一個大愛就會產生。

夏：讓我來講一則小故事來結束今天的講座。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我年輕時很頑皮，常被媽媽用帆布棍打，打得我瑟縮床下，心想着：「爸爸回家時，妳便糟糕！」。我重覆地想：「妳真不好。爸爸很疼我，他回來時，你便

糟糕了！」結果，甚麼都沒有發生，而我的痛卻也消失了。另一次，媽媽胃痛極了，吩咐姐姐去買鴉片，用此方法來止痛。那時，我們住在元朗，真不曉得她如何知道哪裏可以買到。我記不清楚她的其他痛楚經驗，但那一次她的苦痛，留給了我深刻的印象。

誠然，人生有苦痛，生命本身是有痛楚和苦難。人使用任何方法減低痛苦，有的用鴉片減輕身體的痛楚，有的卻用戰爭消除自己的痛苦，同時把苦痛加諸於別人身上。這涉及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我們所講的施與，即人本身如何去面對施與，及如何去給予。當中包括你給予多少？付出甚麼？方法如何？能否施與？至使接受者也讓你自己感到有一個需要，而這一個需要亦令你自己變成一個需要。我覺得這或許是一個最高的境界。記得我在晉鐸成為神父後，曾對當時的李宏基主教說，避靜為我是一個境界，他就問：「甚麼為之一個境界。」他固然有他的看法，而我會覺得做人的境界之一，就是能夠達到完全的施與。若能如此，施與便會變成英文所謂的 *forgive*，而這個 *forgive*，正是慈悲。

第二講

說了再見以後——家庭中的慈悲

主講：潘婉玲

善牧會轄下院舍院長

回應：甘寶維

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主席

《說了再見以後 —— 家庭中的慈悲》

潘婉玲

我的工作是服務一群高危的女孩子，迄今已十年了。這群女孩子需要社會人士的更多關注及關心，故此我來到這裡給大家分享我所看到及了解到的現況。

孤寂與疏離

善牧會的修女曾給我們講解慈悲特殊禧年徽號的意思。其中一樣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圖像中的耶穌背着亞當，二人共有三隻眼睛。左面是亞當的眼睛，右面是耶穌的眼睛，中間是亞當和耶穌共有的眼睛。希望在今日的分享中，大家都能用同一隻「中間的眼睛」感受、體驗這個過程。我將會分享關於一群女孩子不愉快及傷痛的經歷，但我的目的不是要大家憐憫她們，而是希望透過分享，用超性的眼光，重新檢視那些女孩的人生經歷。以慈悲的心了解她們，你們便

會有不同的看法。事實上，我們很需要你們的明白和支持。



善牧會是一個法國女修會。該會在香港設有三所女童院舍，以及兩所提供給有家庭問題及較年長的女青年宿舍。此外，另有一間特殊學校。我們中心在政府的編制內是一間女童院，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十二至十六歲和有嚴重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女孩子。我們的女孩子大部分都是經過法庭判決才進入院舍。這些女童很多都不情願，態度表現抗拒。現時我們有九十名學生，當中有三十六名在日間學校就讀。

為了記念第一位創辦人丁修女(Sister Mary Francis Flinn)，我們中心有一座聖方濟各 (St. Francis)聖像，並在會議室內掛上一幅她的紀念照片。我們常告訴孩子關於她用鋤頭為院舍做護土工程

的故事：那時候，丁修女已七十多歲高齡，每天起床後，她就在院舍的斜坡刨挖泥土、栽種樹木。她知道院舍有很多危險的斜坡，隨時會造成坍塌，故她把握在世的時日，鏗而不捨地種植護土的樹木。最初我們還不明白她的用心，直到她離世後，大家才知曉。

「我可不可以憎恨你們？」

進入我們院舍的孩子，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她們有一雙抗拒接近人的眼神。那眼神反映她們內心的孤寂及疏離，這就是在院舍內一般青少年的模樣。

這裏有一封信，原文頗長，我只讀出部分幾句：「你們在吵架嗎？很嘈吵！」「每晚我哭得很厲害！」「我討厭再回家，我可否憎恨你們？」對這三行文字，你們能理解多少呢？請留意這句說話：「我可否憎恨你們？」憎恨別人時還要問自己是否可以恨對方，令人不勝唏噓！憎恨卻又不能恨，為何這個孩子會處於這種狀態呢？

父母離異前

甚麼是家庭？家庭給人有安樂的、整潔的印象，且有傭人照顧小孩子，那就是快樂的家庭。家庭可以

是甚麼都沒有，但亦可以包含很多東西，那些會是甚麼呢？是擁抱、連繫和臨在。對孩子來說，這三個元素構成一個真正的家。經常有人說，一家人爭吵過後就沒事，因為家人永遠都是家人。我相信這是對的，但這永遠是對的嗎？在不同情況也都是對的嗎？

我們的女孩子出生的家庭談不上真正的家，父母之間存在仇恨。有一個女生經常聽到屋內有很多嘈吵聲，心中常問「你們在吵架嗎？」她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心中只是害怕。每一個晚上，她都抱頭哭泣，不能安睡。我們接觸很多女孩子，親眼目睹過家庭暴力，如父母互相毆打、拋擲東西、持刀傷害對方，卻只能無助地眼睜睜地看着事情發生。

另一個孩子曾寫下：「我出事的時候，誰會在我的身邊呢？」「我不會原諒你們，我寧願死也不要看到你們。」你可否從在字裡行間領會到她的心情呢？她不是說沒有房屋或沒有家傭服侍，而是疑惑地問究竟父母在哪裏呢？有事情發生，身邊卻空無一人！父母離婚不是一天的事情，而是一個過程。怎樣的過程呢？那是一段長時間醞釀着鬥爭和仇恨，雙方的心力全都投放在惡劣關係中，而非於孩子的身上。打從鬧離婚開始，孩子已受到父母離異的影響。

仔細地嚼這兩句話「我不會原諒你們」，「我寧願死，也不要你們」。想一想，如果人的成長是為建立自我，那麼自殺不就是毀掉自我嗎？她寧願捨棄自己，也不要家人，這是一種玉石俱焚的想法。這想法亦是相當矛盾的，因為她既想離開，卻又離不開；寧願放棄自己，也不願跟家人在一起。但是，若她真的想離父母而去，毋須刻意地說，大不了一走了之。這女孩子真正要表達的是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消失。女孩子常處於一種又愛又恨的情感中，身陷囹圄。對於十二、三歲的孩子來說，實在沉重非常。

父母在辦理離婚時，雙方經常築起圍牆。像在戰場上交戰一樣，他們首先會招兵買馬，爭奪孩子到自己身邊。假如家中只有一個孩子，父母的爭奪會變得更厲害，情況更惡劣。父母之間的拉扯，往往是挑戰孩子對他們的忠誠。對孩子來說，父親和母親均是同一把根，像一棵樹木怎能離開它的根呢？不論根長成怎樣，也沒有辦法離開這一把根。當父母要求小孩子選擇跟隨誰，或在孩子面前互相攻擊對方的不是時，他們就是在拉鋸着孩子與父母的那一把根。

在離婚過程中，很多父母只專注於鬥爭，或盤算討好或爭奪孩子的策略，以至忽略了孩子的內心想法

及感受。於是，孩子便開始懷疑父母是否真正愛自己，抑或懷疑自己只是他們互相爭奪的工具。有一點值得思考：小朋友的不信任從何而來？不是因父母打過罵過，而是心中感到不真實。這一刻父母表示疼愛他們，但另一刻卻又把孩子推向窗邊，嚷着要一同往下跳。孩子會問「你真的愛我嗎？」這一句說話絕對是有意思的。

父母離異後

離婚後，是否一切都會完結呢？故事就此可以劃上句號嗎？大家居住在不同的屋簷下，就不會再有拉扯嗎？依據我們的經驗，離婚前的家庭狀況惡劣，離婚後也不會平息，只是另一場續集的開始，劇情更高潮迭起。

在父母離婚的過程中，孩子會經歷幾個不同的階段。這當然涉及不同的學說，但我今天不會講理論，只用簡單方法來解釋。我想指出這些哀傷期、悲傷期，不是可以清清楚楚地劃分開來的，而是重疊且互相交織。很多受嚴重情緒困擾、有嚴重行為問題的高危孩子，糾纏着哀傷、難過、憂鬱、憤怒以及對未來的恐懼。內心的種種掙扎和痛苦，會透過許多問題行

為表露出來。這樣的觀點是來自本人從事家庭婚姻輔導和防止虐兒的工作經驗。在我處理離婚個案時，看過夫妻二人由不再相愛到互相仇恨，亦見過本來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會出現三個「孩子」——即父母的表現猶如孩子，在情感上互相打鬥，一個家庭內完全沒有成年人。

離婚的一刻並非事情的終結。在某一天，父或母突然消失，搬到外面居住；或是孩子發現自己要往別的地方或完全陌生的院舍去住，一切都撲朔迷離。離婚，即時剪斷孩子與家人的連結，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剎那。比如說我走進熟識的中文大學，但如果在幽靜的晚上要我從幽暗的角落尋找出路，我會害怕得不知所措。成年人也如是，更何況是小孩子呢？因為小孩不知未來發生甚麼事情。像我有一個生於內地的學生，因家庭出現變化而被帶來香港，一夜之間，又被送往完全陌生的兒童院或親戚家裏去住，加上鄉音的隔閡，使他與別人溝通不來。另外一些學生在年幼時父母離婚，其後父母一方離開，她們便與另一方相依為命，過着單親的家庭生活。幾年過後，又為了某些原因，孩子又轉移到另一方的父或母家中去生活。這麼說來，這些小朋友的根（一棵樹的根）是完全被折

斷了。這個小孩子怎麼可以馬上適應這個新的地方呢？他又怎麼不會頑皮、不抓狂呢？這是可以理解的事。所以，怎樣在父母的離婚過程中保護孩子的根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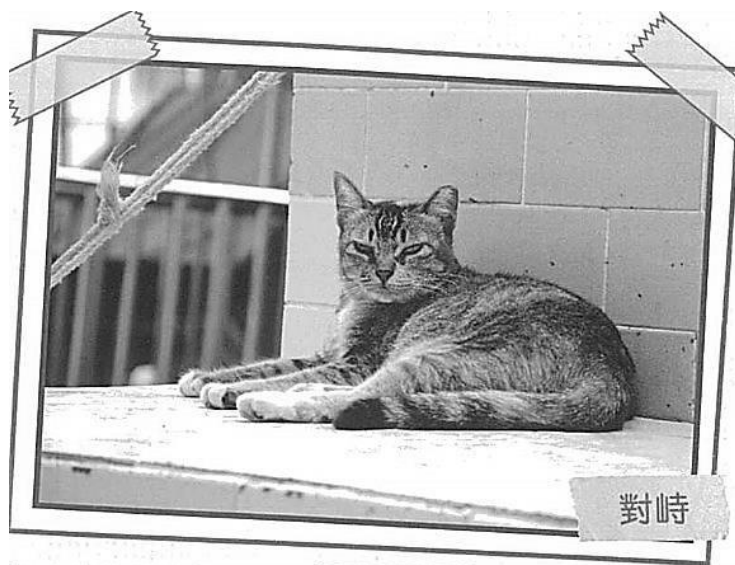
父母離異的視覺投射

我們的學生上攝影班拍了一組照片，說不上是藝術治療，但從照片中可以看到她們的想法和感受。有一張照片名為《你的決定》，它的重點是家庭中缺少了一名成員；第二張照片的取材是一隻貓兒，標題為《對峙》，這有別於一般學員以《可愛的小貓兒》之類作標題；另一張照片的標題為《同一陣線》，取材是龍船花，但跟同一陣線有何關係呢？這一張照片令人聯想到孩子與單親共同面對家人突然離開的心理狀態。又有一張照片名為《無形的“你”》，只見鞋子一雙。這一張是《遺留；遺忘》，它的構圖雖美且具藝術感，但附加的說明表達了孩子內心的孤單寂寞。還有一張名為《虛假？真實？》，孩子似乎在問：已離開的家長帶着一張笑臉和含笑的嘴臉回家時，這究竟是虛假？還是真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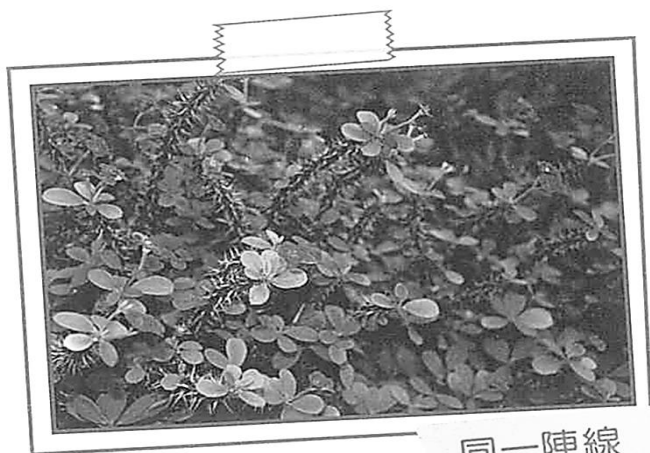
你的決定。

標題：你的決定



對峙

標題：對峙



同一陣線

標題：同一陣線



無形的“你”

標題：無形的“你”



標題：遺留：遺忘



標題：虛假？真實？

資料來源：以上六幀照片由 Dorothy（暱稱）提供。

我們有時候可以從孩子的照片習作中窺探她們的心思，那些心情都是她們不願意直接從談話表達出來的。比如說，她們百無聊賴望出窗外的靜態照片，雖然這一個姿態是平常不過的事，但從照片中玻璃窗光線的折射揭露了她們憂愁的面容。孩子背後經歷的創傷、分離及挫敗我們看不見，但從她的側身照片卻參透無遺。我常說，父母突然離開或互相撕裂，其實已經給孩子埋下寂寞的種子。

很多孩子在幼年時，父母都不在身旁而要由嫲嫲或爺爺接手照顧。從照片中見，學生將自己代入貓兒並以主題說出《我被冷落了！》。另一幀《枯萎的樹》的攝影對象是一座大廈，但焦點卻是大廈前的一株枯樹。《被冷落的風車》拍攝了玻璃窗前的風車，表露了孩子的孤寂。

一些非本港出生的孩子，不論在香港住多久，依然對這個城市難以建立感情。一幀香港夜境的照片表達了這樣的心情，標題是《感到很陌生》。即使這個孩子居住在香港已經十多年之久，心中仍然感覺疏離，這種陌生感究竟是甚麼東西呢？對這裏任何東西完全不感到連繫嗎？香港，何處可容身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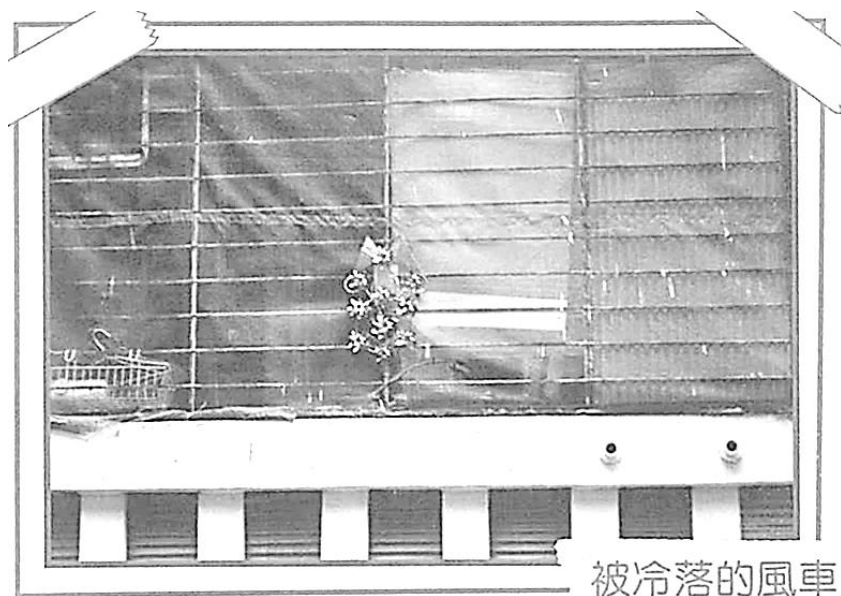
我被冷落了

標題：虛假？真實？



枯萎的樹

標題：枯萎的樹



標題：被冷落的風車

資料來源：以上三幀照片由「千禧 B」(暱稱)提供。

照片背後

父母離異會催迫孩子提早長出「成年人」的模樣來。縱使她年少，卻要獨個兒面對自己生命和整個世界，爭扎生存，這種困境迫使她化身成年人。世界之大，唯我一人！她們可以變成甚麼樣的成年人呢？

我看過這樣的一幅畫，畫中有一個合着雙眼的女孩子，佩戴着一條有鎖的頸飾。作畫的孩子告訴我，她不是用眼睛去察看人，而是用心去感受人。她在說

甚麼呢？她的意思是，不靠眼睛去判斷，除非她感受到；否則她不會想與人連結起來。他把自己鎖着的感受會是怎樣的呢？往往都是寂寞。

有一個孩子說：「花沒有花瓶會枯萎，但花瓶沒有花就不會破碎。」這句話在說甚麼呢？假如花瓶是一個家庭，花就是女孩子自己。如果家庭沒有她，仍然是一個家庭，但若她沒有家庭，她就不再是她了。這對不對呢？在離婚過程中，有時候父母會各自再組織新的家庭，結果兩個家庭都不是屬於她的，捨下孩子伶仃一人。她不再想倚靠別人，只好依靠自己。就是這樣，年紀雖小，卻快速的成長。

我們看到在父母離婚的過程中，孩子可以被徹底地擠壓成碎片。我無意批評那些父母。反而，我理解父母同樣有痛苦、分離、背叛等感受。倘若夫妻在離婚過程中情感處理不當，大家都會成為碎片。

今天我在車站等候神父駕車來接我的時候，望過對面馬路有一群中大女學生一身穿着紅色 T 恤短褲，活活潑潑，手舞足蹈。我便想起歌手克莉絲汀(Christina Aguilera)的一首歌，名為《傷害》(Hurt)。歌詞的內容教我深有感觸，令人心痛的一句歌詞是「我傷害自己，為去傷害你」(I am hurting

myself to hurt you)。這是我們大部分女孩的真實寫照。為甚麼要頑皮、吸毒、濫交呢？為甚麼要去做壞事情呢？因為「我傷害自己，為去傷害你」——儘管我很想在你的眼睛裏看到自己，我很想告訴你我多麼的憎恨你，但我做不到，因為你跟本不在這裏！

被冷落背後的希望

我們列舉了很多悲情的故事。其實，也可以轉換另一個正面的角度去看。就如我們看到一朵玫瑰花，通常我們只會留意它的刺，便感覺痛苦。雖然我們看見孩子的悲慘故事，卻不必報以憐憫的目光，因為年輕人比我們聰穎，她們懂得在轉瞬間把自己的視線從玫瑰的刺轉移到花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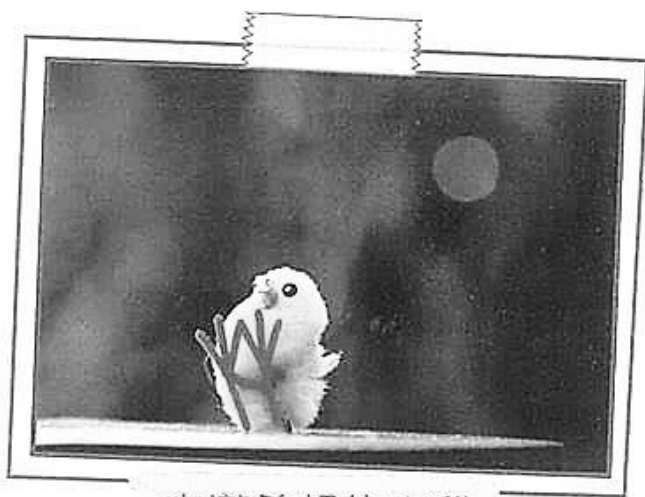
故事通常都有續集。剛才有一張照片的標題《遺留；遺忘》，這裏有另一張標題竟然叫作《盼望；希望》，真的有趣啊！除了那一輯被冷落的小貓兒和被冷落的風車的照片之外，這裏出現了《充滿希望的小雞》。其解讀是，要獨力支撐下去，即使吃力；為了生存下去，可以做自己的選擇，不斷提醒自己而努力，盡最大的力量活下去。這股生命的堅韌力就是玫瑰刺以外的花苞。對於很多苦難，我們不應只注視悲慘的

一面。那些女孩有多大？都不過是十三、四歲。她們的堅韌力會替自己找出希望和出路。



標題：盼望：希望

資料來源：由 Dorothy（暱稱）提供。



充滿希望的小雞

標題：充滿希望的小雞

資料來源：由「千禧 B」（暱稱）提供。

慈悲的種子

天主把希望的種子撒落在她們的生命沃土中，奇妙不已。假如沒有那些種子，我們做多少輔導工作也是徒然。或許有人認為輔導的影響力很大，我做了十年的輔導工作，領悟到人到某個時候一定會去找回自我，這是一種內在潛力。怎樣才能擁有這種能力呢？不是我們輔助性專業如醫生、心理學家、社工人幫到的。

這種能力可以從各方而來，但我認為最關鍵的是內心中的那一顆希望種子。作為身旁的成年人或社工，其實能幫得上的真不多。我們卑微的工作（我只代表院舍同事來說），不能改變她的命運和經歷，但有一件事仍能做得到的，就是陪伴，與其同行。我們的同行雖然不能替代她們父母的位置，但是可以給她們連繫和被保護的感覺，灌溉她們心田中的種子，助它發芽成長。

我覺得社會工作者可以做的很少，但又不容忽視。我們可以透過陪伴明白她們，這就是過程的全部，或者是目標，又或者兩者皆是。我認為那潛在的種子就是慈悲，是天父恩賜給我們的一份禮物！我在她們身上學懂一件事：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中，天父也把種子埋藏在人的心裏，讓它發芽。這是源於天父的慈悲。最後，我想用這個見解來結束這部份。不要低估年輕人的能力，雖然他們還需要我們的陪伴和鼓勵，但他們會自我探索，尋找內心的自我，一天總會領悟上主的慈悲！

《說了再見以後——家庭中的慈悲》的回應

甘寶維

耶穌拒絕罪惡，但從不拒絕罪人

剛才聆聽院長分享時，不禁想起曾接觸過的年輕人。在牧民工作上與年輕人的接觸經歷中，約二十多年前，我仍是修士時，也在院舍做過實習，逢星期六到中心與女孩子打球和傾談。記憶尤深的是她們很需要別人聆聽。縱然我是男生，她們也會跟我訴說很多事情及故事。在我接受修士訓練時，我曾在歌連臣角懲教所工作。成為神父後，再到荔枝角拘留所做監獄工作。以前接受培訓時，亦曾在協青社做過尋找邊緣青年的工作，即所謂「執仔執女」；每星期一次通宵外展，在街頭小巷到處尋找那些青年人（「執仔」）。記得有一次「執」回七個青年人，最年幼只得幾歲，令人大感詫意。

我先想談論苦難的事，世上實在有許多苦難。當

我仍是修士的時候，逢星期天都要往歌連臣角懲教所去探訪和做教導。你們猜猜在監獄會否有人來聽教導呢？有的！有些青年人感到鬱悶時便會來聽。有一次，教導的講題是《悔改》，有一位青年說：「修士，不用給我們說這些，我們是勇於認錯、但永不改過的人！」聽起來像是笑話，其實令人心傷。晉升神父後，往荔枝角拘留所做監獄工作，有時也會看見一些約十八歲以上的青少年，他們給你的感覺如何呢？可能有些人會輕易判斷他們是壞孩子，但從不去想為何他們會變成這個樣子。慈悲特殊禧年結束之際，你們又有否看過教宗的《慈悲面容》慈悲特殊禧年詔書呢？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耶穌他拒絕罪惡，但從不拒絕罪人。人的苦難就是來自拒絕。跟剛才潘院長說年輕人的苦難是缺乏關愛和被拒絕，不約而同。

另一個經驗是關於一個父母離異的孩子，生命充滿不少挑戰。小學時他曾經把東西扔出窗外到街上，結果被罰接受警司警戒。中學時他開始性情暴躁。有一次，他帶不足錢買飲料，便出手毆打一個個子矮小的學生，強搶五元十塊。這行為重蹈兩次後，對方家長報警求助。校方為避免警察踏入校門，遂要求他先

於警察到校園前離開。其後，法官判這個只得十二歲的孩子觸犯傷人及搶劫罪。這一連串的事件看似是公義、規矩和法律制度，但背後卻缺乏慈悲。這些例子都是苦難。

離婚的反思

如剛才院長所說，家庭問題是最影響現今年輕人的成長，也引發社會上許多的青少年問題。我們的牧民工作開辦過青少年慕道班，發現這群孩子有超過半數都是來自單親家庭。所謂的單親不是爸爸或媽媽過世，而是夫妻離婚。有見及此，慕道班的目的不只是教導，且關心他們。正規課程本來是一年半，也延長至最少有三年，好讓我們能足夠關顧這群孩子。

對離婚問題，神父雖然沒有接受過專業輔導訓練，只做牧民工作，但因為教友一般信任神父，所以他們很多時候都會來找神父傾談。我處理過許多各樣問題婚姻的案例，那些問題多源於男方有第三者。然而，離婚不是一刻的事情，而是一個過程。有時在輔導中，他們會講及公平不公平；在鬥爭中，他們會互相投訴對方的不對。我反思到造成離婚的原因不是單方面的問題，而是雙方的責任。儘管男方有第三者是

錯的，但當問題涉及錯綜複雜的關係時，雙方其實都要負上責任。可是，他們只懂計算誰是誰非，卻不會寬恕和慈悲。

「關係貧窮」

我想再分享多些牧民經驗。究竟苦難是如何出現的呢？為甚麼他們要面對這些苦難呢？是他們咎由自取嗎？我想是由於家庭成長及社會所導致的。香港有一種普遍的貧窮你知道是甚麼嗎？就是關係貧窮。即是人與人之間缺乏溝通的意思。我常獨個兒在餐廳吃飯，有一次看到一家四口子坐着，除了講出自己想吃甚麼外，用餐時彼此零溝通，各人只顧溜手機。當子女的成長出現問題時，家長劈頭就問「有沒有攞錯？」「為甚麼會這樣？」他們只懂得互相指責，從來不正視真正的問題。

我們現在面對苦難，很多是基於家庭的問題。家庭的問題又怎樣產生出來的呢？它是與社會關係中的問題引發出來的。換句話說，人的苦難是受很多因素影響的意思。

慈悲內有公義，公義內有慈悲

很多人問神父慈悲與公義是否兩者難以並存？我們怎樣行公義而又存慈悲呢？我在學校工作時，校長常問：我們究竟要行慈悲或公義？我覺得如果要行慈悲，內裏必定要有公義；若要行公義，亦必要有慈悲，兩者是分不開的。教宗方濟各在詔書中提醒我們要行神哀矜和形哀矜，並談及慈悲的行動。慈悲是需要行動來彰顯，包括精神的和身體的慈悲行動。

我們面對世界時，很多人都有慈悲心，但問題是會否願意付諸行動。沒有行動就沒有公義，當你看到別人吃不飽時，自己可否想過為他們做些甚麼呢？倘若社會上很多人沒有地方住或衣服穿時，這個社會就是沒有公義。反之，若社會上有慈悲行動，社會就是公義。可惜，現今許多人沒有這份慈悲，也不懂得公義。

從家庭問題引起的聯想 —— 標準工時

很多苦難都是源於家庭的困難和問題，而教會亦一直很重視社會可以怎樣去關心這些問題。雖然我們不能處理所有的家庭問題，但重點是社會或政府有否從家庭的角度去考慮此等問題？例如我們現在爭取最

低工資，教會的社會訓導亦談到家庭工資，甚麼是家庭工資呢？家庭中有一人在工作，便有能力供養其配偶及子女。但現今家庭經濟的現象是兩夫婦都要工作，於是要安排傭人或自己的父母來照顧兒女。孩子在這樣的家庭結構下成長，面對很多挑戰及困難。如果社會或政府能多關注並朝向以家庭生活為基礎的政策或計劃，相信可以改善這些家庭問題。

雖然要落實全面家庭生活改善政策還需一段長時間，且計劃亦不一定會完美，但總比甚麼都不幹的好。可以多些考慮家庭生活的關注事務，如家庭工資，因為工資可以幫助家庭的基本需要，又例如幫助家長可以安心留在家裏照顧小孩子、有安穩的居所等，這都是主要的社會問題。如果社會政策的考慮能以改善這方面為目標，我相信一定可以減少家庭問題。可惜現今的主流想法只着重經濟發展的利益，而未有正視去解決家庭問題。

在標準工時方面，現在工作時間長，能與家人相聚的時間不多。我剛晉鐸神父時，家庭探訪的工作比較容易做，但如今的下班時間普遍晚了，九時或十時才下班回家，我們怎能好好做家庭探訪呢？這亦反映社會制度對整個家庭生活的影響。我在教區青年牧民

委員會工作，每週工作五天，我的同事在星期六、日除了要負責活動外，都有與家人相聚的時間。

從苦難到慈悲，再到公義。我們面對苦難時，要有慈悲行動。遇到受苦者時，該如何去陪伴他們，與他們同行呢？雖然有許多社會工作者或其他人幫助他們，但重點是我自己可以為他們做些甚麼呢？當我們憐憫和關心別人時，應該有同理心和尊重的態度，而非單純以施捨的心態對待對方。我們希望能給受助者基本的需要——尊重，就是這麼簡單。如果每人都有這種想法，世界便變得不一樣。

七種愛的語言

最近，我一度反思夫婦間及一般人之間的關係貧窮問題。究竟我們怎樣可以改善這種關係呢？友人給我介紹了一本名為《愛的五種語言》(The Five Love Languages) 的書。之後在主持婚禮時，我很喜歡用這五種愛的語言做分享。

五種愛的語言的第一種是禮物 (Gift)。你們有送禮物給朋友的經驗嗎？那代表甚麼呢？你送禮物給別人是代表一份愛意和關心。像剛才院長說，如果孩子乖的話，便以假期作獎勵，這就是禮物。這禮物代表

着被重視、被愛的意意思，故不要輕看這份小小的禮物。你們曾否表達過物輕情意重的心意呢？有些父母與子女之間，可能就沒有這種溫馨情重的禮物，卻只有條件式的獎勵。

第二種是身體接觸(Physical Touch)。你怎樣處理孩子的哭泣呢？一般父母都命令孩子立即停止哭泣。但最適切的處理方法其實是擁抱，因為身體的感覺是很有治療性的。然而，人與人之間往往很少有這種接觸。一個簡單的擁抱是一種表達的方式，可以表達一份深厚的愛。有一次我做輔導時，有一對夫婦分享他不愉快的事，太太說她只有一個簡單要求，就是想丈夫抱着她一起看電視，讓她感到被愛。可惜，一般夫婦在家庭生活中都只在各自忙自己的事情。

第三種是肯定語句(Affirmation of Word)，像簡單的說話「很欣賞你」、「很支持你」、「很愛你」之類。成年人傾向指責和批評孩子，但不擅於說正面的話。在接受靈修指導培訓時，我常被提醒即使受輔者說話沒有意思或不符主題，我們仍要肯定他們的話，慢慢的幫助他們提升自我。我們有否想過在與人溝通時可以說出肯定的、支持及鼓勵的說話呢？你們聽過說話能夠傷害人嗎？比如說：「寧願生一舊叉燒，

好過生你！」這是一句很傷害的說話，孩子聽後誤以為自己不及一塊叉燒！會給孩子造成傷害，影響他們的自信心。

第四種是服務（Service）。在婚姻輔導中，一般所見的家庭都是妻子負責家務，若丈夫能分擔一些家務，即夫婦分工合作，家庭便會和諧一點。只可惜，這種情況很少出現。由於父母愛子女，他們在照顧子女時萬般照料，但疏忽了用適切的態度。

第五種是優質時間（Quality Time）。剛才提及現在有許多人因為沒有足夠的相處時間而造成關係貧窮。面對許多社會與家庭問題，大家其實也能做些事情，嘗試改善或防止問題惡化。

從這五種愛的語言，我試着延伸出第六種：聆聽（Listen）。在現今的社會，許多人只想表達自己的立場及想法，忽略聆聽別人。父母與子女之間缺乏了解，主要是因為沒有聽對方的想法，造成雙方關係的罅隙。

還有，第七種語言是祈禱（Prayer）。作為一位神父，我須要自我反思、祈禱。如果真的關心及愛對方，就要懂得為他祈禱。例如在院舍，大家雖不知道接受服務的孩子將來會怎樣，但在過程中為她們代禱

是愛的表達之一。

從改變制度爭取公義

苦難的原因是甚麼呢？社會制度的問題可能會使家庭進入困境，像香港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離婚率，我們要如何處理呢？無疑，政府須負起莫大的責任，但政府可以怎樣面對這些問題呢？若我們願意採取慈悲的行動向受苦難的人表達關愛，那麼公義就會彰顯。剛才跟院長用膳時，她提到經常要外出做倡議的工作。誠然，若我們不在社會上發聲，情況便不能得以改善。一些政策問題比如說家庭工資、標準工時或全民退保是否有助解決家庭問題呢？家庭主婦對社會的貢獻又應如何看待呢？無業的家庭主婦年老時，會否有社會保障呢？這些家庭問題都跟青少年成長有密切的關係，值得大家深思。

現今青少年的困境或苦況之形成，主因是家庭成長的經歷，而家庭的窘困又源於有問題的社會，那麼我們應怎樣做才能改善相關政策呢？我們明白雖然不能一朝一夕達到目標，但朝着這方向去努力，總有機會多少有改進。倘若我們只做補救性的社會服務，永不解決基本的根源問題，問題只會循環不息或甚至惡

化，不會得到真正的解決。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積極爭取社會公義，現況是很難改變的，即使社會服務有多努力，也是徒然。

活出真正的公義

有一些重點值得大家反思：第一，剛才看到《去了那裏》和《他們同行》兩張照片，表達了臨在是不能缺少的，因為我們經常忽略身旁的人或事物。第二，《你的兄弟在那裏？》一張照片提醒我們對於有人陷於苦難，我們有否關顧到他們的需要呢？第三是對於重複犯錯的看法。荔枝角拘留所的犯人多達一千至二千多名，像剛才提及的青年亦經常進出監獄，這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通常只講對與錯，但事件的背後是甚麼呢？我們常用公義去判斷他人，卻又不能明白當事人犯事背後的原因。第四是信任。我們對青年人應有足夠的信任，雖然人會犯錯，但人是能夠從錯誤中學習的。假若要求人絕對不能犯錯，那就沒有公義了。人犯錯時，最重要的是幫他們走回頭，這才體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真正活出公義來。

與聽眾互動

（眾 = 聽眾、甘 = 甘寶維、潘 = 潘婉玲）

甘：我想補充一句：如果我們不行慈悲，我們就是不公義。

潘：「行慈悲就有公義，公義內就有慈悲。」這可以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我在女童院工作，每天服務孩子時，經常要面對她們的瘋狂行為，不論在說話、姿勢上都具攻擊性。從慈悲的角度來看，是否因她們背後的故事，我們便要包容一切呢？剛才的分享，給了我啟示，使我更肯定要理解她們的故事。縱使我很明白她們，我的角色是有責任讓她們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其實是在傷害她們自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不是因為慈悲的緣故，或是她們背負沉重的故事而放任她們胡作妄為。我要給她們知道我感受到她們的痛楚，故我更陪伴在她們身邊，讓她們明白一些事不單會傷害別人，也會傷害自己。事實上孩子的思想很直率，她們採用了成年人做事的方法，傷害別人卻以為已經做到公義。她們在傷害別人時，也同時在傷害自己和社會。我們要

教導學生在理解自己的需要時，也理解別人的需要，在尊重自己時，也懂得尊重別人，好讓她們將來明白如何在慈悲中行公義。

換句話說，不能用自己的強勢或擔子作為藉口，用傷害別人的方式表達自己。在教導孩子時，我們要先透徹了解慈悲用在問題上的意義，方可更看清楚問題。然後讓她們明白事情若處理不當，後果會傷人害己。再給她們提出其他辦法，解釋其利害，並尋求最好的處理方法。不會像一些人只懂得用強權來壓抑或懲罰她們。

甘：我時常反思：尊重就是愛與慈悲的重要基礎。如果沒有尊重，怎樣去愛也是白費心機。若是遇上一個行為惡劣的人，我怎樣愛他呢？基本上，我們一定要尊重別人。我到監獄去探訪時，對每一位兄弟都尊重，這是最基本的心態。我想與大家分享一則笑話：探訪監獄時，有些囚友問我：「如果你替我辦告解，我的罪是否會被赦免呢？」到底他想說些甚麼呢？意思是罪被赦免，那麼他就不用再坐牢，即無罪釋放！所以，我會讓他們明白即使認錯也須負責任。每一個人在社會上犯事，要為自己所作的錯誤負責任，接受懲

罰。這個道理是要讓年輕人學習承擔，並有勇氣承認及接受自己的過失。這也是在慈悲行動中要他們學習的東西。

潘：不同的人看公義有不同理解，因公義沒有惟一的定義。我對判別公義略有疑問。例如：有小孩分配糖果，每人拿一粒，其中一個不喜歡吃，放棄不拿，另一位很喜歡吃便拿兩粒。有人說這是不公平，硬要那放棄的小孩拿回一粒。如何從不同角度觀察問題，取得符合公義的解決方法呢？有甚麼像真理般的絕對真實，不會受不同角度所影響呢？

甘：我的回應是人際關係。人際關係講求溝通、明白、分享、理解和反省，而不像判官般審判哪個公義、哪個不公義。在這撕裂的社會，很多人對公義有不同的看法及說法，但聆聽是解決問題的基本步。每人都有他們的理論、背景、良心。有些人的良心與他們文化是有關聯的。例如：我在非洲服務時，非洲社會實施一夫多妻制，如果與他們談一夫一妻制度，他們會認為不合理。曾在探訪時，有一位太太對我說聖經中亞巴郎亦是一夫多妻，所以在某程度上跟他們的理念及背景有

相似的地方。歸根究柢，問題如果缺乏人的基本權利、人性尊嚴，便沒有公義可言。

潘：我們提供家庭婚姻輔導調解，遇上丈夫出軌的個案時，妻子感到被背叛，感到受傷害。雖然在家庭層面需要寬恕，但妻子認為從公義的角度看，錯不在自己而不寬恕丈夫，結局雙方關係缺裂。在這類家庭的境況下，公義何在呢？

甘：我未有接受正式的輔導訓練，但從經驗中，我亦面對過很多類似的個案。我會首先安排個別談話，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然後跟夫婦共同傾談。過程中，不希望把焦點放在丈夫出軌等過犯上，而是讓他們回顧彼此曾經怎樣相愛過、怎樣由相愛步入教堂、婚姻生活何等甜蜜過、之後又怎樣出現問題，讓他們回顧過去的種種事實。如果開始時單單指責對方犯了甚麼錯，是很難認清並面對事實的。神父當然不會鼓勵離婚，但當他們能面對事情的全部真相時，便可以為自己做決定了。

寬恕來得容易嗎？不容易。然而，寬恕能重建一個破碎的家庭，它可以彌補決裂的關係。寬恕是一種力量，但人卻不容易做到寬恕。在處理家庭

個案時，我們不是要他們彼此寬恕，而是讓他們看清楚彼此的關係，因為有可能丈夫的行徑是跟妻子有關連的。行為本身是錯的，但引發行為的出現可以涉及很多原因，因而需要他們一同來承擔發生的事情。如果只針對是與非，便不能看透整個過程中關係上發生的作用。所以，足夠的溝通能讓他們重新經歷愛的經驗，並冷靜地考慮可否繼續走下去。我不會在妻子面前責怪丈夫，因為要顧及對方的尊嚴，我只會單獨跟丈夫傾談。若他們在過程中沒有感受被人尊重，那是無助於問題的解決。犯了錯，並不代表就失去一個人的尊嚴。

眾：在過去的中學文憑試通識科，曾有一道關於青少年上游（在社會上）的題目。那些上游不前的青少年，可能就是一些家境貧窮、或是有特殊背景、又或是潘院長所照顧的那類少年。你們怎樣看青少年上游的困難及現況呢？

潘：我想分享一些經驗，我常說：現在我們服務的孩子已輸在起跑線上，甚至嚴重慘敗，為甚麼呢？第一，孩子在早期階段曾遭受不同的創傷，心理上已沒有足夠力量面對在學的競爭。我的兒子十

六歲，正預備明年的中學文憑試，他們追求分數，而非真理，且互相比拼的心態非常強烈。為甚麼說院舍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呢？他們在起步時已沒有力量跟人競爭，因為他們的心靈已經碎裂，且對人感到冷漠，這阻礙了他們與社會的連結。

為甚麼背景良好的家庭會想找一所優良的學校給孩子去上學呢？因為他們需要友好的連結。好的社交脈絡有利孩子發展將來，同時培育同儕的社交能力。如果孩子跟老師建立友好關係，也會有助他們的學校生活過得一帆風順。哪位老師會喜歡搗蛋的學生呢？老師恨不得他們趕快離開學校吧。當學生離校數天後，已經不再想回學校上課。就這樣他們在開始時已經離開跑道，又如何再跑下去呢？

第二，除了情感外，還有客觀、實質的資源問題。香港有嚴重的教育問題，那就是課程的學術程度過高。倘若家庭有足夠資源供給孩子補習，或是由家長自行教導，學生大致應付得上。但我們中心的中一、二學生，有些甚至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也未能全部認識，更遑論是一本最初級的

英文讀本。可見他們的學習程度跟主流學生相差甚遠。事實上他們早在幼稚園開始已經跟不上，因為沒有人幫助或教導，經常缺課；學校方面會讓這種程度的孩子繼續升班，早點離校。雖然他們在特殊學校就讀，而「特殊」的意思只是指他們這些人在學校是特殊的一群，但要面對公開考試時，要求的水準卻完全和主流學生一樣。他們雖然就讀中二、三，卻只有幼稚園的程度。若要勉強他們應付中學文憑試，只會成為考試制度下的失敗者。

他們不只有個人的情緒和行為問題，也有社交問題。這些學生在教育局中排列第九級別，他們不能在原本學校就讀，才進入我們的學校，這是第一個失敗。其二，他們沒法吸收相應程度的知識，跟一般主流學生的程度天差地別，但考試準則卻要與主流學生並齊。事實上，他們肯去應付考試已經不錯了，因為許多學生都不願意面對，因為他們老早預料到一條題目也會看不懂，更遑論作答呢。現在，還說甚麼通識教育，他們書寫出來的兩三行字間都已經錯漏百出，怎樣可以「通通識」呢！如果用學術程度做評估，他們注

定是失敗者。我認為這是香港教育制度的問題，亦涉及公義的討論。我們應該將特殊學校與普通學校分開評估，可惜現在的評核卻把兩者並列歸一。

最大的問題是現在的教育制度沒有重視他們在學術以外的才能，比如說藝術。倘若只用中國語文或英文能力、計算能力來評核，他們永遠不會達標的，因為他們的天賦往往不在這一方面。最好能夠按着他們的天賦來提供適當的培育。真正的教育準則，應該考慮孩子的獨特天賦。教育局經常宣傳因材施教，若真能如此實施，這些學生將不會是失敗者，反而會出類拔萃。他們輸在起跑線，不是由於資質差，而是因為起跑線不適用於他們，使他們永遠無法追得上。他們需要整合的社會服務，和各樣的學習形式來配合，才可以找到出路。

事實上有些資源可以運用到的，如私校的一些創意課程適合我們的學生修讀，但因她們薄弱的經濟能力，付不起學費，未能報讀。問題是我們作為身旁的人是否對這些學生有足夠的信心呢？而不是低估他們的能力，認為她們會半途而廢，枉

交學費。很多人對孩子沒有足夠的信心，成為孩子跨越不過自己的主要原因。只說些否定的話，他們便永遠留在特殊學校上課，沒有勇氣應付考試，結果白走許多冤枉路。我們要相信他們能夠跨越，他們才有跨越的信心，給予語言與非言語的鼓勵。回顧我們的舊生都是考試失敗者，但他們現在都創造出個人的成就，比如說開設婚紗攝影舖、美甲店。若不計較學歷，他們都是社會的菁英。

我們應該出來做倡導和推廣工作。透過了解他們的真實情況和需要，將所需的不同社會資源集結起來，運用在培育工作上，讓他們找到適合的出路。我們不用投以憐憫的目光，或叮囑他們領取綜援、入住公屋等，因為他們不需要這些；相反，周邊人的鼓勵和更多出路的機會更來得實際。

第三講
從聾人手語
看天父的慈悲與正義

鄧慧蘭

香港中文大學
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主任

夏志誠

香港教區輔理主教

《從聾人手語看天父的慈悲與正義》

鄧慧蘭

在從事聾人教育的十年間，我看過許多公義及不公義的事情發生，到現在我都已經可以處之泰然。因為我知道若天主想讓它發生，它自然會發生；祂不想要的，便不會發生。我相信一句話：天主自有安排。所以我常跟姐姐說：要是我們的工作做完，便可以「拋波走人」。這個波就向上拋，永遠留給天主。若祂接收，那我們便接著做下一個；若祂不接受，那個波隨它掉下來，我們重拾它再做一下。這十年來，就這樣像坐過山車，起起跌跌的度過。

聖經中的聾人

在《瑪竇福音》第七章 31-37 節，耶穌讓一個聾人重拾他的聽力和說話能力。我很喜歡耶穌跟聾人的最後

一段說話：你不要太張揚，我已經治好了你，你沒事便可以離去。當時耶穌伸手按一下他的耳朵和舌頭，他便由失聰失明，恢復健說健聽，使他喜樂不已，按捺不住不停的向人宣揚耶穌的大能。原來，當人得回失去的能力時，那份喜樂是如此偌大，就連耶穌吩咐他記住要做的事也完全忘掉。

通常人們遇上聾人時，便會想到那是病患，或是失能 (disability)，人們理應給予對方憐憫。故事中聾人的鄰居就是憐憫他才把他領到耶穌那裡治癒。我們姑且稱之為聾疾吧。從語言學的角度，我覺得耶穌希望那聾人能與其他人溝通，故把聆聽和說話的能力還給他。若非如此，相信那人也會孤獨終老。我們常說人須要溝通交流，為甚麼聾人卻沒有這個機會呢？

回來看現在許多聾童的家長，當他們得知自己的孩子有聽障時，第一個反應便是驚恐，他們會問：我沒有任何問題，為何孩子卻是個聾子呢？他們用盡千方百計，希望能幫聾孩子恢復聽力或說話的能力。想一想，若有人捂住嘴巴跟你說話，你非要十分用心才能聽到他說甚麼。人在聆聽時，還須要留意對方的臉部表情和嘴部動作，故若你捂着嘴巴和一個聾子說話，這會給他製造學習上的雙重困難(double disadvantage)。在我三十

年的教學生涯中，看到學生的成功例子寥寥無幾，反而受挫敗的居多。

天主沒有遺棄聾人

我們會如何看待這些不成功的聾孩子呢？在街上看到聾人的手不停揮動時，人們便會想：他在幹甚麼？為甚麼他臉上的肌肉總是大幅度動來動去呢？好奇怪！可不可以禮貌一點呀！如果我們看到聾人的臉、手、身體不停在動，或許會覺得他們有點「低低地」（弱能），有些人更會以為聾人的能力有缺憾。這些想法都是不對的，事實上那只是聾人採用的一種手語文化。

有些聾孩子的家長使出渾身解數跟子女溝通，只可惜孩子投下惘然的目光，始終不知道爸媽想說些甚麼，這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讓我先解說一下人類的溝通語言是甚麼。我在從事手語語言學研究時，曾問：手語其實是從哪裏來呢？手語的產生和人類語言的產生兩者之間關連不大。有一些學者認為手語是人類語言的原創，即人類的第一種語言不是口語，而是手語。於是，有些人便去追溯以往的歷史學家、哲學家有否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發現是有

的。帕拉圖(Plato, 428-348)在他的著作中記載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曾說過：「如果我們沒有聲音和舌頭，但又想互相傳遞訊息，我們會不會像啞巴一樣用手、頭或者身體其他部分來創造符號呢？」我沒有把「符號」譯成「手語」，我猜他應該是說真的表達訊息的符號。誠然，在那個年代已經有人曾經思考過啞巴怎樣傳遞訊息。他是否用手來傳達訊息的符號呢？這說明了遠在那個年代，手語早已存在。

另有一些人認為人類還未進入發聲時代之際，最原始的溝通方法是姿勢。最原始的姿勢只有兩種，第一種是「指」，即那個 **pointing sign** 的作用。第二種是「符號」，即指稱或替代物體。譬如紅蘋果的手語是這樣的：裝作有一個圓圓的東西放在嘴邊，同時嘴嚼它。如此就一目了然。那麼在昔日，當人仍未有語言時，該怎樣表達「我想吃蘋果」呢？可能他會指一下，然後放進口中。這樣，物件與符號(**form and meaning**)便配合了。

我們來看看手語和教育的問題。文獻記載，聖耶柔米(St. Jerome, 345-420)把聖經從希伯來文翻譯成拉丁文時，指出聾人的救恩可以來自手語和書寫渠道。身體的姿勢可以用來傳遞天主的說話，跟通過聽覺和口語沒

有分別。聖奧斯定(St. Augustine, 354-430)在他的著作中也指出姿勢與手語均可替代口語，把聖經的喜訊傳給聾人。因此在很早以前，他已思考到該怎樣把救恩傳給聾人。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文獻中，可以發現有人曾經利用手語作教育的工具。一位著名的西班牙本篤會會士通過敘事手法，描述他怎樣通過手語來教育宮廷貴族的聾孩子，給他們學拉丁文和希臘文。他甚至透過手語，達到口語的書寫能力來發展學生的思維，從而使他們進一步接受教育，最終更影響一些學生成為神父。

當我讀到這些文獻時，我領悟到天主從不遺棄過這些聽障的弟兄姊妹。祂容許我們用另一種的模式將救恩的訊息傳遞給我們的這群弟兄姊妹。

第二屆國際聾人教育會議 —— 禁止手語

在 1880 年第二屆國際聾人教育會議，由於科技開始進步，有人在會議內提倡不藉手語和不用聾人老師教學生，認為這只會妨礙聾生的教育。結果，聾人對 1880 年米蘭國際聾教育會議的反應是負面的。



米蘭會議後，聾生的苦難肇始，因為他們不能擁有聾人老師和使用手語的機會，健聽老師亦只能以口語授課。這樣慢慢造成聾生被聚集在一處接受健聽老師的口語教育。聾校由此應運而生，口語訓練也成為主流。

從一些舊照片可見，當時聾校的教學目標就是讓聾生學懂說話，故口語培訓是重要的項目。助聽器和科技發展的聽力培訓便慢慢發展出來，時至今日更有耳蝸移植、腦幹植入等高科技技術。

但直到今天，社會上依然存在一種誤解，認為聾孩子學習手語會妨礙學習口語和接受教育，所以手語遭受禁止。

對誤解的反思

然而，在特殊教育或聾人教育不斷地演變後，我們今天已意識到一個問題：將一群聾孩子困在聾校內是否真的對他們有益呢？特殊教育的模式開始慢慢轉變為主流教育，即所謂的融合教育。

現時傳統的聾人教育是將所有聾孩子分散，即在一所主流學校內可能只會得一個聾孩子。那個聾孩子只能用耳機輔助，並看着老師用口語授課。我們可以反思這

種方式來教育聾孩子，是否真的能提升他們的書寫能力呢？他們真的能擁有愉快的學習嗎？融合教育會否令學生產生心理障礙？我們從事教育行業的一定會問：學生有沒有愉快地學習？

聾校學生的語文水平

這是一段題為《父與子》的漫畫故事：父子倆同睡，但兒子輾轉睡到地上去，於是爸爸睡到床側，再把同眠用的被子一半蓋到兒子身上。我很喜歡這篇漫畫所表達的父子情，故把它抽出來給聾生們看，嘗試了解他們能否描述當中的感情。以下是一些小六學生的描述：

「爸爸睡覺牛仔靜靜地拿下床。牛仔下床暈慢跌倒，牛仔下地床睡覺。爸爸慢慢沒有跌倒，牛仔拿厚床一起睡覺。」

「牛仔和牛仔爸爸已睡覺，牛仔睡覺落下來，牛仔睡下來，然後睡覺布睡。」

健聽人經常會投訴不曉得聾人在寫甚麼，事實上絕大部分聾生的書寫能力停留在這個水平上，尤其是聾校的學生。但是聾人是極富創意的。在文中這些學生加插了很多自己的想像，只是文筆糊塗了，令人難以明白。

以下是一個十五歲聾生之作品。故事是說有一個盲人在行乞，另一個善心的孩子給他錢，但孩子最後發現這人是假冒盲人在行騙。請看看這個接近中學畢業的學生所寫的文句：

「我十歲少年想去買玩具。忽然乞丐老人，我選兩份！決定去盲老人，我捐五元，但是富婦人的自私車，她拍門盲老人聽見，我已捐五元之後，盲老人說多謝婦人好心，我呆人。」

這不只是香港聾生的問題，全世界的聾生都正面對這個問題，即書寫能力薄弱。可能有人會說，給聾人融合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他們的口語能力，進而增強寫作能力，故不應教聾人手語。可是，我們不教手語，他們的能力就會有實際提升嗎？似乎是沒有。

主流學校的聾生

這段短片是關於一個在主流學校中學習和成長的聾人。如果你是這位聾生，你會怎樣呢？他其實是挺可憐的。讓我們來聽他的心路歷程吧。

「我是在一個健聽的家庭中唯一的聾孩子，且在主流學校讀書。我是能以口語表達的聾人，

在我未學懂用手語之前，就是以口語，即我的母語去溝通的。在學校課堂內，我是唯一聽不到的學生。以前，我的口語發音很糟糕，根本不能表達自己，經常不知自己想說些甚麼。」

「當我在小學二年級的數學堂時，我們要記下並讀出算式，如 1 加 1 等於 2，1 乘 1 等於 1。所有學生都要輪流在班中眾人前背誦算式。當到我背誦時，你猜我的老師的第一句話是甚麼？我的老師說：我不明白你在講甚麼，在滿分的一百分中，我給你五十分，這可以吧？！我記得前一晚其實我溫習了很久、很夜，並把算式完全牢記好。但最後，老師卻只給我五十分，我實在無言以對。」

「例如，當我發音錯誤或失準時，只有少許音差，全班同學便會取笑我。(有人問：被取笑後，你回家會否哭？) 我會假裝甚麼也沒發生過。這樣的經歷已有很多年，即我每次回家，會佯作自己已忘記那件事情。(有人問：即你已經習慣了嗎？) 是的。」

這個在主流學校成長的聾生性格正面，但他的學習生涯卻很艱苦，主要是靠自學。儘管如此，他仍須要上

學，不然就會觸犯法律。老師認為他不會讀得好，乾脆給他五十分的安慰獎。但是對孩子而言，殊為貶抑。他無奈的也要忍受下去，只好自我解慰說：「算了吧。」我問：他這輩子也只能這樣吧？

他在長大後學了手語，現正參與我們的工作，且擔任我們的聾人老師。

李菁的故事

現在給你們看另一個例子。你們明白這篇文章在寫甚麼嗎？我從未見過聾人有這般高水準的中文能力，她的中文運用比我靈活一千倍：

《零價值？》

多年以來，我不大接受自己的「聽覺缺陷」。
它是沒有價值的自我部份。它象徵了混沌、無知的狀態，和充滿聲音的世界形成尖銳的對立。「身體缺陷」，不僅對於我所身處的世界沒有價值，對於我，也沒有任何價值。

我感困惑的是，如何面對它？我不能說，因我的智商高於常人，便抵消或滅了這一部份。這是一個不會消失的世界，是自我的本然。假使

我終於在社會裏找到合適的位置，不等於問題不復存在。本應送到堆填區的自我人格，如何被自身包容和理解？即使被置於豪華的房子裏，垃圾依然是垃圾。把「垃圾」放在「筆筒」裏，又如何？我不是盛載垃圾的「垃圾箱」。逃避是我的原罪，痛苦是我的命運。

如果大家仔細讀這篇文章，便會發現這是一篇很沉重的自我反省。我從未見過有聾人擁有如此優美的文筆，很多聾人都只有剛才所看那些文章的寫作水平。這個學生在主流學校中成長，非常聰明，又擁有如此高質素卻又深沉的文筆，反映出她自身的心態。你們猜她的結果是怎樣呢？

李菁可說是香港的聾人狀元，卻被我愚弄了。記得當時我收到她用英文寫來的電郵，那時我教課已有幾十年，從來未有聾人用英文寫電郵給我。就算他們用中文寫，我也未必看懂，但她卻能用英文寫，令我很詫異。她說自己已經寫了兩百多封信，一直都沒有受僱用。她說：鄧教授，你可否給我一個機會呢？那時我們剛開始辦聾人教育，其時我想她中英皆出色，倘若她再掌握手語，豈不是能幫到我們的聾孩子嗎？當初我天真地認為

她只要再學會手語便會事事順利，雖是遲一點，但總比完全不懂的好。我自己也是接近四十歲才開始學手語，她才二十多歲，必定比我學得更快吧。我便聘用了她。

殊不知，她在那短短的六、七個月內感到巨大的衝擊。她父親說她會疑問自己是聾人還是健聽者、為甚麼以前沒有學好手語、今天為甚麼會變成這樣子等問題。其實李菁有一個 Blog（網誌），可以看出她內心的絞痛和辛酸。她說自己要用一些具獸性的方法征服周遭的人，因她要告訴大家：「我是有能力的。」那時，我不知道她已罹患憂鬱症，還誤以為給了她一個大好機會，結果原來是雪上加霜。每當她看到我們中心內其他聾人高興的樣子，她便苦苦自問：為甚麼我不快樂呢？為甚麼我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呢？我不是聾人，也不是健聽，到底我是誰呢？你可以看到她文章的造詣相當高，肯定她閱讀豐富，且懂得思考。就是在這個衝擊下，她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當收到這個消息時，我震驚得失足倒下，然後想：我是否做錯了？我是否不應聘用她呢？

但現在回想過來，我覺得自己沒有做錯。就是她賦予我一顆堅定的決心，無論如何都要繼續做下去（聾人教育工作）。假如我放棄，香港可能繼續出現一大群教

不成材的聾人，而讀得成書的卻鑽到牛角尖去，那問題就大了。

手語語言學

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感謝天主，讓我認識了手語語言學。1989年12月我從英國回來，本來打算訓練英文老師，讓他們知道如何教好英語這一門學科，於是我進了英文系。但想不到那一年後有機會接觸到手語，大概是1990、1991年。其時，我還不知道手語是甚麼，且和一般人的想法無甚不同，連手語是否一種語言也搞不清楚。我以前沒想過用語言學(Linguistics)來分析手語，但覺得這是智力挑戰，便開始去分析手語。

接觸手語後，我才了解聾人原來是人類中一群沒有語言的人。對一個語言學家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因為我們認為語言是人類的標誌。人類和動物的分別在於人類擁有思想和語言。但聾人是一群沒有語言卻有思想的人。前文提及的李菁和寫作欠佳的學生都有思想，他們只是因為語言不通，才未能善於表達。我常在想，究竟有沒有方法可以讓聾生愉快地上學呢？讓他們與其他孩子互相欣賞、互相學習呢？

手語語言學是一門嶄新的學科，在六十年代興起，而我在它三十年後才接觸到。我們會分析「本體」，分析手語的音系學、語法學、形態學、語義學，然後再研究聾童如何學習語言、手語、口語，這就是手語語言學大概的要旨。這一門學科擁有專著和期刊，並舉行國際會議。

2003 年時，我研究手語語言學已經差不多十年了，中文大學批准成立一個專門的聾人研究中心。當時我們希望推動有關手語語言學、聾人教育和聾人文化的研究，同時關注香港、台灣、國內，以至亞洲的情況。

推動手語

讓大家認識一下我們的工作吧。我們的第一項工作是做亞太區手語語言學研究及培訓計劃(The Asia Pacific Sign Linguistics, APSL)。我們針對在過往教育中未能成功的那批聾人，進行再培訓。培訓以手語教學，分析語法，即分析語言學方式，使他們明白，也令他們擁有多一門語言作溝通交流的工具。我們和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合作，開辦很多不同的文憑課程和高級文憑課程。我們亦開展手語教學課程，有聾人出任教師，因為

他們才是最適合的手語老師，正如我們會用英語母語人士教授英文或北京人士教普通話一樣。我們亦推動手語翻譯、聾人教育等工作。

我們支持亞洲各地的聾人來港接受培訓，讓他們回國在當地大學延續，成立研究中心。那些學生可能未接受過這種學習機會，我們現在就是向他們提供這個機會。我們的聾生來自不同地區或國家，包括香港、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斐濟和日本，較近期的有緬甸。我們也出版很多手語書和教材等，這不單只是香港，亦包括其他國家如柬埔寨。我們亦有一個專門編寫手語詞典的工作室，協助收集各地不同的手語，放進我們的資料庫，讓他們在回國後仍可使用。

每年總有聾人學生在這裏修畢高級文憑，而香港本地也有聾生於 2007 年考取到香港手語教學文憑。這些小成就是累積而來的，我們亦開辦手語語言學的高級文憑課程。以往有很多聾人都是讀書不成，更遑論升大學，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是成為聾生與大學之間的橋樑 (bridging programme)，讓他們在完成高級文憑後，有資格升讀本地大學。

從前，聾人的成績太落後，就連中學會考也考不好，學校也不希望他們去考。所以畢業時，他們只能從

學校獲頒成績表當作畢業證書。要升讀中六、中七荊棘滿途，更別說升讀大學。正因為有了這個高級文憑的途徑，有些聾生可以升讀中文大學的語言學系，成為本科生。今年中大再收了一個聾生，所以現時共有三個在語言學系中修讀語言學。語言學的課程頗為艱深，算是中大裏拔尖的學系。在此聲明，我並沒有做甚麼「手腳」讓中大取錄他們，他們都是憑藉自己的實力而考入。不久之前，我還帶他們到上海參加一個語言學學術報告的會議。

第二十一屆國際聾人教育會議 —— 恢復手語的地位

現在我們再了解聾人教育的現況。剛才說過 1880 年在米蘭舉行第二屆國際聾人教育會議。現在再看一看第二十一屆聾人教育會議發生了甚麼回事。當時我也出席，大會否決了第二屆聾人會議的議決，恢復手語的地位。手語語言學遂出現，讓大家知道手語也是一種可以運用於教育的語言。

當時，整個會議的委員會均在席上，主席挺身站出來，台下站着一大群不同國籍的手語翻譯師。主席代表

整個會議發言宣布否決第二屆米蘭會議的議決，並展開提倡手語教育，把它重新納入聾人教育。大會上，他們透過不同媒介進行轉播公開道歉，通告全球的聾人組織，冀盼各方團體能同時接聽到。

由米蘭會議直至 2010 年，聾人的苦難持續了整整一百三十年。但是，2010 年之後就一切順利和美好嗎？不是。聾人的苦難仍然存在，因為還有許多誤解要我們逐一去拆解。就像一棟大廈的根基打不穩，要把它拆掉再重建。現在就是如此，要把過去的誤解一一改變過來。2010 年的議決只是讓我們得悉過去犯了錯，但是如何矯正這些錯誤，確實是一項挑戰。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Sign Bilingualism and Co-enrolment in Deaf Education (SLCO) Programme)

香港幸而在早期已引入了手語語言學，所以我們知道怎樣去處理聾生的學習問題。我們開展了一個名為《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由 2004 年至今已有十二年的光景。每逢星期六，我們在一所幼稚園聚集一些孩子學習手語和中文。曾經是一個倉促的開始，因緣際遇，找來基督教平安福音堂幼稚園，校長富愛心，校方

具熱誠，關心這個計劃的未來，我們雙方同意携手做下去。計劃發展下去，一路順利。相信這是神的派遣，無論資金充足與否，也堅持去做。

現時該計劃獲得資助可以維持下去，萬分感恩。所需要的資金其實不算太多，一年約需幾十萬。主要用於聘請一、兩個聾老師，推動計劃。2007年我們獲教區准許在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實施這項計劃，讓幼稚園畢業聾生升讀小學。於是，每年都有六位聾生接龍升讀小學，像砌積木一樣。

由計劃初始延伸至中學，我們擔心沒有中學能夠承接下去，非常惆悵，於是不斷祈禱。有幸遇上簡神父，他說：「我們應該愛惜我們的兄弟姊妹。」然後，計劃就在聖母院書院延續。簡神父覺得既然在中學發展，倒不如把小學也納入計劃的範圍，所以，於2016年始也在獻主會小學開始實行這項計劃。

除此之外，我們有開辦一些特殊課程，像嬰兒手語班。嬰兒手語班補充現今教育系統缺失的一環，讓零至三歲的聾嬰兒與其父母一起學手語。我們和衛生署合作，如果他們接到家庭有聾嬰兒的個案，會直接轉介過來，讓我們教導這些聾孩子和家長使用手語溝通。

直至現在，保護兒童會轄下五所育嬰院的零至二歲健聽嬰兒全都懂手語。有些老師甚至認為他們可愛機靈。2016 年開始，我們以他們為研究對象，研究學習手語對嬰兒在語言發展、思維發展上有否幫助。如果這麼多老師都說這些孩子機靈，我才不相信做實驗時他們的成績會突然下滑。我們試圖收集證據向社會證明，手語不僅幫助聾生，也能幫健聽的孩子。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

由 2006 年開始，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在主流學校內引入手語雙語共融教育，展開《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為聾童搭建一條由學前教育通往大學教育的橋樑。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開設了嬰兒教育班，讓零至三歲的聾童和家長一同學習手語。到孩子稍長大，進一步參加幼兒雙語閱讀班發展語言能力。在 2006 年 8 月，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與平安福音堂幼稚園（牛頭角）合作，推行《幼稚園共融計劃》。在共融班中，六位聾童和十多位健聽學生一起上課，一位健聽和一位聾

人老師會用手語和口語教學，營造一個多感官的「雙語」教學環境。

另一間夥伴學校是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該校自 2007 年開始已推行《小學共融計劃》，在校內每一級都設有一個共融班，每班有六位聾生，該班也是由健聽和聾人老師合作教學。

老師、學生和家長的回應

以下是老師、學生和家長在一次採訪的回應：

健聽生煌熙：我覺得都不錯，因為可以認識到聾的朋友。

聾生雪盈（手語）：我和同學的溝通方法是用手語、口語及寫字。

老師指出健聽學生和聾生的學習進度一樣，學生成績能透過多感官的「雙語」學習環境改善，就連健聽學生家長也十分支持。

一位健聽生家長：反而是聾童幫助了我的孩子，因為這是一個鼓勵。我的孩子會想：為甚麼聾童的成績也可以這麼好，不會學得比健聽生少呢？真的，

他們反而學多了如何做人處事，和與人相處的技巧，最重要就是可以學多一種語言。

吳副校長：令我開心的是，學生完全沒有歧視或排斥，反而大家建立出一個共融的校園氣氛。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成效顯著。除了備受許多家長及專業人員認同外，聾健兒童對計劃的需求亦不斷增加。在學校內誰是聾生，誰是健聽生呢？有時候真的難以分辨，因為每一個學生都是歡欣快樂地上學讀書。

香港電台拍攝了一集關於一個聾的和一個健聽的學生的紀錄片《他和他的兩文四語》。這紀錄片參加了比賽並獲得殊榮。

聾學生的需要是公平的學習機會。影片中用手語接受訪問的聾生叫雪盈，她獲得了司徒華教育基金獎。她父親是一位醫生，知道女兒沒有耳蝸，想盡過無數辦法欲求女兒聽到聲音，但不成功。以我的經驗而言，這些學生通常在兩三年後便會「石沉大海」，不知去了哪裏。但雪盈卻有別的成長經歷，她的命運給聾生展開新的一頁。讓我們來聽聽雪盈爸爸如何說：

「慶幸我們選擇這個計劃，讓她用手語學習。因為她真的聽不到，不論我們怎麼逼她去聽，也是不行。對我們的孩子或其他孩子，若在聽覺上不能改善的話，手語其實對他們在學習、接觸世界及社交等方面都很有幫助。那些沒有參加計劃的舊同學都有相同的遭遇(在全班或全校中惟一聽障學生的環境下讀書)。有些聾生雖然已經六年級，度過了許多的生日會，但邀請的朋友仍舊是舊相識的聽障孩子，看不到有新朋友。其實，小學生涯中我們可以認識很多朋友。這令我十分感觸，於是，我和太太不想女兒同是這樣，故而選擇參加這個計劃。現在，女兒過生日，朋友愈來愈多，不論是聽障或健聽、同班或不同班都有。我們希望女兒能融入社會和學校，善度生活而不是自我孤立。

對一個完全聽不到的孩子來說，沒有音樂，沒有拍子，又怎能跳舞呢？這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奇蹟，但雪盈真的做到了。

以前，我一直沒有時間去看她在現場的舞蹈比賽。有一次，我到現場觀看她跳燈籠舞，親眼見着她那精彩的表演，非常觸動。她和其他孩子根本沒有分別，根本看不破她是一個聽障兒。當然學校老師、

同學和家長們都給了她許多幫助。那時我哭了，無比欣喜。由於場地黑暗，其他人才不察覺我的哭相。那一剎那，喜極而泣，自豪不已。我覺得她這樣也能做到，我們還有甚麼會是做不到的呢？」

聽過了關於兩個聾童父親的分享。一個費盡心機幫助女兒學習，雖然做了「狀元」，但女兒最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殊堪惋惜。相反而言，雪盈爸爸讓女兒學習手語，度愉快的學習生活，令人欣慰。

在共融班上課的感覺是怎樣的？現在給你看一看這個孩子，他初來的時候只有六歲半，他的語言能力只有一歲程度。無論用甚麼方法，這個孩子也聽不懂。剛加入計劃時，他經常扯着媽媽的衣服哭過不停，生怕媽媽離開。他現在就讀中四，看他如何憶述小六那一年的生活：

「在學校都可以看見和使用手語，令我開心。健聽同學也慢慢學習手語，學得很快樂。我覺得聾童獨個兒入讀主流學校是很可憐的；聾童每天看着老師用口語教書，健聽學生也只是說話而不用手語。沒有人陪我玩，感到很孤單、很寂寞。」

(問：上課時老師用手語會令你更容易明白嗎？)

「老師懂得用手語教書會較好，因為我較容易看得明白。對於不同詞語的區別，如果只用口語是很難明白的。」

（問：你最喜歡甚麼科目呢？）

「我喜歡英文。媽媽鼓勵我每天閱讀英文書，雖然一度想過放棄，但我想只要忍耐堅持下去，慢慢就會產生興趣，以後就會有進步，將來就可以在大學讀書。我希望可以繼續升讀中學和大學。」

我從來沒有聾生對我說過：「我要進大學」。剛才你聽到兩個聾生在中文大學讀書，且協助我做學術研究。以前，我每年都勸他「不如你考慮讀中文吧」、「不如考英文吧」——因為他們都不會想去考這兩科。他在我面前哭了多遍，跟我說：「Gladys，你不要再逼我了！」但現在有了聾人語言培訓後，他努力不懈，終於成功考上我們語言學系為本科，來年便要畢業。他跟我說笑道：他畢業時應該也要四十歲了。我想，何解要這樣浪費聾人的時間呢？

聾生教育需要聾老師和手語。我們的計劃是把聾老師放回融合教育中，他們並不是擔當翻譯的角色，而是做真正的老師。許多健聽學生會在心情難過時找聾老師

談心，連健聽老師也笑說妒忌，他們道：為甚麼學生只找聾老師而不找他呢！

聾人較喜歡上聾童學校，而非主流學校，因為後者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災難。主流學校內沒有人跟他們交流，非常孤獨。老師只用口語說話，而聾生又不知老師在做甚麼。他們就這樣在學校呆坐了十多年。所以，起初很多聾生都反對我們進行這個計劃，他們問為何要他們入讀主流學校，可以辦一所聾校，把他們安排進去。當時我也擔心，但再三思量後，覺得即使在主流學校，只要有聾老師和手語在同一環境中，聾生也能正常學習。聾老師們原先亦甚抗拒，或許顧忌我們會鏟除聾人文化。但看一看這位聾老師現在又怎樣評價這個計劃：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初期，我覺得蠻新穎的。有別於一般慣常所見的情況，不是聾校便是聾生就讀主流學校，這是一個聾生及健聽生在一起讀書的計劃，非常獨特。這模式真很創新！我一邊工作一邊觀察。誠言，在起初對此新計劃存有些擔憂及疑慮。」

（問：你在教學過程遇過困難嗎？）

「在《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推行之初，在合作上是有困難的。由於健聽老師不懂手語，

溝通上出現問題。但是，大家交流及合作了一段時間後，健聽老師的手語技巧改善，我們的合作和協作教學遂順暢起來。健聽老師能明白手語技巧改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會教他們手語，大家合作良好。」

兩文四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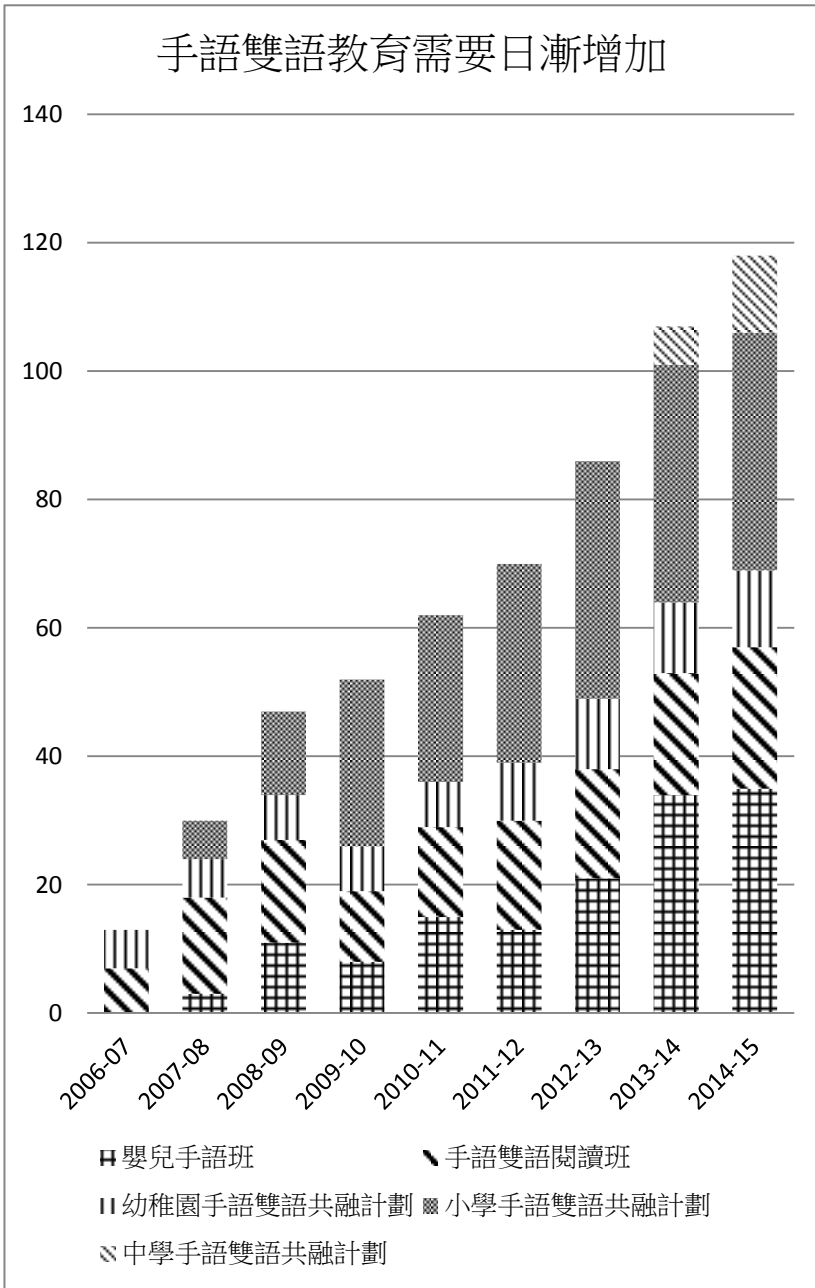
透過這些對話，我們理解到甚麼呢？計劃剛開始時，健聽老師不懂手語，聾人老師不能說話，兩者「雞同鴨講」（互相不理解的意思）。於是在溝通上大失分寸，感覺難受。但他們漸漸發覺如果健聽老師學懂手語，聾老師也熟習讀唇，大家便可用兩種語言交流。這些年來，本校的老師和我們的聾老師可說是合作無間，他們不是互相作為對方的翻譯，而是協作教學。原來一旦我們排除語言隔閡，剩下來的便是人類之間純粹的溝通、尊重與包容。

這個計劃在香港獲獎不少。像關愛校園獎勵計劃，最近且入圍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特殊教育），獲得社會的肯定，令人雀躍極了。2016年9月天主教教區進行教師培訓，邀請我們分享在融合教育的經驗，當中

包括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和獻主會學校的學生在一起。聽說有老師聽過學生的分享後，甚受感動而熱淚盈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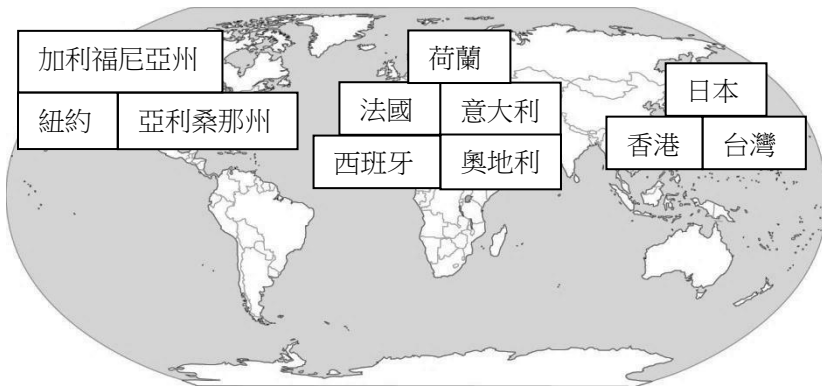
我們有聾孩子參與跳舞比賽而獲獎，也有聾生受邀出席音樂會擔任表演嘉賓。反映有一批聾生充滿着探索性，他們可以跟外界接觸和溝通。在接觸外界時，他們知道自己不必孤獨、憤懣地封閉自己或痛恨健聽人。由於與外界的接觸增多，這些學生明白健聽人的想法和心態，並知道該怎樣去和健聽社會溝通。

你可以看到人們對這個計劃——由嬰兒手語開始直上中學的路徑——的需求愈來愈大。剛開始時，家長對手語相當抗拒，認為它是遙不可及的東西。但當聾童日漸成長，家長看到他們快樂，才慢慢放下戒心。有些原先不肯參與的家長後來也後悔，想重新參加計劃，但可惜錯過了黃金期，因為語言不是一朝一夕的，孩子很難在毫無手語的基礎下跟上學習的進度。對這種情況，我們也無能為力，只得建議家長參加星期六的補習班。



在起初美國有兩處地方開始嘗試實行這項計劃，隨後有荷蘭，再接着是香港。起初我們可謂「摸着石頭過河」。在 2007-2010 年間，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地方也開始，最近還有日本和台灣加入。我們會幫助一些國家成立聾人教育計劃。與我們交流的國家包括新加坡、澳門、土耳其、比利時。不久之前，我回到母校愛丁堡大學作分享，蘇格蘭方面亦有聯絡我，表示希望在那邊進行這個計劃。蘇格蘭有 Sign Language Law（手語條例：編者譯），表明手語是現代語言的一種，故此學生可以選擇英國手語作為中學必修的兩種現代語言之一。

手語雙語聾健教育計劃全球逐漸擴大



(計劃發展中) 比利時、土耳其、新加坡、澳門

手語與正義

回到香港的處境談正義的話題。我們跟勞工及福利局和立法局溝通過，他們也認為手語很重要；但教育局卻不認受手語為現代語言，認為手語不應在主流學校出現，它只是聾人的語言。2014年，有議員替我們向教育局爭取，呈到立法會討論。當時有聾童出席，我們一同爭取屬於他們的權利，而家長和聾人組織亦在場外聲援。這個場面我一輩子銘記於心，只可惜教育局最終還是拒絕支持我們的訴求。

慈悲的天父永遠都給我一條生路，我們只須祈禱。後來我們展開募捐活動，目標至少達到讓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的學生能夠順利完成學業。李亮神父仁慈地替我們寫了一封信到各教堂尋求協助。我們節檢地用紙皮弄出兩個箱子作籌款箱用，走遍五十五所教堂，最後籌到約一百八十萬元，令人欣慰。

日後，我將在公教報把過去五年的心路歷程撰寫成文刊載。每一趟造訪教堂，教友們不但捐款還加以鼓勵。有些神父不僅提供我們一個發言的機會，還會親自代言助勢，呼籲教友慷慨解囊。這些都讓我相信人性本善，就是天主的慈悲。

用手語認識慈悲的天主

雖然我們接收了一批聾生，讓他們能愉快地接受教育，但我還是不滿意。為甚麼呢？縱然我們給他們良好的教育，但作為教徒，我該怎樣做才能讓他們認識到聖經中的耶穌呢？這是我不滿意的地方。

這十多年來，我們艱難地築建起聾人的升學的路徑，但對他們的靈修生活，我們又做了多少呢？這是我希望在餘下來的時間實踐的事。我對計劃本身已經覺得相當滿意了。現時，無論是學校或資金方面，都能支持計劃延續下去。像簡神父說有多少錢便做多少事。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我特意將這計劃放在教會學校推行，我要多做一件事，就是讓孩子明白聖經中的耶穌，有多麼疼愛他，施予他們機會接受良好教育。祂是慈悲的天主。我希望在退休後可以實踐用手語教他們天主的道理。像我剛才所說，以前的人也曾用手語來傳達天主的訊息。我們現在未做到這件事，希望將來可以將天主慈悲的訊息繼續傳揚下去，並發揚光大。

《從聾人手語看天父的慈悲與正義》 的神學回應

夏志誠

在我思考怎樣回應時，讀了一下福音，恰巧看到剛才鄧教授提到的那段經文。我特別留意到「有人」為耶穌帶來一個又聾又啞的人，那些人當中，鄧教授當然是其中之一。我不去覆述那個故事，但會從慈悲和正義的角度來講。

慈悲對苦難，就像剛才我們聽到那個自出娘胎便聽不到的聾人，對於他的遭遇，我們會流露出惻隱之心。但是，是否每個人都會懷有惻隱之心呢？孟子說人有善端，像經過井邊看到有小孩子快要掉下去，人便立即出手相救。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環顧我們現今的人類社會，卻讓我們開始懷疑如果人真的擁有善端，為何人間會有這麼多的衝突和矛盾呢？

苦難能引發慈悲心，而具有慈悲心的人能給人感受到人性的光輝。但在現今社會，這種人卻好像不太尋常。讓我們作深層一點的思考：人與人的相處是慈悲還是競爭呢？「慈悲」應該譯作“Mercy”。但從英文的角度來看——好像有點玩弄語言，它是 Competition（競爭）還是 Compassion（憐憫）？香港是一個充滿競爭的社會，人與人的相處充滿鬥爭，甚至夫婦或是一家人也會鬥爭，像是爭持子女聽從哪一方的話，或比拼誰能賺取更多錢，誰有更多的話語權等。究竟這是競爭還是慈悲呢？

當然我們有時候也會發善心對人好，特別因為今年是慈悲特殊禧年，教會內也有很多像基層飯局等活動。各大堂區以往在酒樓設宴舉行堂慶，但今年很多堂區都安排飯局，只是簡單地在學校禮堂辦自助餐，這是一件好事。值得反思的是，我們這樣做是否為使自己好過一點呢？即做好事成為一種心靈的自我安慰。那麼，慈悲是否會變成勝利者的施捨行為呢？抑或是，按正義的標準來看，弱勢者也應該擁有某些權利呢？像剛才我們聽到聾人也應該有某些權利，並非出於慈悲或善心。這就回應了我們今天的主題《慈悲與正義》。然而，慈悲與正義能否共存呢？能否平衡呢？

從天主教教理詮釋正義，正義是一種德行。這是一種恆久堅定的意向。正義包含有兩個面向：對天主和對近人。

對天主的是虔敬的德行，因為天主是至高無上的神，所以我們應以虔敬天主作為回應。對天主而言，這就是正義(justice)；當中的“Just”是指應該的。像在彌撒當中我們所說：「這是理所當然的」。

對人也一樣，每個人應有自己的權利。人的尊嚴又從哪裏來呢？當你仔細看整部教理，特別是倫理部分，便會知道人的尊嚴並非來自意識形態——如法國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愛，因為該等價值可能會流於絕對化。天主教講求事事從天主的角度出發，即由宗教所衍生。所以說，人的權利是來自天主，這是由於人本身是天主的肖像，每個人包括聾人也是，故他們都應受到尊重。社會基於大家擁有同等的基礎，每一個人都被尊重，才能臻至和諧、平等和公益。

我特別選擇《肋未記》第十九章 15 節的經文：「不可袒護窮人，也不可重視有權勢的人，只依正義審判你的同胞。」我們常說應當照顧窮人，這裏卻叫我們不可袒護窮人，不要特別重視有錢人，而是依正義去審判我們的同胞。正義究竟是甚麼呢？這裏沒有解釋。但我特別欣賞「審判你的同胞」這點，即不論他是貧窮與否，你也要把他當作跟你一樣的人。我欣賞鄧教授說過的一句，聾人不需要你特別可憐，只要有公平的機會。

另外，在《哥羅森書》第四章 1 節寫道：「作主人的，要以正義公平對待奴僕，因為該知道，你們在天上也有一位主子」，「正義」一詞再次出現。可想而知，在天主教「正義」離不開天主，我們在天上還有一位真正的主人。謹記這一點，我們才能找到正義。

慈悲，要由慈善的行為說起。我們藉着慈悲的行為，關心身邊的近人，無論在肉身或精神上的需要。當中，施捨給窮人正是兄弟友愛的一種見證，亦是以正義行為悅樂天主的方法。這裏涉及兩個層面，對神和對人。對人方面，施捨給窮人是兄弟友愛的一種見證。見證是甚麼呢？不是創新的行為，也不是無中生有；而是一見到便可證明這是應該的行為。兄弟友愛是人與人之間所應有的事，我們只不過實踐出來而已。悅樂天主又是甚麼意思呢？指的是我們每人都是祂的兒女。整個意思就是說慈悲帶有一種應然——應該做的意思——不是只出於好心而已。天主對我們慈悲，我們也應對其他兄弟姊妹慈悲，以見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於愛。

天主教的教理中談到人世間有很多困乏，不少人承受了很多悲慘的遭遇，就像聾人、窮苦人那樣。人往往被困在眾多困乏的形態內，如物質缺乏、制度上不公義的壓抑、生理和心理疾病等，例如聾疾是屬於生理方面的遭遇。最後，

每個人還要面對死亡，人就是這樣，人間充滿着這些悲慘和脆弱，正是顯示人性的標誌。

人自第一次犯罪後就陷於脆弱之中，極需救恩。但為何這與犯罪有連結呢？在信仰而言，人犯罪，就是離棄天主，離開愛的根源。物質的缺乏、不義的制度，各種疾病，甚至死亡，本在人間必然存在。由最初第一人到最後的一個人，都會經歷疾病、衰老和死亡。但若你離開天主，你的痛苦會因着靈性之貧乏，而變得更加難受。在這種困境下，耶穌卻願意成為兄弟中最弱小的一個，且與他們同在。

我覺得剛才所分享的計劃，特別的是能夠讓聾生與健聽學生在融合教育中一起成長。這種「同在」與「認同」對他們是一種莫大的幫助，我想這也是令他們喜樂的一個主因。耶穌就是選擇了這條道路——與我們同在，活出慈悲與正義。

今年是慈悲特殊禧年，教宗方濟各如何闡釋慈悲與正義呢？他在《慈悲面容》慈悲特殊禧年詔書的第 20 節中提到：「正義與慈悲不是兩種矛盾的事實，是同一事實的兩個幅度。逐步揭示，以達到高峰——愛的圓滿。」這裏有兩個向度，慈悲與正義。但兩者並非同時出現，首先是正義，然後是包含了正義的慈悲。

第 21 節提到單有正義是不足夠。經驗指出，倘若只求伸張正義，人或許導致正義沈淪。像在香港，立法會內每個人都主張自己才是正確的，同時社會亦愈來愈極端，缺乏了一些「潤滑劑」。有權力便盡用，因為是自己的，便可以胡亂用盡，這就是正義嗎？教宗說這不是正義，第 21 節又指出：「只求伸張正義會導致正義淪亡。故此，天主以祂的慈悲和寬恕來超越正義。但這不表示正義被貶抑或不必要了。相反，任何人犯錯都必須付上代價。」正義是必須的，但正義只是一個開始，不是終結。天主涵蓋正義，以更偉大的來超越正義，那就是祂的寬恕與慈悲。

我自己為這個主題在搜集資料時，主要針對貧窮方面。我們談及正義時，會想到香港的貧民愈來愈多，致使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根據樂施會的報告指出，在職貧窮家庭的數目由 2010 年的十七萬戶增至 2014 年近十九萬戶。兩三年已過去了，現今貧窮的人必然更多。然而，社會的一些措施卻讓窮人覺得不被尊重，如強積金對沖等。

半年前，我們提及全民退保時，曾經討論過這個議題。但不知是否因為過了諮詢期或是甚麼原因，整件事就不了了之。大家值得思考一下，慈悲特殊禧年不僅是去實踐愛德行動如施衣贈飯等去解決他人的燃眉之急，也應該檢視制度上是否存在問題。為甚麼接濟飲食的人會愈來愈多呢？香

港是否需要更多派飯的「明哥」¹²呢？這是否又一件好事呢？

如果要談慈悲的話，引用教宗方濟各的說法：先要看一看當中是否正義，以此作起點。這亦是教宗在慈悲特殊禧年的呼籲。

在這禧年，教會期盼我們能向社會的邊緣人士開放心懷，包括剛才提及的聾人。「邊緣人士是現代社會所造成的。」（《慈悲面容》慈悲特殊禧年詔書》第 15 節），這句話我在很多場合也曾分享過。我們不去關心弱勢者或貧民、被排擠的人，反而推搪說他們能力不足、走運，或乾脆說他們懶惰，這都是不對的。這些問題都是現代社會所造成的。現今社會上，有多少人生計不穩和痛苦度日呢？有多少人生活困窘、捉襟見肘的人，他們的呼喊被富裕者的冷漠遮蔽着。

教會在這禧年奉召去治療這些創傷，以慰藉之油舒緩貧困，以慈悲包紮，以精誠團結和不懈的關懷去醫治有需要的人。剛才鄧教授分享如何幫助我們聽障的兄弟姐妹，令人感動。我也希望他們能有機會聽到福音和彼此分享。在台灣的社會也有這種情況，但他們有聾人教會。我希望香港在這

¹² 明哥，原名陳灼明，深水埗食肆東主。他經營的北河燒臘飯店一直向區內長者供應廉價飯盒，被稱為「窮人愛心飯堂」。

方面可以趕上步伐，有一兩位神父參加這個計劃，包括學習手語。我希望有機會去學習手語，好能為聾人主持彌撒。

第四講
天資無極限 盡在有心人
—— 慈悲的教育

賀若瑩

(前)明愛專上學院
高功能自閉症課程講師

林祖明

教區傷殘人士牧民委員會委員

《天資無極限 盡在有心人 ——慈悲的教育》

賀若瑩

十八年前，我成立了一所資優人士中心，從這群資優人士的天賦，我看到天主的愛火臨現在他們身上。不論他們是小孩、青年或年長者，他們的智力都特別高於水平，約頂尖的百分之三或以上。在過去的大概八年，我開始接觸較多高智能而又有自閉症的人，即今天所謂的「高功能自閉症」(High Functioning Autism, HFA)。我嘗試去推動他們學習、協助他們珍惜自身的特殊天賦。

「自閉症人士：賦予希望」

2014年，教宗於梵蒂岡舉行一個國際性研討會，主題是《自閉症人士：賦予希望》。這個「賦予希望」

是雙向的，並非只是我們賦予他們希望，他們也給我們希望。研討會上，約有五、六十位國際專家雲集，千載一會。相信是因為大家受到教宗的愛心感染，方有如此規模的三日會議。我亦依循 2014 年會議的願景，繼續去關顧這群弟兄姊妹。



PONTIFICIUM CONSILIUM
PRO VALETUDINIS ADMINISTRIS

**XXIX Conferenza Internazionale
XXIX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La persona con disturbi
dello spettro autistico:
animare la speranza**

**The Perso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nimating Hope**

20•21•22 novembre 2014

今天，我的分享有四個範疇：(1) 講解甚麼是自閉症、高功能自閉症、亞氏保加症，給大家辨認高功能自閉症學生的特質，(2) 聆聽高功能自閉症者父母之心路歷程，及他們所需的支援服務。我邀請了 Chapman 和他的媽媽來到我們當中，向大家現身說法。(3) 欣賞高功能自閉症學生的獨特之優勢，(4) 在高功能自閉症人士身上發現和光榮基督。隨後，林神父會帶領大家藉此去了解慈悲與正義。

關於自閉症

自閉症究竟是甚麼的一回事呢？大家有否聽過「雪櫃阿媽」(refrigerator mom) 呢？相信你們聽過阿媽，但未聽過雪櫃阿媽吧。它是一個指控的名稱，流行於五十至八十年代初，指自閉症者母親雖屬於知識型中產家庭，但對子女表現冰冷，故造成子女自閉症。我們現在知道這是完全錯誤的。另有指控是涉及心理問題，說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不快樂，故而導致自閉症，這亦是錯誤的。至於嬰兒的防疫注射會否造成自閉症呢？雖一直都有人如此說，卻仍未有研究結果可作依據。然而，可以明白的是當小孩子被斷定有自閉症時，父母會很想找出原因或杜絕的方法，這種

源於恐懼的心態可被理解，但自閉症源於防疫注射的論點，則未有科學証據可以支持。

那麼，甚麼與自閉症會相關呢？遺傳基因。人腦掃描技術讓我們知道自閉症者的腦內一些區域之白物質和灰物質的比例，與常人異。可知的重點是，今天的腦科學及掃描技術告訴我們，自閉症是腦神經發展性的生理問題 (medical condition)，且這往往是隱蔽性的弱能。你可以辨別一個聾、盲、癱，有身體傷殘的人是怎樣的，但社交傷殘則不能憑肉眼去知曉，尤其他們的外表與常人無異。

在關顧他們的時候，須了解他們的表徵是各有不同的，就像這一幅星座圖，滿佈不同的繁星和意想不到的綜合圖案。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在 2016 年的數據顯示，在六十八個人中會有一個是自閉症人士，但韓國在 2011 年的數字則顯示三十八個人中就有一個。

高功能自閉症

何謂高功能自閉症呢？最新的數據發現，高功能和低功能自閉症者的人數相若。甚麼叫做亞氏保加症 (Asperger syndrome) 呢？它在台灣又名亞斯伯格症，屬於高功能自閉症的一群。自閉症的研究在近年急

升，為何這麼多人開始關注自閉症呢？

我們首先看一看有關的診斷。我們採用的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 (DSM-5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the fifth edition)。根據此手冊，自閉症是一種社交情感溝通的缺損及非典型狹窄興趣或重覆行為。我相信這是一個精簡的描述。高功能自閉症是自閉症的一種，從腦掃描技術中我們發現在腦的前額葉有幾個重要的功能，而自閉症者的這幾個區域明顯地不活躍 (hypoactivation)。這些腦區的功能，包括了自我調控恰當的行為和自我認識。他的自我知識是很薄弱的，例如關於他的感覺如何、作甚麼決定、是否記得母親曾怎樣的疼愛他、或父親如何對待他等。又例如在面試時被問到他懂得甚麼，他把未完全知曉當作自己不懂，這令他們的自我推銷 (self-marketing) 出現問題。

至於心智化 (mentalizing)，即可以思考自己在想甚麼以及別人在想些甚麼，他們於此也有困難。所以，你要他易地而處，為他而言是不可思議的。他可以努力去學，但他不是類比型 (analog)，而是數碼型的 (digital)，即他要先有別人去教導和給他分析邏輯才行。讓我直接解說甚麼是「情盲」。我們一般都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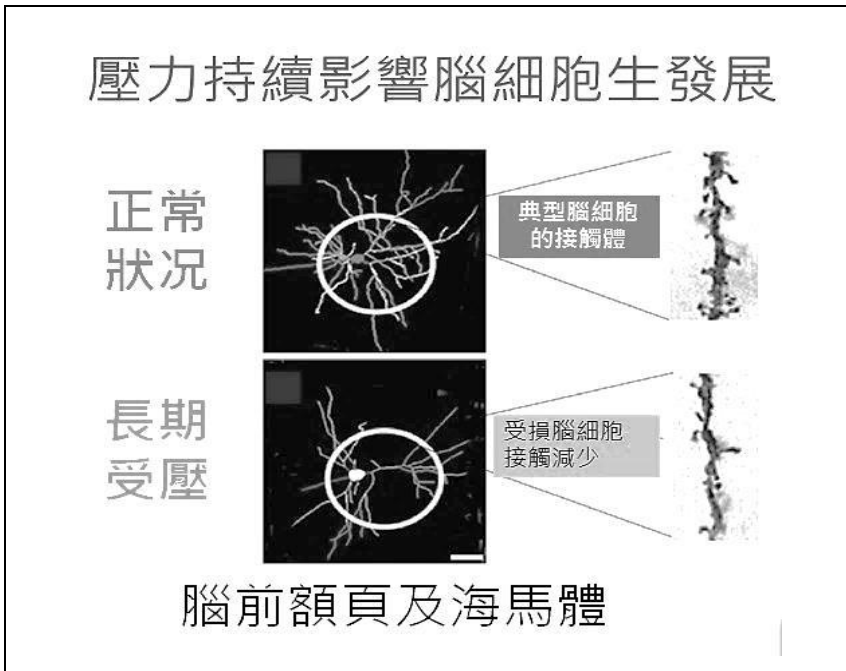
尊重及遷就文盲、眼盲的人，但對情盲則不如是。譬如有一個中學生知道他的校長生日，便問他年紀多大和何時回到天鄉，這對自閉症人士而言，只是一樁小事，更可視為一種關懷的表達，因為他重視對方才會去問。

他們的情緒特別脆弱，會對很多東西擔心或驚恐，且驚恐的類別很多，可以是對機器、聲音、天氣、高度、顏色、水、別人的行動或自己獨處的時刻等。曾經有一個研究，實驗中拿出一些驚嚇的圖片給受驗的自閉症者和典型人去看，典型人即一般人士。結果顯示，典型人比自閉症者更感恐懼，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再給兩組人看，典型人已不再恐懼，但自閉症者仍保留着驚恐，難以消弭。

信仰對高功能自閉症者的啟示

接下來，我講一下焦慮的起因、經驗和對應的策略。焦慮的起因原來可以很多，其經驗和對策也不少。首先重點說一下他們的情緒調節。不管有否自閉症，凡長期受壓，腦細胞出來的樹突棘（dendrites spines）會受影響而減少，正常的情況下應該是茂密的。持續有壓力是不健康的，對高功能自閉症者更是

不利。有自閉症譜系障礙者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可以因壓力累積出來三至四種精神病，一般而言也有兩種。所以，他們比一般人較易患精神健康問題，如焦慮症或抑鬱症。關於他們的執行能力，一般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不能做好，例如家長不易喚起他們起步做功課，因為他們在聚焦、堅持、情緒、記憶力、坐言起行方面，皆有困難。你可能說每個人都會面對有些困難，但現在說的是他們差不多在每個範疇都有困難，特別是那些高智能的孩子身上，確實令父母很擔心。



所以，我的第一個「貼士」是向他們推介信仰。早一點接觸信仰，對高功能自閉症者會有甚麼好處呢？為何對他們有好處？因為自閉症者仍可憑藉智力，透過聖經中的道理，認識愛人如己、愛天主在萬有之上、甚麼謂之愛和甚麼不正確。因為有道可循，他們便不用在人生路上兜圈子。自閉症者是會講道理的。你可以跟他們交談信仰，比如說人類製造的東西很多，但人類可曾創造宇宙呢？答案是沒有。即是有一個比自我更大的存在，人稱之為神或天主也好。而人不是多餘的，人要去表現出所被創造的價值。就是這般的討論是幫助他們的方法之一。

我的第二個「貼士」是要幫助改善他們的執行力以及教他們如何替別人著想。

還有第三個「貼士」，他們要知道自己是否有感知統合失調(Sensory integration dysfunction)，包括三個層次：觸摸、平衡系統和大小肌肉協調。他們很多時會較遲頓，但天份卻高。劍橋大學有對高功能自閉症者作研究，稱他們為超級系統者(hypersystemizer)，即他們對自己喜歡的東西會以整個系統地去學、且認識內裡的所有細節。

我有一位舊同學的女兒有高功能自閉症，她參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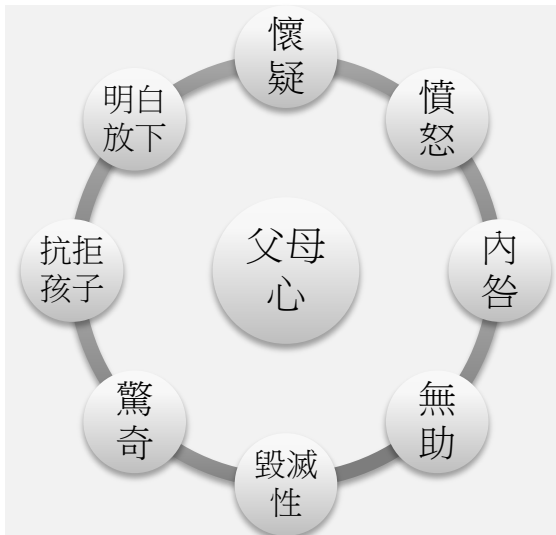
全國韻律操並取得第四名，因為她的肌肉運動系統非常了得。現在很多知名公司譬如軟件公司、德國的SAP（中譯：思愛普，全球最大的企業管理和協同化電子商務解決方案供應商）、Goldman Sachs Group（中譯：高盛集團，華爾街最著名的投資銀行）、Microsoft（中譯：微軟）、HP（中譯：惠普）等，都會向那些有收錄高功能自閉症者較多的大學如劍橋大學招攬人才。如果我們只從一個苦難的角度來看待高功能自閉症者，覺得他們很可憐而以慈悲心對待，那是荒謬的。我接觸那些家庭時，他們雖然經歷了不少難關，但仍然積極面對，勇往向前。高功能自閉症者中約有百分之六十是有特殊才能的，我們應去發掘孩子的才能。重點是知道他們是天主所創造愛的禮物，這才是大家該行的正途。



父母的角色

關於家長，他們會經過的心路歷程如下：懷疑、憤怒、內咎、無助、驚奇、抗拒孩子、明白而放下。家長如何解困呢？像正面思考、接納、計劃、接受別人幫助、積極應付和依靠信仰。有研究發現約有二、三成的家長要依靠信仰來解困。至於接受別人幫助，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不同的階段，家長有着不同的心路歷程。稍後，Chapman 的母親會與我們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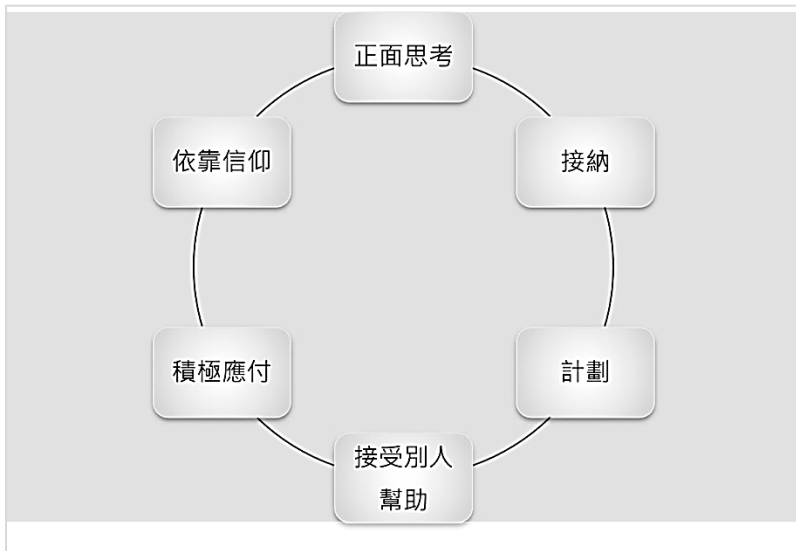
診斷後父母的心路歷程¹



¹ Andreica-Sândică, B., Patca, S., Panaetta, A., & Andreica, A. (2011). The impact of autism diagnosis on the family. Acta Medica Transilvanica, 16, 478-480.

曾經有一個研究關於自閉症孩子的母親在不同階段的心理壓力，對象是百多個三至三十六歲的母親，研究發現自閉症者的問題到了初中階段更嚴重，到高中時的問題也不見少。為甚麼呢？因為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尤其是由小學升中的一個轉折點，對自閉症學生來說是十分艱難的。在中學階段學生要往來不同的課室並整理儲物櫃，要求學生有組織能力，知道上甚麼課需要用甚麼書本；再者，同儕交往要先知道自己的興趣和社交圈子才容易建立，那是難如登天。

父母如何解困？²



² Andreica-Săndică, B., Patca, S., Panaetta, A., & Andreica, A. (2011). The impact of autism diagnosis on the family. *Acta Medica Transilvanica*, 16, 478-480.

自閉兒的社交能力水平愈來愈低，為何呢？因為社會不明白他們，不去遷就或給予機會，令他們的情緒更惡劣。這是所謂的內化行為，即孩子開始抑鬱、憎恨或怪責自己，尤其是高功能自閉症兒知道自己力有不逮，特別在社交方面。假若他們未有這個意識還好，知道了就會難受。我有一個十五歲的學生，他沒有朋友，不跟別人打開話匣子，只愛玩遊戲機。他玩遊戲機時會分析操作技術，即平衡獎賞和風險，實在聰明。最近我從美國開會後回來，於十一月一日與他見面時，他表示本來想於十月三十日自殺，因覺得自己是廢物，但他說自己只定了日期而未有定下時間和方法，結果還是自殺不遂。

孩子由學前到高中階段，作為母親得到機構的支援愈來愈少。似乎大家都假設志願福利機構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應該集中服務年幼小孩而已，這固然是；但問題是孩子會一直長大到老。故此，現在已經有研究試圖探究耆老高功能自閉者的安老服務，如何設計其老人院。最近我在美國開會，知道了當地開始研究醫院內的急症室如何幫助有自閉症的病人。

提供幫助自閉症者時，須要從各個方面去做，包

括特殊教育者、老師、治療員、精神學家等，且要有一個協調員，否則父母不清楚如何安排和要做甚麼。在美國讀大學，可以用一些叫作個案經理（case manager）協調一切，每月收費約四萬元港幣，不包括學費和住宿費，價錢不菲。

感受高功能自閉症者的慈悲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案。DC 是一個女生，她在十三至十六歲期間經歷了一些事情。中一時她考第一，卻沒有朋友、受盡同學杯葛和隔離，在校受情緒影響，上課難集中，遂出現抑鬱、拒學、自殘及有自殺傾向。

她是一個身體力行且有挑戰心的孩子。她來找我，說她自己資質優、智力高，但不喜歡人家謔笑她是資優生或會考十優生等話，故她要推翻這荒謬的想法，打算考出十個最低分，即是“U”來證明。我對她半打趣說，你考獲十個“U”後，還要付出十多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再在報刊登載這一則資優兒考獲十個“U”的新聞，成本十分高。出生草根階層的她，根本沒有足夠能力改變社會對這類資優生的既定觀念。

她在十六歲時被診斷有亞氏保加症，醫生不知何

故給她服用一種使得她終日昏睡的藥物(Prozac)，結果影響了課堂學習。她在十七歲修畢中學，但會考成績只有中文、數學兩科合格。她的母親知道她是資優兒，很想幫助她，便帶她來見我。她有不少優點，我欣賞她的幽默感、反思能力、積極態度、思考人生哲理等；但她也有弱點，比如說，忘我（不懂為自己考慮）、多重感知統合困難。後來，我聘用了她，亦同時指導她。她替我工作八年後，開始追尋自己的理想。由於她喜歡哲學，我曾請求哲學院的一位教員給她旁聽哲學和做功課，她高興不已。

她想過自尋短見。為甚麼她會有自殺的念頭呢？原來當她被診斷患有亞氏保加症時，有一位政府醫生給她一本書，一本關於弱智的書，使她以為自己是弱智，心裡難熬。

她富於正義感，且很關懷動物，但亦對物件有感覺。就像她很愛咖啡，知道了國際金融中心內的一間咖啡店要換咖啡機，便去跟他們理論，請他們不要換機。她亦有參加環保團體的活動，本來比較害羞和內向的她，會在公開場合裝扮白海豚示眾抗議。當她離職時，我請了一個畫家給她畫一幅畫像，送贈給她。

後來她再沒有用藥 (Prozac 或 Zoloft)，我仍有跟

她聯絡。她現在到狗場去做義工，悉心照顧患癌狗隻。感謝天主，她教曉了我很多東西。我從來沒有對她慈悲，反而是她對我慈悲——忍受我，像是我曾經帶她去用午膳，卻無意挑了一個為她來說燈光太強的地方，事後她才告訴我。

現在，我請 Chapman 和他的媽媽出來跟我們分享。我先請他的媽媽分享撫育兒子長大成人的心路。

Chapman 媽媽的分享

「在這個月，我的兒子剛滿十六歲。回頭看，整個過程是大家在一起成長。我在讀書時，從沒有學過心理學，不知道他在年幼時出現的是甚麼問題。在他幼稚園二年級時，他的班主任告訴我要帶他去見醫生，那我問他甚麼類型的兒科醫生比較好。他建議我先帶兒子做智商測驗(IQ test)。在十幾年前，如果孩子有麻煩，會先做智商測驗去看那裏出現問題。

於是，我帶他去做智商測驗。我記得當他做完測驗出來時，在房外大聲叫了三句：「很好玩呀！很好玩呀！很好玩呀！」我便問那位臨床心理學家測驗有甚麼好玩，他卻回答根本沒有甚麼給小

孩玩的東西，我便覺得奇怪。

再見臨床心理學家時，他第一句便對我說：「恭喜你！」我問他恭喜甚麼，他回答道我兒子智商(IQ)頗高，達 150 以上。他說見過像我兒子的這類小孩，都會表現怪異；但我很幸運，兒子的表現不算奇怪，且算是一個愉快的孩子，故可以到平常學校上學，應該不會有麻煩的。

即便如此，我相信當時學校應該覺得我兒子有些麻煩，才建議我們去看醫生。我再問那位心理學家有甚麼可以諮商來幫助我兒子，例如在情緒或學習支援。他回應說他們沒有甚麼可幫忙，只是當我有煩惱時，可以預約跟他傾談，其餘沒有甚麼可以幫上忙，只有自己因應情況去處理吧。我便枉費心機的帶兒子回家。

直到有一次到日本旅遊，旅行團中遇到賀若瑩女士，便想起在電視節目中見過她，我用了數天的時間去回憶她究竟是誰。後來終於給我記起了，在旅途中我不想打擾她，等到有一個機會，才接近她表白我的無助，不知有甚麼支援。接着，我便開始正式諮商賀女士，同時也求診精神科醫生。

我的兒子和幼女經常嘲笑說我喜歡看醫生，

並會看任何類型的醫生，更會帶他們去看。這是因為我覺得自己不足夠，且相信專業的支援，便帶他們去看不同的專科醫生，聽一聽多方的意見。這是由於兒子除了亞氏保加症，也有焦慮，不知可否這樣說，亞氏保加兒通常會有焦慮，再加上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ADHD)，所以他有三個“A”。

我不是一個專業人士，只是一個普通的母親，且我比同齡的朋友早有小孩，故沒有甚麼人可以支援自己，唯有見步行步，去找不同的醫生。除了賀女士之外，我亦遇到一個非常不錯的精神科醫生，就是他和賀女士一起幫助我兒子的成長，直至今年，他要考中學文憑試(DSE)。

回想整個過程，兒子年幼時，他對很多事都未能明白，高小升初中是最艱難的階段，我嫌棄過這樣一個小孩子；但他現在長大了，反而我很感恩有這個孩子。我覺得亞氏保加兒在年幼時雖然難以駕馭，但慢慢長大後，他會突然轉化，明白自己做甚麼。回想過去，我們還以為兒子會是一個數學和理科的專才，便不斷地朝著這個方向栽培他；但他慢慢地知道自己喜歡和追求甚麼，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最近，我看了另一個精神科醫生，我把這些

都告訴他，包括我女兒也出現同樣問題。他說我未因此而患上抑鬱，已經要感恩了。因為，難聽一點，我有一屋子的「怪物」——我丈夫也有亞氏保加症，而我女兒雖未被診斷亞氏保加症，但是她有焦慮。我的每一天從一起床開始都要面對許多不同的問題，我需要找人幫忙。

我的丈夫也有亞氏保加症，或許我可以說亞氏保加者在情感上是傷殘的，故我在情感上不能倚賴他，於是把情感全投放到兒子身上。而兒子好像因着這投射而明白多一點。我的丈夫其實不懂得感情交流，或許在他的過去，兄弟姊妹多的緣故，父母未能對每個子女的成长都有全面的照料。相反而言，我自己情感豐富，便把感情投射於兒子身上。兒子打從年幼至初中都不懂得如何去辨認別人的面部表情、去關心人和理解他人的感受。高中似乎是一個分水嶺，從那個時候開始他突然明白別人關心他是甚麼的一回事——因為家人擔心他作為亞氏保加兒不容易交朋友。

我還記得自己跟精神科醫生憂心忡忡的說過：我們當父母的，終必先離世，之後掉下他一人，他如何是好呢？幸好，到他上高中後，似乎開始懂得交朋友和知道誰是朋友。他跟我說有一次在

學校突然拉肚子，急步跑進廁所，要出來時才發現沒有帶備紙巾，不知所措之際，有一個同學拿來紙巾給他用。我便對他說，這就是朋友——朋友會先留意你的事，知道你發生甚麼事，亦估計你可能發生甚麼事情，再而用行動去關心你。

我兒是一個不懂結交和維繫友誼的人，但在高中時他遇上了幾個好朋友。父母始終不能陪伴他走完人生路途，他必須有自己的朋友左右相輔，不然就叫人憂心纏綿。所以，我很高興遇上了可以幫助他的人，非常感恩。這是我的小小分享。」

Chapman 的分享

我是 Chapman，今年唸中六，將會在未來的四月考中學文憑試 (DSE)。我八歲時確診高功能自閉症，那時我是小四學生。這十年一路走過來，很想感謝身邊的人的支持。我是幸運的一個，因為身邊有這麼多人和資源支持着我。但是，社會上不是每一個人都像我般幸運，還有許多高功能自閉症人士未必獲得所需的支持，特別是有些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高功能自閉症，無從入手。我希望能夠幫助其他有高功能自閉症的人，喚起其他人的關注。所以，我近期開始進行高功能自閉症的研究，訪問

了 227 個有大學程度或以上人士，了解他們對高功能自閉症的認識。

結果發現許多香港人似乎都聽過高功能自閉症，但他們根本不太清楚，這很嚇人——因為一知半解比完全不知更差，有些人可能會好心做壞事，給予高功能自閉症一些非他們需要的東西，反而令他們難受。因為這些做法故意突顯高功能自閉症的問題，使得他們有被抽離的感覺。

探討過程中，曾經訪問社會上不同的持份者，詢問如何幫助有高功能自閉症人士。當中包括剛才提及的精神科醫生——他在我的成長路上給了莫大的幫忙。我問他：政府到底給了甚麼支援予高功能自閉症人士。他回答說：高功能自閉症在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診斷類別。在外國(例如美國)也許會把高功能和低功能自閉症分開處理，但香港沒有這樣做，結果令到高功能者接受低功能者的支援，這是不恰當的。另外，隨着孩子成長，一般非牟利機構所給予的支援卻愈來愈少，中學階段的支援明顯地比小學階段的少，因為這些機構均是重點支援三至十二歲的孩童，忽略關注較年長的學童。其實，對於學童成長和日後的定位，中學階段才是最重要，故此我認為中學階段去給予支援更有意義。

我希望在日後可以推廣高功能自閉症的有關活動，以幫助其他有此問題但未有足夠支援的人士。

這是一個別具意義的分享，由當事人研究自身的情況。

《天資無極限 盡在有心人 ——慈悲的教育》的回應

林祖明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聽了賀女士的分享，發覺自己對高功能自閉症的認識是無知的，現在可說是大開眼界。我所接觸的是教區傷健委員會內一個專為自閉症學生及家長而服務的委員會。我們有慕道班和每月一次彌撒，那都是特別為他們而設的。在聽 Chapman 說話時，我留意到他有眼神交流和感情流露，像我們所說「知情意行」吧。由「知」帶到「情」，再到「意」和「行」。剛才所講的，令我想起聖經中的真福八端。我看過一本書名為《八福》，真福八端中的第一端是甚麼？神貧的人是有福的。這是很特別的，貧窮怎會是有福呢？有所缺乏，又怎樣有福呢？這包含了一個解釋，因為你知

道自己缺乏、不足，才肯伸出手讓別人帶你。Chapman 媽媽知道自己兒子的情況，不恥下問去看醫生，和找人幫助兒子。這就是看到自己的不足而去找人幫忙，這是一種福氣。那本書提到缺乏不是一件好事，誰也不想這樣；但如果知道自己不行而能夠不恥下問，那便有福。此外，我在過程中看到作為父母的堅強，這份堅強增加了她承受壓力的能力，而問題只是能持續多久，及我們如何或有甚麼資源去幫助他們承托壓力。

給自閉症人士的彌撒

賀女士談到要及早發展他們的信仰。我們委員會就舉辦了一個名為《樂融融》的慕道班，當中有些學員是有中度或是嚴重的智障或自閉症，他們的年齡不一，約由七歲至三十歲左右。在那裏，有愛心的導師幫助他們認識天主、如何進入教會、洗禮等，而課堂是以彌撒作結束。我們發現彌撒真的能夠幫助他們，因為有些自閉症同學偶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情緒發洩時可能會大喊或甚至跑上祭台，這在一般堂區難以見到，因為他會迅速地被人從祭台上拉回來。我們安排專為他們而設的彌撒，就好像給他們一個地方安

心參與彌撒、祈禱和表達信仰。這種特別支援在我們教會內仍是起步階段。希望有更多人知道，那個地方為學童來說是沙漠中的綠洲，讓他們在那裏歇息，不必承受別人的奇異目光。

我們中心為此服務已有十年光景，現時在善導之母堂有慕道班和彌撒。今天，我帶來一些石膏作品，知否是誰製作呢？



他是展鵬。他是我們的學員之一，我估計他屬於高功能的類別。他學了用帽子去製作這些手藝品，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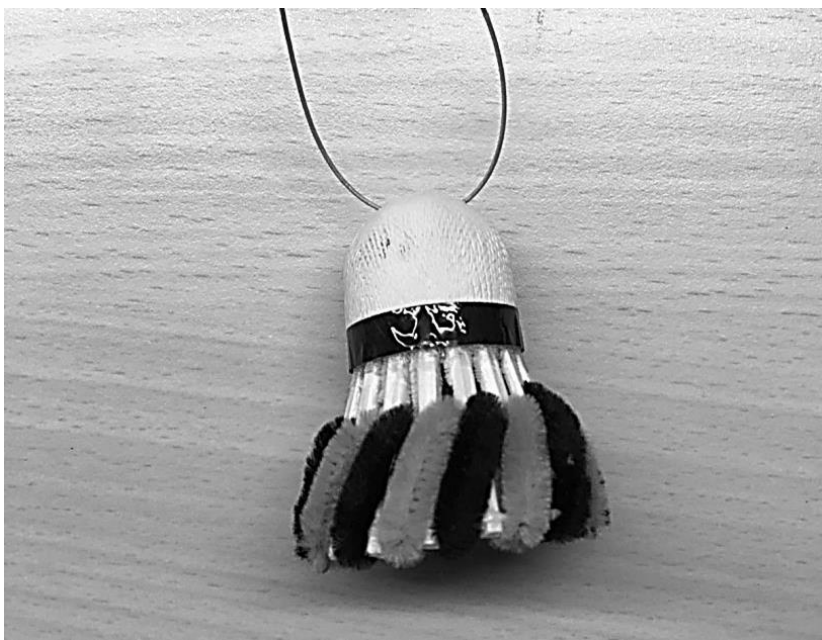
許你們在宣傳品中也曾見過。有一次，他向我問何時可以讓他在堂區介紹這一個項目，由他負責指導教友製作石膏像。假如我們能給這些高功能自閉症者機會去自我發展，這會是一件善功。

剛才，Chapman 的媽媽表示憂慮兒子的將來，即當自己年事已高時，如何繼續照顧他呢？這是一個實際的憂慮。我遇到的自閉症父母，不論他們的孩子是高功能或低功能，都會有這份擔憂。其實，信仰可以幫助他們放下。信仰如何幫助到他們呢？不錯，他們很盡心盡力關顧小朋友，但信仰能讓他們知道誰在後面看顧着他們的孩子，且叫父母在過程中慢慢去認知、接受和信服。我們若要幫父母跨越這些擔憂，信仰是能發揮作用的。信仰不是只在誦念經文或參加宗教活動，而是個人內心逐步地相信天主的愛心照料。既然天主能夠照顧天空中的飛鳥，甚至小如一朵花，那更何況是自己的孩子呢？我相信信仰可給予他們莫大程度的幫助。

正義是每一個人應有他的位置

這是我們慕道班學員製作出來的手藝品。你們知道它是甚麼嗎？它本身是一個羽毛球。羽毛球在使用

了一段時間後便會損壞，羽毛脫落，然後被人棄掉。我們有一位導師把破舊的羽毛球用作手藝玩意（見下圖），並以它比喻自閉症人士——我們可以剪去破舊的羽毛，再用毛線補織上去，使之成為一件飾物。他覺得這過程很有意思。或許有人會認為自閉症人士是社會的負累，但若我們教育市民接受和提供支援，便可使自閉症者的生命更值得欣賞。所以，這個不單是羽毛球的飾物，而包涵正義在內，賦予它應有的特質。



甚麼是正義呢？正義是給予他本身應得的。既然他是一個人，不論他的能力如何，也應在別人面前有他自己的位置。然而，當人要去判斷別人的能力時，高能力者高位置，無能力者則無位置，這就是不正義。每一個人不論其能力如何，都應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倘若我們把這個觀念提高，並能按情況給予別人應有的，這就是正義。

掌上十字架 (Holding Cross)

剛才所及，自閉症兒的早期支援較多，但到了他們稍能自主時，其支援則大幅減少。問題是如何在支援不足的情況下，仍然給予他們一份力量呢？讓我介紹這件小東西，不管你是否信仰，相信它對你也有意思。它是甚麼呢？對，是一個十字架（見下圖）。

但這一個十字架有甚麼特別呢？是木造的，具特別的構造，不規則形狀，方便握在手裡。當我們面對壓力、困難、辛苦的時候，需要身邊有人可以接觸、擁抱，以得到一種實在的感覺，亦即支持。但我們有時候未必尋求到支持，那又可怎樣呢？去找天主。然而，天主又似乎虛無飄渺，於是有人發明這個掌上十字架 (a holding cross)，更附加經文。



如何拯救陷於困境中的人呢？有時就只是一剎那，即所謂的咬緊牙關。這是一個好工具，可以幫我們度過那一剎那的難關。不論我們在苦路上期待慈悲時、默想耶穌的十字架時，或是求希望時，它也用得着。所以今天我所講的，不關乎學術，而是在牧民方面，特別是對有需要的人，我想：神父或教會如何幫他們繼續行天主要他們走的人生路呢？之前聽到許多人盡其能找理由去解釋自己孩子為何有異於別孩子，但找到又如何呢？即使能令自己心安一些，但前路仍

是要走下去。於我所想，如何與這些人士特別是他們的父母一起走這一條坎坷的路，更為重要。

與聽眾互動

（眾＝聽眾、賀＝賀若瑩、林＝林祖明）

賀：關顧自閉兒的父母是非常切要的。為我的工作而言，家長帶孩子來時，我會視孩子為一粒種籽，而父母和學校是種籽成長的環境，故此一定要全盤關顧，缺一不可。只要家中有一個是任何類型特殊情況的孩子，例如高功能自閉症，家庭所承受的壓力會很大。那壓力會挑戰婚姻，甚至挑戰姻親關係，因為這涉及到遺傳因素。譬如我認識一個家庭，她的兒子是亞氏保加兒，她的丈夫、家婆、叔仔全都是亞氏保加症人士，她的人生路格外艱難。

林：那是基於遺傳因素。

賀：不錯，是複雜的環境因素和基因圖譜之相互作用。由於他們不懂得溝通，說話時便容易產生誤會和衝突。

眾：我們平常人也有不同的性格，簡單而言，有的內向，有的外向，外向的人的社交主動性通常不會有問題。關於賀女士所提到的問題，其實有個說法：他們很活躍，但不懂規範、不知方法

（“active but odd”），就像他們有很多條門匙，要用到時，卻都用錯，別人看到就覺得他們奇異。另一種極端的說法：他們很被動，正如一般人對「自閉」的既定觀念，他們經常是獨個兒、靜悄悄的。為甚麼以往的教育制度未能辨別出這些學生呢？就是因為他們沉靜，卻能讀書，大家便算他是沒有問題，七年的中學階段（舊中學制度：編者註）就這樣度過。

賀：對於林神父說關於信仰的層面，如果上主會照顧田裏的花、天空中的飛鳥和海中的魚，祂也會照顧所有人的生命。我在想，我更要去幫助孩子的父母——神父今天正提醒了我，我們要去幫助那些家人發展信仰，更好地走這段人生路。

林：發展信仰，不只關乎知識，也涉及人的價值觀，即是要放下，也要接受新的東西。信仰需要經驗。雖說天主是觸摸不到的，但是可以體驗祂的臨在。祂會成為我們內在的一個錨子，不論如何，我們就是要抓緊住這個錨子。

眾：林神父提到經驗，不論是信仰或一般經歷也好，我們從經驗學習而來的東西是最永存的。因為透過經驗過程，內在感官世界能攝取到全方位的經

歷。

林：通常在經驗過後，我們會有新視野，隨後所看到的便會截然不同。就像中國人所說，開始時見山是山，接着是見山不是山，然後是見山還是山。這就是新視野帶來的轉化。

眾：請問你們現在做診斷時，有沒有更先進的做法，可以令家人可以掌握更多？

賀：診斷不是我主要的工作角色。一般而言，精神科醫生先行處理，然後到我做工作。我負責幫助他們做生涯規劃和訓練。你剛才所說的，在美國而言，基因分析(genetic profiling) 和基因諮詢(genetic counselling) 是標準做法，例如計算有關案主的父母及雙方姻親的特徵(profiling)。至於可否做神經影像(neuro-imaging)診斷，那是分組數據(group data)，故不可以，當中涉及研究的方法問題。你是在問診斷可以如何幫助父母去了解，是嗎？其實這方面，當公佈診斷時，要告訴父母兩個重點：第一，孩子的成長拋物線是不能預測的，例如他可能在三歲時仍未會說話，但可能其後的發展很強。第二，臨床醫生要多講預測，例如是神經系統脆弱，容易有共生的精神系

統病患。同時，孩子成長後的生活也很重要，舉例而言，不論是低功能或高功能，職場就業率只有約 18 至 42%。

眾：我本身有一班朋友，都是成年高功能自閉症人士，亦是在就業上很失意，我們開了一個面書群組 (Facebook group)，想尋求一些方法。很不幸，正如你剛才所指外國情況而非香港。歐美國家有一個整全的產業，香港的產業卻很狹窄。歐美有重工業，若果肯去發掘孩子的潛能，便不愁沒有範疇給他們發展，但在這個偏重金融的香港，即使他們有興趣去發展，也未必能遇上機會。其次，行業引發需要，別的國家仍保留工業或創意工業，他們的需要是屬於智力密集的社會，但香港走向服務業主導後，變得看重關係，中國人本身已習慣講關係，但我們這一群人卻是情盲，那真糟糕！因為我們不善於與人拉近關係，便被人擱置在一旁。究竟我們這一群人是否生錯時代呢？

賀：可以拉闊一點去想。我上次到美國開會時，聽到有人說如果高功能自閉症的基因庫是有缺陷的話，在進化的過程中早已被刪除，但為何沒有發

生呢？因為他們是很優秀的，因為社會仍需要他們，因為這種人是難得的。港大曾有人來訪問我，問如何使僱主聘請亞氏保加症者和高功能自閉症者，我覺得那是荒謬及侮辱。有不少大企業、大公司賺大錢，都是靠亞氏保加症者，他們肯承認這點。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新的文化和新的角度，並研究那些成功的人究竟有甚麼因素。

眾：臨床心理學家潘麥瑞雯博士曾在新生精神康復會做過研究，發現職場欺凌的問題不輕，這是一個社會心理的問題。你怎麼出色也沒有用，因為會有一群人在圍攻你。

眾：你剛才說高功能自閉症是有遺傳的，若然如是，那個程度又會否愈來愈深呢？

賀：我不懂得計算分子遺傳學 (molecular genetics) 去了解自閉症的程度會否愈來愈深的問題。但是，我知道它在進化的過程中，沒有被刪除。

林：從進化的過程看，它沒有被刪除；用信仰角度看，天主沒有把它刪除。他們的存在，正好讓我們有信仰的人去看如何給他們應有的權利、尊嚴和位置，這是值得我們注視的。

眾：我認識一位教書的朋友，他很本事，考取了一級

榮譽，再去報讀教育文憑，學院認為他的成績出色，不用他接受面試，修畢教育文憑課程後便去找教書工作。大家知道現在的教育環境，教席不足，但他仍對教書不灰心。然而，在三年內，他教過六間學校，那是因為校長都不給他教下去。我們期望這個教育制度可以給予下一代有共融的環境學習，但那些校長的作風卻與此背道而馳。

賀：這些事是發生過的。你所說的情況，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我亦見過有亞氏保加症的名校校長，他管治學校有他的一套方法，結果也是一面碰壁。

眾：我想請教神父，你說你們有一個慕道班是給一群智障人士的。但是教會不是應該講求共融，你們的方向最終能否讓那些學員融入大堂的彌撒，跟其他教友一起敬拜天主呢？同時，由於他們的人際關係是不一樣的，那又如何幫他們和其他教友朝向合一？或是，如何令他們和普通人可以融合，或在一起於不同的程度去侍奉上主呢？

林：之前提及的慕道班或彌撒，就像一個綠洲，讓他們可以有自然的和自由的時間，又或少一點尷尬，這都是我們想給他們的。那個慕道班每個月

只有兩次，故他們在其他日子可以回到自己的堂區參與平常的彌撒，只是我未有機會去看他們在那裏的情況而已。再者，他們有機會參與公開的、外出的活動，譬如聖堂朝聖，讓他們跟其他人互相接觸，開放他們的眼界和心胸。

眾：這些活動是否為那一班有特別需要的教友呢？

林：是的，我們會帶他們外出。

眾：我想跟進在學校的情況，即這群人與一般學生在學校內的生活。請問賀女士，你如何點評現今在學校內的融合教育政策？

賀：甚麼政策都是不重要的，那只不過是一個名稱。最重要的是有錢、有人才、有培訓、有進步，這才是真正實質的內容。

眾：那又能否做到？

賀：能否做到？我覺得做不到！說了這個，我猜其後會有人來批評我的說法，可能包括報紙、政府等。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倘若大家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在學校有甚麼配套可以去幫忙呢？個別的學校是不盡相同。如關愛校園，又或是有教員（包括校長、副校長、特殊教育老師）本身也是亞氏保加者的校園可能有利於整個過程。即是，

個別學校的情況會有不同，但一般而言，資源和培訓均是重要的。

眾：重要的是愛心和耐性，當然也視乎學校的管理是否吝嗇用在特殊需要學生(SEN)的額外資源。假如他們不着緊、不珍惜這些學生，會叫家長給孩子轉他校去。

賀：我曾幫助過一間教會名校，起初他們的心理學家安排十多個學生去擔任一位亞氏保加症同學身邊的「天使」(angels)。這群天使會注意那同學，若果他做錯事，便會向老師報告，之後便有專人去整頓他。我建議的方法是安排一群亞氏保加症和另一群非亞氏保加症的學生，給他們舉辦了五、六次聚會。聚會後，普通學生了解亞氏保加學童的優越之處，自此，他們再沒推行那個「天使監察制度」，而是以溫習小組取而代之。就是因為能欣賞對方的優點，大家便能建立一份公平、互相尊重、互相吸引的友誼。能否做到這點，要視乎個別學校。事實上，亞氏保加症人士是很優秀的，他們不需要別人的同情。

眾：這反映了四個字：「致用關係」，即若果找到有人與他旗鼓相當，那種關係自然會發生。

賀：對，就是這樣簡單。所以，重要的是要有一些有智慧和有見識的人去帶動。我不知能否回答到你的問題。也許我很悲觀吧。

眾：清楚。

眾：其實不用悲觀，Chapman 不就是一個成功的個案嗎？我覺得他與別人溝通是完全沒有問題，故他的媽媽也不必擔心。我覺得他是天賜的，天主特別揀選他作為你的兒子。另外那位兄弟也是一樣，他能完全融入我們當中，真很優秀。我們不要去標籤他們高功能或低功能。

賀：我們希望能有為高功能自閉症而設的慕道班，聚集在一起時，他們便可以隨心去問關心的哲學問題或神學問題等。

眾：假若我們走在其中，可能只得坐着聽他們的高論，反而從他們身上學習呢。所以，賀女士說得很對，讓他們有自己的支援，不是甚麼天使小組的支援，而是他們自己的學習小組，即是給他們找來旗鼓相當的人，與他們一起學習。我們不會抗拒他們一起參與彌撒，我覺得教友會很體諒的。如剛才那位小姐指出，我們要讓他們融入我們中間，這才算是共融。不要分開這一班人，那

一班人。就像那位先生提問為何有僱主不給他們工作機會，就是誤以為他們有異樣。（其實，正常人也有很奇怪的）。問題是我們不應去標籤，反而要讓他們融入。剛才那位兄弟也道出了問題，在今天的香港社會，就業確是很困難。另外，我有一個輕鬆的問題想問 Chapman，我留意到你的衣服上的前方寫着「運動不足」，後方寫着「不健康」，你的意思是要給我們看，還是在提醒你自己呢？

Chapman：關於這件衣服的來源，它是一個親戚送給我的。我穿着它，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原因，隨意而已，可能也顯示出自閉症人對於外表不太重視吧。或許有人會說，只需匆匆兩秒便可看透一個人或判斷出對方，但一些高功能自閉症人就未必會這樣看。這是主流社會普遍用來評價人的方法，但是這不利高功能自閉症的人。我覺得這是很標籤的，社會不需要這些標籤，因為標籤會浪費這些人才。現在很多人都用第一個印象決定對別人的觀感，沒有考慮到那個人的內在素質。正如那位朋友所說，我也會覺得相對於英、美的國家，香港社會就業困難，很大程度是由於你所說

的中國人社會的規範 (social norm)，大家靠人際關係，多於重視個人的內在質素。

眾：我覺得可以概括地說，知識不是最重要的力量。

Chapman：就像我們同學之間有一句名言，那是「與人的關係是成功的要素」(relationship is the key to success)。我覺得這是一句頗諷刺的話。

眾：與天主的關係才是重要的。

Chapman：當然，克服困難時，始終要靠上主、靠自己、靠身邊的人，即需要多方面的因素，才會成功。但對於一個高功能自閉症的人來說，每天只靠上主——我明白大家都很敬畏上主，亦無意侮辱祂——只躲在家中求工作，那是沒有意思的。

眾：說到底，關鍵是除了心靈、信仰上的需要，也要有具體的方法。

Chapman：我認為最能夠幫助到高功能自閉症者，就是政治。如果社會採用精英制度，就可以把他們推上頂端。

眾：我不甚認同。

Chapman：你不認同？為甚麼呢？

眾：因為精英制度會鞏固某一小撮人的想法，即無形中凝固一種社會規範，結果令人更難去逾越那些

規範。

Chapman：這正是現在精英制度的情況，但精英制度可以是另一類的。倘若這一類精英制度幫不上高功能自閉症，那便把它砍掉再重建另一類。今時今日，英國脫離歐盟、美國亦選了新總統，其實大家都對精英制不滿而想給它來個翻新。人要先把它推翻，重新建起來，才能讓社會中有需要的人可以發聲。

眾：我想回應一句，最基本上要政府有政策支援，這才是一個關鍵的起步點。不要說大學生，就算是中學的服務機構都已經很缺乏。這些輔導服務方向，凸顯了政府政策未能切合現實需要。剛才談到分類問題，我有一個朋友的程度較嚴重，屬殘疾性的。但在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的保障範圍內不見有這個名稱，因為自閉症被歸類於精神病之下。你們知否政府的歸類方法就是如此落後？

眾：為何大家對精神病都會如此敏感呢？有精神病如焦慮或抑鬱，我不認為是一個大問題。如果你自己不能衝破這個觀念的話——就像我不會介意告訴所有人我孩子有自閉症，特別是因為他屬於高功能自閉症，如果你自己也戴着有色眼鏡，便很

難去改變其他人的想法。

眾：問題是假若被看作為精神病，便在精神病條例的約束下自然地受到限制，會產生不便。我在這裏不詳說當中的內容。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正視這些問題，現在的政府本身沒有歸屬感，對社會問題視而不見。

第五講
傷健一家 與主共行

陸慧妍

扶康會總幹事

黃宗顯

精神科專科醫生

《傷健一家 與主共行》

陸慧妍

慈悲與關顧

今天我很高興得到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之邀請，分享扶康會與主同行四十年。我們在 2017 年慶祝四十周年，共同見證天主的慈悲。記得教宗方濟各於《慈悲面容》慈悲特殊禧年詔書說到「從聖經見到，慈悲是表達天主對待我們的關愛」和「天主的慈悲就是祂對我們每一位慈悲的關顧」。

扶康會不屬於任何宗教組織，但我們的服務卻充份發揮天主教的大愛精神。扶康會創立的啟蒙者是達碑立神父，他在七十年代不離不棄的為弱小及殘疾人士服務。不幸的是，他在一宗交通意外中離世。他的同伴方叔華神父繼承了他的遺志，創辦扶康會。他希望透過跨越不同種族、文化及宗教的界限，為弱小及

殘疾人士提供服務。他們積極倡導社區共融，希望臻至傷健一家。扶康會是一間非牟利的福利機構，獲得香港政府資助最高額的十大福利機構之一，每年獲社會福利署發放超過三億元，擁有超過一千多名員工，四十多個服務單位，每年服務約三千六百多人。我們提供不同類別的服務，對象包括輕度至嚴重智障成人、精神康復者、自閉症患者、發展障礙人士及肢體殘障人士。受資助項目包括院舍、護理院舍、輕度嚴重智障人士的院舍、日間訓練中心、職業康復及發展中心（從前稱庇護工場）、社區精神康復中心，以及自閉症發展綜合個案中心，疑似個案都會提供服務。今日，我會集中跟大家分享家庭服務。

家庭服務

甚麼是家庭服務呢？具體運作是怎樣呢？服務成效又是如何呢？我會逐一分享。我們的服務特色包括有理念、社會價值、運作模式和靈性培育。我們其中一個服務目標就是為智障人士提供關愛家庭模式照顧，好讓他們切實地生活在我們的當中。在 1977 年 6 月，那時扶康會還未註冊，但因着達碑立神父的精神和方叔華神父的努力，一位教友捐出葵盛一個地方，



服務啟蒙者
宗座外方傳教會 達碑立神父
(Fr. Enea Tapella)

成立一所小型家舍，為七名嚴重智障兒童提供了一個家園。家舍名為《友愛之家》（Father Tapella Home），以紀念達碑立神父。

以下播放一齣在1980年由麗的電視（後稱亞洲電視有限公司）製作的新聞紀錄片，片名為《苦日何多》（A Day Is Too Long），題材環繞當時香港智障成人的情況，並分享扶康會的服務理念。

七、八十年代的殘疾服務是怎樣的呢？只把他們留在家中，一直等也等不到家舍空缺。在八、九十年代，這些服務的需求很大，但家舍也只能提供幾個宿位，故我們要能接受現實，接納政府提供大型院舍的資助，當時有三十、五十、一百式的宿位院舍。即使如此，我們還是想保留關愛家庭的模式，繼續秉持

「關懷尊重」的核心價值。那時，有不同的機構提供不同服務，但都用整幢大樓的形式，很多人搬入此類院舍，但我們感覺那些都很院舍化，有點像醫院。在 1997 年彭定康政府撤回英國前，方神父繼續逆流而上，尋找地方和捐獻。從 1997 年到現在，已有四、五間家舍成立，但方神父仍希望可以成立更多家舍，這當然需要很多人力和物力。

從 1997 年至今，這四個家庭和方叔華神父住在邨迤軒。以前有六人，如今有五人，因為院舍條例規定院舍人數超過五人的話，必須接受院舍條例規管。這不是因為我們不想受規管，而是因為我們所住的私人樓宇沒有前後門，而院舍規管要求有前後門、消防設備、通道、斜路的建設，更指定每道門口的尺碼及走廊尺碼等，這些都是我們辦不到的，所以我們唯有將其中一位家庭成員調往其他地方，人數只剩五人，便免受政府條例規管。

在 2000 年與 2002 年分別開設了和諧軒和婉明軒。神父仍不斷去開設家舍，直到 2008 年，又開設了超瑩軒。之後會否停止？不會，我們只是用家居化形式運作小型家舍，好讓學員學習及體驗到生活中施與受的互動。

這些扶康家庭有甚麼特色呢？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家庭，在社會上發揮正面的影響，使大家對身邊的人表示關愛、尊重及欣賞。在施與受的互動過程中，包含了家庭的精髓，這是與其他服務不同之處。怎樣不同呢？剛才說每個家庭有五至八成員，包括一位兄長，方神父就是邂逅軒的兄長。為甚麼要有兄長呢？因為每所家庭都有一位男性角色，一般有修士、神父或教友擔任兄長的角色，那是義工性質，兄長的角色是執行靈性方面的工作。我們開玩笑地說，我們的成員入住後，都被神父感染成為教友。為何呢？因為每逢周末，我們都有靈性活動，如去聖堂等。有些成員甚至出任輔祭或分擔神父的工作，如講道理和領禱。起初他們不太習慣，但適應後，在飯前會做謝飯禱；遇上有成員身體不適，亦會為他祈禱。看到他們互相支援、互相愛護，令人高興。

家姆是半義工性質，即是受薪，但薪酬並不高，依賴籌款來維持。家姆大多都是教友，她們負責成員的起居飲食、做飯和日常照顧。在星期六、日有固定朋友來做家訪、陪同成員逛公園並參加其他活動，會員需要倚靠這些朋友來帶才方便外出。我們是小型家庭，員工只得幾位；不像大院舍有護士、廚師、社

工、聯絡人等，可以三更制去輪流服務院友。

天主彰顯慈悲 —— 扶康家庭的成員

這裏有一套影片讓大家可以了解多一些。這是由香港有線新聞有限公司製作，介紹社區不同的服務，片名是《香港社區網——細味人間》。2001年，在邨逅軒進行拍攝，主要是介紹智障人士享受愛與被愛的生活。

為何成員間沒有血緣關係，卻能維繫親密的關係且彼此照顧呢？智障人士其實跟普通人士沒有甚麼分別，即使他們之間沒有血緣關係，但仍可以享受天倫之樂。扶康家庭的成員都面帶笑容，這位是婉明，剛才提及於2002年開設的第三間家舍婉明軒就是以她命名。她已於幾年前離世，是方神父最疼愛的成員之一。她進入家舍之初，表現得很害羞、很離群、少說話。後來，感染到扶康家庭成員的愛，與大家的關係改善。

從剛才影片中月蓮和黃鏞的故事，我們看到家庭的社會意義和價值。影片中的方神父給黃鏞剃鬚，黃鏞是一個有嚴重自閉症人士，亦是一名孤兒，他的背景頗複雜，當年他被發現遺棄街頭，全身污穢不堪，

於 1983 年 7 月由社會福利署轉介進入扶康會順利成人訓練中心，但是因為無法證明他的出生日期，要從抽骨髓來推測他的年齡。為甚麼他姓黃？因為他是從社會福利署收容回來，在八十年代，凡是由政府照顧的孤兒都以黃為姓氏。有人開玩笑，說他們是吃「皇家飯」。由於他是一名孤兒和接受政府資助，他的所有費用，直到現在仍是由政府監管。自他入住扶康會家舍後，他的所有支出費用都由綜援支付。

黃鏞一直在順利中心接受訓練。當時他的情緒不穩定，自閉，時常頓足、咆哮、尖叫。1997 年，他是第一批人與方神父入住邈逅軒的學員，迄今接近二十年了。每當提起黃鏞，方神父總是面露笑容，全然地接受他的不足、缺點和尖叫。我們在 1997 年開設邈逅軒，並於 1998 年舉行開幕禮，現已榮休的主教陳日君樞機當時亦蒞臨我們的家舍，主持祝聖，之後更時常來探訪他們。每當有人來探訪，黃鏞都與訪客握手及負責招待工作。

我在 1983 年入職扶康會，認識了黃鏞。當時我是主任秘書，負責教導他，他很喜歡寫字，但是總把我的「陸」字的部首左右倒轉來寫，將阜部寫在右邊，寫了三十多遍仍未能改正。每當他看見我，總喜

歡跑來擁抱我，並送我一張寫滿單字的紙，當作圖畫相送，當中必有左右倒轉寫的「陸」字，他還要求我一定要收下。所以，我家裏已收藏了很多他的圖畫。他的成長過程，見證了天主對弱小弟兄姊妹的慈愛，現在當我看見黃鏞在影片中的笑容，便回想起當初他從大型院舍轉往一個家庭式的家舍，並得到神父的關愛和朋友陪伴之後，完全消失從前頓足、咆哮、尖叫等行為，這實在是天主彰顯慈悲的見證。

另一位是月蓮，她是中度智障人士，在 1993 年進入扶康會葵興職業訓練中心（以前名為庇護工場）。她成長於單親家庭，後來因母親年紀老邁及患腦退化症，不能再照顧她，故在 1998 年 2 月入住扶康之家邂逅軒。她本來很被動和膽小，愛獨個兒活動，與人交流的興趣不大，自從入住邂逅軒後，學會與家人相處，性格變得積極主動，願意結交朋友。從相片中，可以看到她愉快的樣子。

月蓮曾經參加運動會並獲獎亞軍，也參加過名為《最佳老友》的國際性活動。美國的國際最佳老友運動會(Best Buddies International) 在全球有五十個國家參與，他們從網上知悉我們的服務，便邀請並授權我們在香港成立《香港最佳老友》，這是香港唯一認

可推動此項運動的機構，旨在建立智障人士與非智障人士之間一對一的友誼。一般人容易交朋友，但智障人士比較困難。扶康會負責中間人的角色，在中學、大學成立分社尋找適合人選。月蓮就被選為配對的人選，她在 2006 年和她的老友記一起出席國際老友記週年晚會，她高興極了，因為智障人士乘搭飛機的機會很少。她有很多機會飛往不同的國家，增加了不少見聞和自信。因為她有許多機會接觸不同的人，遂變得敢於探索世界，並主動認識新朋友。相片中，她與方神父一同飛往羅馬。原本她乘坐公共巴士也會不耐煩，現在卻能坐長途飛機往其他國家，踏遍羅馬、南京、法國及意大利等地參加交流活動，也願意與別人分享她的經驗。

方神父每年都回去意大利的老家。如果籌募得足夠的經費，他也會帶同成員一起去。之前方神父就帶過他們到阿爾卑斯山遊覽呢！

扶康家庭鼓勵智障人士投入天主的懷抱。這群弟兄姊妹都已加入了教會，成為天主的兒女。剛才說到家舍內有兄長，負責輔導及培育家庭成員的靈性工作，鼓勵他們投入教會的生活，包括出席堂區彌撒、參加在何文田的教區傷殘人士牧民中心的活動。

《依撒意亞先知書》記載：「已壓破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滅的燈心，他不吹滅」。無論是健全或是傷殘的弟兄姊妹，都是天主鍾愛的子女，故所有弟兄姊妹應互相關懷。在神父的眼中，智障與非智障都是他的兒女。

「施」與「受」的社會意義

扶康家庭扮演甚麼角色呢？這可以分為三方面：第一是橋樑，即推動智障人士投入基督懷抱，聯繫教會內固定義工朋友及社會人士照顧他們。第二是平台，即促進健全和傷殘的弟兄姊妹彼此接納和共融。方神父說過他與智障人士是平等的，他不認為自己的地位比智障人或其他人高。第三是見證天主對傷殘人士關懷和憐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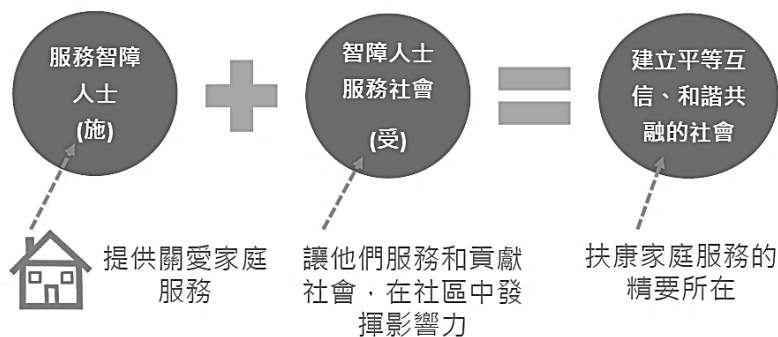
扶康家庭有甚麼意義呢？從黃鏞和月蓮的個案可見，與智障家庭成員的接觸，絕非單向，而是互有得着的。基於愛和欣賞，雙方均能體會真正的快樂及滿足感。正因如此，我們在服務智障人士時，本身也是被服務的一群，因為看見他們幸福，也確令我們高興。我在扶康會任職已有三十三年，超過百份之九十五以上的核心服務是在庇護工場、宿舍、展能中心，

但我在那兒而來的滿足感都不及在這四所關愛家庭帶來的豐富，因為後者能真正給予成員有家的感覺。

為甚麼智障人士也可以做到「施」與「受」呢？因為我們關愛家庭提供給智障人士所學的，跟一般服務機構所提供的全然不同。施與受，既是服務智障人士的互動過程，亦是扶康家庭之精髓。向社會傳遞關愛的訊息，幫助消弭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這樣才能建立平等互信、和諧共融的社會。我冀望能透過扶康家庭，彰顯出這樣的社會意義。



扶康家庭的社會意義： 「施」與「受」的互動過程



扶康家庭把不同背景、不同能力和沒有血緣關係的人融合為一家人，包括家兄、家姆、家庭成員及固

定義工朋友，大家在互相關懷和支持中分享生命。在「施」與「受」的交錯的過程中，例如智障人士與固定義工朋友出外活動，互相發揮影響力，令身邊的朋友領悟到人生的真、善和美，即是用真實行動來彰顯傷健共融的精神。誠然，透過關愛家庭，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甚麼是真正的傷健共融。

扶康家庭的精神和關愛家庭的照顧模式，現已推廣至中國內地。二十五年前，廣州慧靈弱智成人托養中心來香港時參觀扶康家庭模式，帶回內地，讓許多地方仿效，更多人受惠。其後，發展到北京及上海等二十多個地方。

透過扶康家庭，我們體驗到天主對世人的慈悲和憐憫。天主把愛賜予世人，這份愛能跨越界限。很多智障人士都不會說話，更遑論與外籍人士溝通，但他們卻能運用身體言語。我入職之初，很不習慣的是他們會突然撲過來，唾液也黏到身上，又或是發脾氣時掐痛我的手——由於他們不懂得如何傳遞心中所想，於是使用不恰當的方式。作為他們的導師，我未能遏止他們不斷地頓足，使我心中既厭煩也害怕他們。但當你懂得跟他們溝通後，即使一個小動作已能讓你知曉他們的需要，從此他們便乖巧的安靜下來。

回憶過去，自從方神父收養了他們入住邂逅軒後，家舍內充滿關愛、接納和了解，連有自閉症傾向及嚴重智障人士都喜歡這樣的家舍（其實普通人也會很喜歡）。當我們關懷他們多些，他們便不容易發脾氣、頓足或尖叫，反而發覺自己也可以關心別人。例如在飯前擺放枱櫈，在飯後收拾枱櫈，或幫忙做其他家務事。若他們住在大院舍內，則不須要做這些工夫，由工作人員替他們做。然而，在這家庭氣氛中，各個成員分工合作，例如家姆做飯，其他人幫忙傳遞飯鏟和碗碟等，大家透過互相關懷、互相照顧，學習及體驗另一種生活方式。再者有固定義工朋友或教友的探訪，提供了他們與別人共同跨越障礙的機會。

《傷健一家 與主共行》的回應

黃宗顯

剛才扶康會陸女士分享了在扶康家庭怎樣看到天主的慈悲。在信仰上，他們看到天主的慈愛光照了有需要的人，扶康家庭就給了我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扶康家庭的運作已有一段歷史，幫助社會上很多有需要的人士。我本身是一位精神科專科醫生，與陸女士認識良久，她在扶康會有特定的角色，負責一些區域的服務，對象是智障人士。很多人認為精神科醫生的工作是治療精神病患者，其實我大部分的工作是處理發展障礙及智能障礙的人士，例如一些自閉症發展障礙的人，故此在工作上我與陸女士有共同的地方。精神科醫生的工作範圍是很廣泛的，不單只是治療重精神病或情緒病人。

困難的根本是心態

我相信扶康家庭在經營時遇到不少困難，於此我有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第一是傷健距離。看到智障人士在公眾場所時，我們會否保持距離以避免刺激他們嗎？或會否害怕主動與他們交流呢？相信大多數人士會選擇保持距離，我看到的情況就是如此。但在志願福利機構或醫院內，我們則不會擔心有這種傷健距離的情況發生，因為機構內的員工之主要工作，就是服務智障人士。事實上，機構也不會聘請害怕接觸智障者的人。傷健距離在社會是很普遍，這亦反映了公平與正義的實況。當人在公眾場所看到智障或行為異樣的人時，通常會避開他們，但這個行為往往會影響身邊的人和小朋友用同樣方式作反應。由於我們不理解，心中潛藏威脅感，才會避開他們。那確實是錯覺的，我們應該縮短傷健的距離。

第二是歧視的深層問題。香港確實存在歧視的問題，這是我們從病患者反映的切身經驗中得知。歧視是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它能使傷健距離變得更大。雖然歧視是無形的，但在行為的表達和社會的政策上，可以具體地體現。

以下是個案分享：有一位中年已婚的情緒病患女

士，她是天主教徒。於十年前她因發病，抑鬱的情緒影響了她的社交生活和工作。隨後，她有社交退縮的情況，不欲與人交流，在這情況下她轉診來到我的診所。她在接受心理治療時，突然跟我說：「我覺得你們精神科醫生，討厭我這類的情緒病患者。」我問她：「為甚麼呢？」她回答道：「因為我時常很負面，醫生必定覺得很厭煩！」這兩句說話包含着深層的問題：她怎樣看自己和醫生之間的關係？她怎樣看自己的病呢？她以為別人怎樣看她呢？

於是，我反省怎樣跟她建立更好的關係，使她不會視自己為麻煩人。因為這種想法會令她停止向人求助。她的這個想法可能與抑鬱的情緒或思想有關，也可能從對醫生或身旁人的態度反應而來。不管是甚麼原因，我希望她能在信仰中體驗到愛，幫助治療她的情緒問題。同時，我也常問：自己是否能夠讓有需要的人，從我身上感受到天主的愛呢？

這情況只是社會中的冰山一角，還有許多患者都因着這個想法不去尋求醫治。為何他們會有此種態度呢？也許是他們擔心醫生會用某種眼光看待他們。社會上的確有些人會覺得情緒病患者很厭煩，例如當患者在公共巴士上突然嚎叫，又或是智障人士不覺察到

手上的智能電話音量過大，或不曉得在社交場使用合適的禮儀，身旁的人被嚇倒而感到煩厭。這種厭惡別人之態度是可以傳染的，歧視的目光亦隨之形成。

雖然說現今社會對智障人士或精神病患者的歧視已經減退了，但現實中還存在着不少。譬如智障人士或情緒病患者應徵工作時，雖獲聘請但是在崗位上受到特殊的對待而非優待，加上同事的蔑視眼光及輕嘴薄舌。負面的工作經驗累積多了，他們便漸漸對身邊的人失去信心。因此，社會的環境氣氛是一個因素。我們是否真正公平地、真誠地對待他們呢？是否真正能幫助智障人士及精神病患者就業呢？是否願意效法耶穌幫助他們，而非用有色眼鏡去看他們呢？

聖經中有些章節是有慈悲的主題：

- 《聖詠》第 103 篇「是祂赦免了你的各種愆尤，是祂治癒了你的一切病苦，是祂叫你的性命在死亡中得到保全，是祂用仁慈以及愛情給你作了冠冕。」
- 《聖詠》第 147 篇「祂醫治了心靈破碎的人，也親自包紮了他的傷痕」。
- 《慈悲面容》詔書中提及「天主的慈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真相」。

《慈悲面容》中所寫的具體慈悲，是指在日常行動和言語中可以看到天主，如同父母般疼愛自己的子女。這些經文都讓我反省到扶助弱小或有需要的人時，應該有如親生兒女般對待，即要有一份打從心底而來的愛與關懷。

出路(一)：關心與關係

2006年我開始服務智障人士，幫助及愛護他們之同時，自己亦有所裨益，這些額外的收獲，無法從平常工作中獲益。在傷健服務中，學習互相信任。在服務中有時候我們渴望給予幫助，但對方不一定覺得需要，故此我們應該先建立關係，大家互相接受後，才施予援手。同時，本着愛人如己的精神，視他們為親人般看待，因為大家確實是主內的兄弟姊妹。在傷健服務中，學習互相學習。在跟他們交流時，偶而發現他們有更勝過自己的才能，有啟發自己生命的作用。例如他們整天面露笑容，我們卻愁眉苦臉。誠然，我們背負許多包袱、困難或障礙，影響了情緒。相反地，智障人士很少有這些情緒包袱，值得跟他們學習這種生活態度。

我曾經在香港心理衛生會做義工，舉辦過一個主

題為《怎樣改善智障人士問題行為？》的講座。事後，有報章報導處方藥物可以控制行為，並提問為何用不同藥物。其實，更值得注視的反而是：需要別人關心，建立良好關係。服藥解決問題有時候是需要的，但我遇過例外的情況。如果我們將問題全都推給醫生，其實是將智障人士的情緒表達或甚至普通行為醫療化，必須服藥便成為了唯一的出路，如此則會錯過一些細節，例如背後的環境因素。

我看過有院舍或服務單位的社工突然離職，隨著有智障人士變得思想混亂，並出現失眠或行為的問題。當我深入了解後，便明白到這是與他所喜歡的社工分離有關的。我們要去安撫他，多於給他打針或服藥，催人入睡，阻遏擾亂。只可惜，我們通常把這種問題醫療化來處理，即是說當有事情發生而處理不來時，就認為問題只屬於醫生的負責範圍，只有醫生才能解決。這是一個誤解。

這些涉及環境因素，不獨在院舍也見於家庭。有一次，就有一名智障人士在一輛小型巴士內赫然大聲嚎叫，司機被嚇到急忙剎車，乘客們反應很大，一陣的騷亂又使智障人士精神不安。他們不經意製造混亂，只因是不懂得用適合的方法表達自己。在社會層

面上，大家要怎樣去面對及看待他們呢？除了正視他們是普通人，希望他們的生活正常化之外，我們也有必要真正認識他們。如果沒有真正的認識，便難以把他們當作普通人般體諒和看待。唯有當我們認識他們時，才能知道怎樣跟他們平等相處。

出路(二)：發展天賦

發展天主賦予的潛能。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的潛能，只是被發掘的時間各異。智障人士也有潛能，但礙於有限制的表達能力而不容易被發現。跟他們相處的經驗中，我發覺他們極需要身邊的人幫助發掘，並給予機會讓他們發揮天賦的強項和興趣。這樣，才能彰顯人性尊嚴，肯定個人生命的價值及確立人生的使命。不錯，智障人士也有使命，只是需要稍長的時間去發掘，因為他們不一定能懂得計劃人生。

實例（一）：

樂智協會有四十年歷史，主要是為智障人士提供康樂、體育或興趣活動。該會每年舉辦大型潛能展翅綜合匯演，鼓勵智障人士發展潛能，鼓勵他們表演如唱歌、舞蹈，並透過比賽給他們表達自己的機會。今年是樂智協會四十周年紀念，我跟

一位智障人士在一項音樂演奏中同台演出。那位智障人士的音樂造詣甚高，在練習過程中，有很多地方我都要跟他學習。雖然他在溝通上略為遜色；但在音樂上的溝通和表達上，他的潛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實例（二）：

在聖雅各福群會服務智障人士的經驗中，我每次都獲贈許多禮物，我便把診所內的專業證書全都收起，騰出空間擺放那些贈品，包括智障人士的作品，如畫作和馬賽克相架等。每看到他們的作品，我會提醒自己，要給他們找不同的機會發揮才華，希望他們可以創作更多、更優秀的藝術作品。到診的人進來一見，無不讚嘆，我便順便給他們介紹一番。聖雅各福群會開設了工作坊教授陶藝製作，智障人士巧手製作充滿色彩和笑面的陶瓷，叫人讚不絕口。所以，他們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甚麼都不會做，相反的他們實在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到診的人常問我，那些作品在哪裏可以買到？我的回答是：這是無價寶，世間難求。

出路（三）：社會資源分配

陸女士談到智障人士年紀遞增時，他們的家長或照顧者也趨老邁，不能繼續照顧及提供服務，即俗稱「雙老」(Double Aging)。多年前有一套名為《海洋天堂》的好電影，由李連杰飾演一位照顧已成年的自閉症者父親。每次他尋求服務時，總是找不到合適的院舍。作為一位父親，固然會愁腸寸斷。這套電影的故事正好反映香港社會的雙老問題。

作為智障人士老齡化關注組的醫學顧問，我們的工作主要是針對社會面對的雙老問題，向政府爭取公平的福利。智障人士輪候院舍超過十年，有的等至耆老的家長離世，也未能分配到院舍。對智障人士老齡的定義，香港落後其他國家萬丈。其實，香港可考慮將智障人士老齡的界線提早，因為他們會提早老化，換句話說，中度、嚴重和重度的智障人士的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比較短。可惜社會資源有限，仍然執着如何界定的問題。如果所有智障人士都要等至六十五歲才能領取長者咭或生果金，不少人會因為未達到要求而不能領取。所以，我們要不斷地爭取，但政府亦不斷地推卻，且常常以缺乏科學根據或正確的定義作為藉口來推搪。

這都是離不開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之問題，從醫院服務亦可見一斑。就同一類疾病去求診，在不同聯網的輪候時間會不一樣，這是關乎資源分配的問題。除了政府之外，大型機構也同樣確保資源善用。但醫生不是推銷員，亦不是保險經紀，為何要醫生在工作中達到特定的目標數量呢？在處方藥物方面，在同一級別的醫院也有不同藥物的選擇，在同一級別的診所也有不同藥物的種類，即是說，在處方藥物都不能一致，這又是涉及資源分配的問題。

多年來在醫院的診症，每次只能約有五至十分鐘，根本不能與病患者有充分的傾談。現在我在診所看症，每人需要一至三小時不等，尤其是小孩需要較長時間，這跟公立醫院的服務完全不相同。怎樣在資源分配有限及重視利益的商業環境下生存呢？營運私營機構時，如果每天進行兩個診症（以三小時一個診症），即使收費昂貴，也未必足夠交付租金。要成為一位慈悲的醫生，需要面對社會正義和資源分配的問題。

有很多智障人士未能使用政府院舍，而要入住私營院舍，政府或有關機構應提供合適的環境服務智障人士。我對私營院舍頗熟悉，我有很多患者在他們有

生之年也未曾輪候成功入住政府院舍，迫於無奈入住私營院舍。有些新開設的私人院舍在初時人數較少，照顧質素還可以，但在商業為本的社會中，最後都要商業式經營代之。曾有智障人士家長哭訴兒子有撞頭的習慣。有一次她到院舍探望兒子，看到他被鐵鍊鎖在一條柱上。我聽後也難過非常，這種處理方法只是為方便職員，沒有實質解決問題，更沒有保護智障人士的尊嚴。

社會制度對有需要的人士不公平，替他們爭取公義，最終自己也會是受惠者。看到政府花費龐大資金展開許多大型建設工程，為甚麼就不建設多幾間院舍、幫助解決雙老問題或其他逼切性的社會問題呢？

我們往往把很多問題都歸作醫學問題來解決，但醫學和科學均有其限制。例如我應診抑鬱症患者，在醫院平均用五至十分鐘時限，醫生很多時只能處方藥物，未能有足夠時間與病患者傾談。一般人認為藥物可以醫治病情，倚靠藥物便能解決問題。可惜，醫學研究結果顯示抗抑鬱藥的效果反應只得百分之五十，即兩個患者接受治療時只得一人痊癒。同時，未痊癒者須要繼續嘗試其他不同的治療，反映了藥物治療的成效可以因人而異。

醫院工作像在工廠似的，加上社會資源有限，醫生人手不足，以及我們有工作達標的要求。在這種流水作業式的運作中，不能有充足時間給予病患者，這跟醫生有否熱誠沒關係，而是社會制度運作是否對有需要的人予以公平的對待。很多醫院醫生沒有時間與患者傾談，故此只能不斷處方藥物給他們，但當中又會帶出藥物副作用和抗藥性的問題。

精神科醫生的職責就是和患者傾談，但諷刺的是專責跟患者傾談的醫生，在實際工作中與患者傾談不多，每名患者的診症時間約為五至十分鐘。患者跟醫生只能倉促的傾談便要離開，這是多麼諷刺的事情啊！再者，現今的大學醫學教育中，只教導學生關於生理的醫治和專業處理不同疾病的理論，但在關顧患者的心靈及靈性部分卻未足夠。回想我過往在大學唸書時，亦沒有接受醫治心靈及靈性方面的教導。

出路（四）：與主同行

社會制度的東西我不能改變，只能在自己的範圍內努力。我本身是一位公教醫生，我經常自問：公教醫生與其他沒有宗教信仰的醫生會否有不同呢？我不只是精神科，也是普通科醫生，故此對有普通或特別

病患者都會醫治，且針對性地處理他們的問題。然而，有許多疾病仍是難以醫治的。在我的十五年從醫經驗中，有許多病人是不能醫治的，故此我不只是負起醫治的角色，更給他們舒緩疾病帶來的痛楚。治療病症和舒緩痛症是屬於生理的上的照顧，但是由此引發一連串生活上的問題，如不能上班或不能自我照料，便會影響個人的心情。所以，我們除了治療他們的病症外，還會在其他方面給予幫助，例如關心病症有否影響到他們的情緒。事實上，不是每一位醫生都能做到噓寒問暖，在現實生活中的家庭醫生是很忙碌，很難抽時間細心慰問。

醫生關心病患者的情緒時，患者會感到安慰，因為他們能體驗到非機械式的治療，而是一類比較深層次的情緒關懷，這是心靈上的照顧。作為一位公教醫生，除了生理和心理照顧之外，照顧患者在靈性上的需要同樣重要。世界衛生組織對人的生活質素(Quality of Life)的定義分為幾個層面，除了生理和心理外，還有靈性的健康，這對人的整體生活質素很重要。作為有信仰的醫生，我們要關注病患者和弱小者在病症上的需要及知道怎樣去關心他們。

故此，我在應診中會關注他們是否有信仰，因為

如果有信仰，他們便知道生活方向和如何選擇方向。再者，我會關心他們有否因為疾病而影響了靈性生活，或有否因為生病而對天主失去信心。曾有患者由於疾病而埋怨天主對他不公平，質問天主為何不聽他的禱告治好他呢？為何要他患上嚴重疾病呢？所以，除了身心方面的醫治，靈性方面的照顧也確是公教醫生的使命之一。

在這慈悲特殊禧年，我的生活有了很大轉變，在這改變中，自己亦有所反思。我曾於公立醫院精神科工作了十五年，直到去年年底。我在祈禱中得到啟示，叫我轉換新的工作環境，並做些自己喜愛的工作。誠言，我捨不得以往的工作和共事的伙伴。就在慈悲特殊禧年，我選擇了離開公營機構，開設一所綜合醫療中心。

談到放棄公立醫院就業一事，我考慮很久，因為自己不是一個生意人，害怕面對商業社會。剛才談及社會正義，那跟社會經濟及商業利益是有密切的關係。雖然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經濟學及會計學，加上香港這個商業社會，要做到照顧患者身心靈的需要是相當困難的，但這正是我在禱告中所得到的使命。

處於這個轉捩點，我反覆思量。在過去的十五年

我都是在劃一模式下工作和生活，故此自省的機會並不多。現在經營私營醫療中心，勞心勞力，所以這一年我對工作的反思亦特別多。我常自問：究竟如何能成為一個慈悲的醫護人員或社會工作者呢？我得做好自己，要與天主建立良好的關係，即是要全心親近天主、每天祈禱、思念天主給我們的愛及生活中的賞賜、主日參與彌撒和辦告解。在生活中，以信仰做基礎和指引，見證天主的愛及慈悲，而不是將生活、工作和信仰三者分割開來。

我的工作是要接觸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如精神病患者及智障人士，要懷有慈悲的心去接受他們。假如厭惡及害怕他們的話，便做不好這一份工作。我們應該具同理心，將自己代入對方的處境，感受他們所面對的問題，這對於身為醫護人員或社會工作者殊為重要。然而，同理心是靠工作經驗的累積，再加上個人熱誠和言行一致的愛心實踐。要真誠幫助有需要的人士，那份真誠也是必要的，如果只是純粹視為一份工作，賺取一份薪金，這與同理心有很大分別。成為一位懷有慈悲心的醫療人員，是很有價值的。

「醫者父母心」這句話真有意思。「醫者」不單是指醫生，而是泛指所有社會工作者，他們須要秉持

一種為人父母的態度。我時常對病患或有需要的人說：「我視你們作我的兒女對待，因為我會將最好的給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家人」。所以每天診症時，我會把「醫者父母心」這句話放在心裏，提醒自己，關注他們的心靈需要。我把這些精神理念的句語，放在當眼處，好能時刻反省天主的慈悲，亦讓大家可以心存慈悲的印記。

怎樣把天主的慈悲在我們每天工作中實踐出來呢？記得在慕道班一位修女說過，我們可以在家中設置一隅擺放十字架或聖相的宗教角落。因此，我也在工作的地方設置一個宗教小角落，擺放十字架、慈悲天主的聖相、靈修書籍、祈禱文等。我的朋友替我在意大利訂了一幅聖像畫，可供人在診所裏做反省及祈禱之用。我沒有特別向人介紹這處角落，但是有人進來時都會感到好奇，因為這裏的氣氛不像一間診所，反而是一個很靜謐和佈置得像家的地方。遇到有涉及信仰的求診者，便與他們傾談關於信仰，譬如疾病有否影響他們對天主的信心和跟天主的關係。我沒有主動提出要跟他們祈禱，但印象深刻的一次，曾有一名公教病患者主動到宗教小角落祈禱，甚至要求我帶領他祈禱。我在公營醫院工作時，從來都沒有這樣的經

驗，有妙不可言之感。除此之外，我的工作團隊中有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我們對患者關愛和照顧，冀望他們感受到天主的慈悲。在每天工作中，我們會主動和他們講聖經和信仰，但經常是他們先向我們提問信仰的問題，或詢問禱文和聖像畫的意思。即使是沒有信仰的人，也會提問。

結語

傷健本是一家，而所有人的生命都同樣是有價值。我們來到世上，本是一無所有。從信仰中，我們領略到當自己有財富時，應該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因為當我們離世時，不能帶走在地上的任何財富。所以，在與主同行的路上，我們要能盡己所能幫助有需要的人，如支援智障人士在身、心、靈方面的需要，且替他們爭取應有的基本生活需要，好讓他們的生活質素臻至美好。

跋

2016年為天主教特定的「慈悲禧年」。教宗方濟各選擇了在中非共和國首都班吉(Bangui)作為首先開啟慈悲禧年聖門的地方——這是世界上排名第三貧窮的國家，而且長久處於內戰，這寓意着教宗特別呼籲大家放下製造死亡的工具，以正義、仁愛和慈悲來裝備自己，一齊做和平的工具。

為配合該富有意義的一年，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於2016年10月14日至11月18日期間安排了六次以《慈悲與正義》為主題的講座系列，探討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如邊緣青年、聾啞人士、弱能人士等，透過了解他們的遭遇、支援者與受助者同行的經歷和成功的例子，闡明慈悲與正義如何推動幼有所育、老有所依、學有所教、弱有所幫、貧有所濟的社會。

該講座系列10月21日的主題是「貧窮真相」，主講者為何喜華先生及羅國輝神父作回應。可是該天下午二時十五分天文台發出八號暴風信號，延至五時

二十分才改為三號強風信號。故此晚上七時舉行的講座便因此取消。其後因主講及回應嘉賓沒有機會在「慈悲禧年」結束前另作安排，於是該講座只有割愛，十分可惜。

正如夏志誠主教指出，「慈悲禧年」所指的慈悲，不僅是實踐愛德行動，也應該針對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是故慈悲中要有正義，以維護個人自由平等與尊嚴的社會。

天主教研究中心於過去兩年，陸續舉辦了有關天主教社會倫理的講座及培訓課程，對慈悲、苦難及正義之間的關係曾作一些研究，認為人類的苦難會引起人的慈悲心，但作為基督信徒的慈悲心卻更是來自對上主慈悲的體驗。另一方面，上主賜給人的智慧和理性使人不斷尋找社會的公義，為能改善不公義的社會結構，以免除人為的苦難。慈悲與正義隱藏了人類要超越自我的嘗試。

現在《慈悲與正義》講座系列輯錄成書，好讓更多人士回顧講座的訊息，促進大家身體力行關懷弱小，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保障制度發展，關注飽受戰火蹂躪的痛失家園的難民。

誠蒙 八位講者審閱過各篇文章的內容，亦在本書編輯過程中提供寶貴意見並同意出版，不勝銘感。

夏其龍

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8月15日

索引

二劃

- 丁修女 44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95, 97,
104, 107
人性的標誌..... 114
人性尊嚴..... 34, 70, 180

三劃

- 口語79, 81, 83, 85, 86, 91, 97,
101-102
小型家舍..... 163-164

四劃

- 內化行為..... 130
公益 112
公義 .4, 37-38, 58, 60, 62, 65-67,
69, 70, 74, 77, 114, 184
分子遺傳學..... 151
天主教教理..... 112
天賦 74, 119, 180
心靈18, 24, 72, 111, 157, 177,
185-187, 189
手語條例..... 106
手語語言學..... 79, 90-95
手語翻譯師..... 94
文藝復興..... 81
方舟團體..... 29
比利時 16, 20, 106-107

五劃

- 世界衛生組織..... 186

- 兄長165, 169
司徒華教育基金獎98
失能78
布拉格20
平等66, 112, 170-171, 180
弗蘭克18
本篤會81
正義1-4, 33-34, 36-37, 76-77, 107,
110-116, 121, 133, 143-144,
175, 183, 187, 197
生活質素186, 190
田德農綜合社區中心32

六劃

- 共融 ... 95-98, 100, 102-103, 152,
155, 162, 170-172
匈牙利16
同情30, 34, 46, 154
在職貧窮家庭115
自閉症 ... 118-119, 121-124, 126,
129-131, 138-145, 147, 150-151,
155-158, 162, 166, 173-174,
182
自閉症譜系障礙者124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104

七劃

- 困乏113
夾竹桃15
形哀矜60
扶康會 160-163, 167-170, 174

- 抑鬱125, 130-131, 136, 158, 176,
184
貝魯特..... 4
- 八劃**
- 亞太區手語語言學研究及培訓計
劃..... 92
亞氏保加症.... 121-122, 132-133,
135-136, 147, 151-152
亞奎那..... 34
制度30, 36, 39, 58, 61, 65, 69, 73,
74, 114, 116, 148, 152, 154,
157-158, 184-185
周保松..... 26
和諧..... 64, 112, 164, 171
和諧軒..... 164
孟子..... 110
孤寂..... 43, 45, 51
帕拉圖..... 80
林布蘭..... 11, 27
歧視..... 98, 175, 177
社交情感溝通..... 123
社會意義..... 166, 170-171
社會福利署..... 167
青少年上游..... 71
青鳥..... 33
非典型狹窄興趣..... 123
- 九劃**
- 按摩服務的外展工作中心..... 31
柏林..... 20
祈禱5, 64, 95, 107, 141, 165, 187,
188-189
紀伯倫..... 4-6, 11, 18
- 紀愛恩修女..... 33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 122
胡圖族..... 23
重覆行為..... 123
香港心理衛生..... 178
香港手語教學文憑..... 93
- 十劃**
- 原子彈爆發..... 15-16
家姆..... 165, 169, 171, 173
家庭. 2, 42-46, 48-49, 50, 52, 56,
58-61, 63-64, 65, 70, 72, 86, 96,
115, 121, 127, 147, 162-166,
168-175, 179, 186
恐懼..... 4, 10, 49, 121, 124
殉道者聖高比..... 19
浪子回頭..... 11, 12, 27, 29
烏干達..... 19
真福八端..... 140
神哀矜..... 60
索本諾..... 35
脆弱..... 114, 124, 149
院舍條例..... 164
馬丁路得..... 20
馬拉拉..... 19
高功能自閉症 118-119, 121-124,
126, 130-131, 138-140, 142,
147, 150-151, 155-158
- 十一劃**
- 國際最佳老友運動會..... 168
基因分析..... 149
基督教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95
婉明軒..... 164, 166

強積金對沖.....	115
情緒病患.....	175-177
捷克	20
接納	128, 163, 170, 173
救恩	80-81, 114
教宗方濟各.. 2, 11, 60, 114, 116, 161	
教區傷殘人士牧民中心.....	170
疏離	24, 43, 45, 52
符號	80
第一次世界大戰.....	16
第二十一屆國際聾人教育會議 ⁹⁴	
第二次世界大戰.....	17
第二屆國際聾人教育會議 ^{81, 94}	
聆聽	8, 56, 64, 69, 78, 121
貧窮 ..32, 35, 59, 62, 64, 71, 112, 115, 140	
陳日君樞機.....	167
十二劃	
勞工及福利局.....	107
善牧會	42-44
尊重 ^{34, 62, 68, 71, 104, 112, 115, 123, 154, 164-165}	
尊嚴 ^{34, 70, 71, 112, 151, 180, 184}	
惻隱之心.....	110
智障 29, 141, 152, 162-163, 166, 168-183, 188, 190	
智障人士老齡化關注組.....	182
殘疾服務.....	163
痛苦 ^{3-5, 17-18, 20, 34, 36, 38-39, 41, 49, 53-54, 88, 114, 116}	
超級系統者.....	126
超瑩軒	164

順利中心接受訓練	167
----------------	-----

十三劃

傷健距離	175
感知統合失調	126
慈悲 ^{1-4, 8-11, 15, 20, 22, 29-32, 34-35, 37-39, 41-43, 54-60, 62, 65, 67-68, 76-77, 107-111, 113- 116, 118-119, 121, 127, 131, 133, 140, 146, 161, 166, 168, 172, 174, 177-178, 183, 187- 189, 197}	
慈悲特殊禧年 ^{1, 2, 10, 34, 43, 57, 111, 114-116, 161, 187, 197}	
溫喜蓮	33
聖女貞德	20
聖母院書院	96
聖耶柔米	80
聖修伯里	20
聖詠	177
聖雅各福群會	181
聖奧斯定	81
聖達米盎神父	20
聖誕休戰的故事	16
腦神經發展	122
葵興職業訓練中心	168
資源分配	182-183
達碑立神父	161-162
雷鳴遠	20
預期壽命	182
十四劃	
圖西族	23
瑪莉	31-32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 123	雙老問題 182, 184
精神病患..... 174, 177-188	雙重困難 78
十五劃	離異 45, 47-48, 50, 52, 57
寬恕..... 8-9, 11, 29, 59, 70, 115	十九劃
廣州慧靈弱智成人托養中心172	關子尹 9
廣島..... 15-16	關係貧窮 59, 62, 64
憐憫22, 30, 34-35, 39, 43, 54, 62, 75, 78, 111, 170, 172	關愛家庭 162-163, 171-172
撒瑪黎雅人..... 35	關愛家庭模式 162
暴力..... 22, 24, 46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104
樂施會..... 115	二十劃
樂智協會..... 180	獻主會小學 96
標準工時..... 60-61, 65	競爭 30-31, 71, 111
黎巴嫩..... 4, 5	蘇丹 19
十六劃	蘇格拉底 80
樹突棘..... 124	二十二劃
盧旺達..... 19, 22, 24, 26	聾人文化的研究 92
盧雲..... 27-30	聾人教育 .. 77, 81, 83, 89-92, 94, 106
十七劃	龔自珍 20
嬰兒教育班..... 97	二十四劃
邂逅軒..... 164-168, 173	靈性17-18, 29, 39, 114, 162, 165, 169, 185-187
十八劃	
禮物..... 15, 55, 127, 181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叢書主編

夏其龍博士 (召集人) (香港中文大學)

譚偉倫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譚永亮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蔡惠民博士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學術顧問團

勞伯壠教授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張學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許敬文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關信基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勞啟明先生

吳梓明教授

殷巧兒女士

楊秀珠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Prof. Leo D. LEFEBURE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古偉瀛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Prof. Peter C. PHAN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Ambrogio SPREAFICO (Pontificia University Urbaniana, Italy)

Prof. Nicolas STANDAERT, SJ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General Editors of the Series

HA, Seong Kwong Louis Edward Keloon (Coordinato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M, Wai Lu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VEIRNE, Patrick, CIC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OY, Wai Man (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Advisory Committee

LO, William , S.J. (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CHEUNG, Hok Ming Frederic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UI, King Man Michae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UAN, Hsin Chi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O, Kai Ming Charles

NG, Tze Ming Peter

YAN, Hau Yee Lina

YEUNG, Sau Chu Alis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FEBURE, Leo D.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KU, Weiy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HAN, Peter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 USA)

SPREAFICO, Ambrogio (Pontificia University Urbaniana, Italy)

STANDAERT, Nicolas, SJ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 Belgium)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叢書 通識系列
《慈悲與正義》慈悲特殊禧年講座筆錄

叢書主編： 夏其龍、譚永亮
編輯： 李佩華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852) 3943 4277
傳真：(852) 3943 4451
網址： <http://www.cuhk.edu.hk/crs/catholic>
電郵： catholic@cuhk.edu.hk
承印： 4a Colour Design
(香港葵涌金龍工業中心第四座六樓 C 室)
二零一七年八月初版
ISSN： 978-988-14037-6-6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rcy and Justice-- in the Jubilee of Mercy 2016”**

Series Editors: HA, Seong Kwong Louis Edward Keloan, Patrick
TAVEIRNE
Editor: LEE, Pui Wah
Publishers: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4277 Fax.: (852) 3943 4451
Website: <http://www.cuhk.edu.hk/crs/catholic>
Email: catholic@cuhk.edu.hk
Printer: 4a Colour Design
(Flat C, 6/F, Block 4, Golden Dragon Industrial Centre,
Kwai Chung, Hong Kong)
First Edition: August 2017
ISSN： 978-988-14037-6-6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6 by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